

# 炎黄春秋



1958年9月，邓小平和彭德怀

## 刘少奇的公仆风范 任仲夷谈：

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  
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

彭德怀在三线的苍凉岁月

从新公布的一封信看

胡适与虎谋皮

敦煌遗书是怎样流失海外的

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

11

1998

总第80期

# 炎黄春秋

## 求 实 篇

- 2 刘少奇的公仆风范 ..... 徐庆全  
9 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 ..... 任仲夷

## 春 秋 笔

- 14 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 ..... 吴 象  
22 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 ..... 曹 英  
28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一段曲折 ..... 温济泽  
32 彭德怀在“三线”的苍凉岁月 ..... 王春才  
36 从新公布的一封信看胡适与虎谋皮 ..... 雷 颐

## 沉 思 录

- 38 一位铁道专家在“三反”中的困惑 ..... 黎 白  
42 把视野放宽些 ..... 邨 人

## 赤 子 心

- 44 我和聂力烽火中的童年友谊 ..... 周 密  
48 胡愈之与《南洋商报》 ..... 茆贵鸣  
50 人民币诞生记 ..... 邓加荣  
52 共和国一次超规格的葬礼 ..... 窦孝鹏

## 五 洲 景

- 55 漫步日内瓦 ..... 杜 莉  
60 外国记者观战汾阳城 ..... 屈德骞

## 人 海 浪

- 63 澳门赌王何鸿燊 ..... 吴跃农  
66 “父教育母实业”的实践家张謇 ..... 邱 建  
21 革命党谋炸袁世凯 ..... 王光远

## 文 荟 园

- 70 《人民日报》筹办经过和创刊日期 ..... 陈春森  
72 敦煌遗书是怎样流失海外的 ..... 倪怡中  
75 《三笑姻缘》本事考 ..... 陈浩望

## 古 镜 台

- 76 力主“存要去闲”的隋初名臣杨尚希 ..... 谭特立

## 时 代 风

- 78 浙南沿海小平原腾飞见闻 ..... 李一鑫 张绪文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镏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陈崇保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法律顾问: 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H-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 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 100007

电话: 64072452

64031144 转 2191 或 2004

印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照排: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

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M

出版日期: 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 4.80 元

# 刘少奇的公仆风范

● 徐庆全

1961年4月1日至5月15日，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和宁乡县炭子冲大队等地蹲点调查达40多天。从广州出发时，他就对随行人员提出了规定：“不住宾馆，不住招待所，不扰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

同年的7月18日，刘少奇的专列到达哈尔滨，黑龙江省委的同志在汇报完工作后，提议组织个晚会，让他休息一下。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这次来黑龙江是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享受的，请不要搞什么娱乐活动，一律不准搞额外招待，也不要惊动与我调查研究工作无关的人，请只通知我要去的地方。”

之所以在文章的开篇点出这两点，是因为在我有限的视野中，眼前的某些现实，总让我感觉到，尽管有关刘少奇的这两件事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总有一种似乎是“往事如烟”的感叹。

这位共和国主席的举动，决没有沽名钓誉之嫌。翻开他的一系列著作，披阅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的回忆文章就会知道，与这两件事相同的事例，不胜枚举。

## 建国后他主要抓了两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执政党的建设

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几亿人口的

大国的执政党。毫无疑问，这是个巨大的胜利。但是，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个变化也实在太大，执政党如何对待这个胜利呢？

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对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的建设问题作了展望，他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点。

建国后，刘少奇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在实践中对如何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探索。

1951年3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在这次会上，刘少奇作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报告。他在分析了党内的实际情况后，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和加强执政党的各项措施。”

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后，不但在中国各个



刘少奇和黄炎培亲切交谈

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也引起了高层领导人的思考。刘少奇认为，执政的共产党从这一事件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带着这一思考的结论，在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他对参加会议的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个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谈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

1956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部长会议上讲话，进一步强调指出：组织部门的工作就是把干部管好，首先是要把成为“统治阶层”的几十万干部管好，要经常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看看他们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有特权，并且规定一些制度，限制他们的权力，要他们把工作作好，要他们永远不脱离群众。这是组织工作、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作好这件事，便是很大的成绩。

带着这些思考，1957年2月18日，刘少奇带领一个调查组一路南下：保定——石家庄——滦城——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走走停停，沿途调查，把目标对准了各种各样的矛盾。

在调查研究中，刘少奇每到一地，都要不厌其烦地反复告诫各级干部：“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绝不能脱离群众绝不能搞特殊化。”

在长沙和株洲调查时，他指示工作组的同志和随行的工作人员：“重点调查干部的住房和生活情况。”他也亲自深入到一些干部和群众家里调查了解“干部和群众有无明显差别”。在每次干部座谈会上，他都要苦口婆心地千叮咛万嘱咐：“我要提醒同志们，我们绝不能搞特殊化。我们共产党人要卑宫室居陋巷，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时刻都不能忘记人民群众。过去，我们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现在，我们执政了，如果我们不重视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会寸步难行，我们就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所不齿。这是何等等的危险啊！”

他要求各级干部，“不论是工资问题、升级问题、提职问题、住房问题和其它生活福利待遇问题，我们的干部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要以身作则，都要秉公办事，都要廉洁奉公。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其中有许多矛盾就出现在分配问题上。我们有些干部不能严于律己，本不该得到的，你通过利用职权或者其它手段弄到了，这是以权谋私，这是我们的党纪国法所不允许的，人民群众更是深恶痛绝的。”

通过调查，刘少奇把矛盾的产生集中在“分配问题上”，可谓切中要害。对此他多次阐述这一问题，并对“多分多占”的现象要求严厉查处。

1957年5月7日，在听取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煜关于学校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汇报时，在谈到整风学习中要讨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提到了积累和分配的关系，他指出，在积累与分配的关系上，“特别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领导人员分配过多，享受太多，形成特殊，人民不满。正因为是社会主义所有制，所以谁也想多分一点，可是谁也不能多分，多分了就不行，连我们这些人也包括在内，老资格也不行。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就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至少是不尊重

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可以说是违背社会主义所有制，以至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

1961年6月17日，刘少奇在读到《长沙县福临公社对干部生活特殊化走后门处理的情况》汇报后，立即给李先念指示：“请你们抓住几个省、几个县、几个公社、几个大队，由上而下地公布商品帐目，认真加以清查，以便了解过去是怎样分配商品的，在今后的应该怎样改进商品分配办法。在过去的一年多内，商业部门和粮食部门除犯了其他的一些错误以外，在分配商品方面，也犯了许多极端脱离群众的错误，但是你们自己和我们都还不大清楚，必须迅速查清并坚决改正。”

1962年11月12日，他同参加组织工作会议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各中央局组织部负责人谈话，着重谈了执政党建设问题。他指出：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列宁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现在有些大案子处理不下去，有人顶住。不要怕，处理了这些人，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这就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总而言之，不要脱离党员多数，不要脱离群众、干部、工人、农民的多数，要认真地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一个领导，一个多数，这可以使我们党保证纯洁，将来曲折少一点。

刘少奇的几次讲话所提到的党的腐化的问题，事实上已经在党内存在了，众所周知的张青山、刘子善的贪污腐化，已经为执政党敲响了警钟。但是，事实还不止此。在刘少奇的调查研究过程中，他还发现了更多问题。他的秘书回忆了这样两件事：

1957年，刘少奇到一个省视察，发现那里修建了一座高级宾馆，心里很不愉快。本来人家打算安排他住在那里的，他很快就离开了，并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注意啊！”

又有一次，他在某地视察军事设施，当地的同志请他顺路去参观了一座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一处绿树葱郁的山谷里，环境十分幽静，建筑更是豪华，地板都是楠木的，据说这是江青亲自“设计”修建的。也许有的同志原以为少奇看了如此“独具匠心”的精巧建筑会大加赞赏。可是，他却心情沉重地说：“这样搞，要亡党亡国的啊！”话虽不多，却反映了他对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财产行为的深恶痛绝。

为这些事，他后来还对我们解释说：“当前国家还很穷，老百姓生活也不富裕，吃的都困难，你搞那么高级的房子，和老百姓悬殊那么大，要脱离群众的啊！我们共产党人随时都要注意，永远不要脱离群众。”

对这种为领导人修建高级宾馆的做法，刘少奇虽然痛心疾首，但碍于某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他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自己不住。但是，这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

1962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编印的《内部资料》第九期刊载的《安徽将宾馆饭店划归商业部门经营》的文章。他看后马上致函李先念，要求推广安徽的经验：是否可以考虑，将县以上各地方、各部门、各机关所建的楼、堂、馆、所，一律收归国家所有，组织房产管理处，统一管理。使用者一律按标准付给租金。这样，可以制止盲目建设楼、堂、馆、所，也可制止盲目占用房屋。

对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件反映如此迅速，刘少奇渴望早日解除自己的“心病”的想法，已跃然纸上。

## 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到

元人张养浩在《三事忠告》中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人徒知治民之难，而不知治吏之难！”为什么“治吏”那样难？答案很简单：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使国家大权掌握在皇帝和少数近臣之手，谁能保证这些人不腐败？在历史上第一个派出“监御史”监察地方官员的秦始皇，自己却修建阿房宫，修筑骊山墓，极尽奢侈之能



1966年秋的刘少奇

事，他的监御史又怎么能惩治地方官吏的腐败？

或许，刘少奇并没有读过《三事忠告》，但他面对豪华的别墅所发出的感叹，却可以揭开张养浩“治吏”何以难的难题：那就是从我做起！

刘少奇的一生都在实践着这句他没有说过的诺言！

曾经与刘少奇并肩战斗过的杨尚昆同志，对刘少奇的“他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身体力行，首先做到”的严于律己的作风感触最深。他在《怀念少奇同志》一文中回忆了几件感人的事情：

1937年10月，太原失陷，我们撤退到临汾刘村。这时，少奇同志胃病复发，吃不下饭，更加消瘦了。我们到北方局时，中央交给他几万元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如数移交给给我保管。他没有向组织要求照顾，坚持按中央的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萝卜，烩点馍，维持生活。

进城以后，刘少奇虽然长期身居高位，但依然保持了公私分明，廉洁奉公的人民勤务员的本色。杨尚昆接着回忆道：

进城以后，少奇同志对家属子女的要求是严格的，经常让孩子参加体力劳动，从不准用公家的汽车办私事。王光美同志随少奇同志出国，准备服装，少奇同志叫她到办公厅来请示我，是严格按外交部的规定办的。他家里的生活也很俭朴，平时吃饭，少奇同志的菜稍好一些，孩子们吃一般伙食标准。后来，他全家干脆在食堂包伙吃饭。少奇同志晚上吃夜餐都是自己掏钱。有一次，他发现公家为他报销了夜餐费，便诚恳地对中南海行政处的同志说：“我长期习惯夜间办公，和一般同志的情况不同，夜餐费不该让公家出。”他坚决要行政处的同志把夜餐费的单子开出来，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了。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在回忆中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感人的细节：在王光美去参加“四清”时，刘振德接管了刘少奇一家的钱柜子，在进行了一番清点后，发现钱柜子竟然只有 28.80 元钱！何以共和国主席的钱柜子只有这点钱？刘振德回忆中所提到的一张工资数额分配单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每月拿到工资后，请按下列数额分配：

1. 给卫士组 100 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其它日用品；
2. 给郝苗同志（厨师）150 元，全家人的伙食费；
3. 给赵淑君同志（保育员）工资 40 元；
4. 给外婆（光美母亲）120 元，作为 5 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它零用钱；
5. 少奇同志和我的党费每月交 25 元（当时少奇同志每月交 20 元党费，光美同志为 5 元，比规定的要多好几倍）；
6. 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需 40 元。

当时，刘、王的月工资总共有五百多元，而上述的单子的开销已超过了 400 元，所剩部分，刘少奇还经常用来帮助有困难亲朋好友。这剩余的 28.80 元还是精打细算才能

留下来的。刘振德感受到了这个只有 28.80 元的钱柜子的分量：虽然只有 28.80 元钱，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是那样沉甸甸的，因为，从这小小的钱柜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颗时刻与人民相通伟大的心。

读到此节，想必读者会与刘振德持有同样的感受的。

1959 年 10 月 1 日晚，忙完了开国十年庆典回到家里的刘少奇，又在家里召开了一次小型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他的妻子儿女和几个亲戚、本家，以及以前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事情的起因是：刘少奇的一些亲属以为他在北京当了大官，办事只要一句话、一个条子就能解决问题，于是都来找他帮忙。有的想从农村进城当工人，有的要求调工作，有的想用内部价买手表，等等。刘少奇没有帮这些忙，一些亲属便怨气十足。他趁国庆节这些人来看望他的机会，决定把这个问题讲一讲。

“今天请你们来开这个会……”他边吸烟边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嘛！什么矛盾？你们以为我当了国家主席，给你们点方便，给你们点东西很容易。但我和你们的看法不一致，这就是个矛盾。有了矛盾就要正确处理。现在解放了，在农村也好，在城市也好，生活都比过去好多了。当然马上消灭城乡差别现在还做不到。你们想请我这个国家主席帮忙，想改变自己目前的状况，甚至改变自己的前途。说实话，我要是硬着头皮给你们办这些事，也不是办不成。可是不行呀！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我手中有点权也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

“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我只能用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刘少奇 40 年前的话，在天天号召反腐倡廉的今天，尤觉振聋发聩。

四个月后的 1960 年 1 月 31 日，刘少奇又在家里开过一次家庭会议。与上次家庭会议不同的是，这次刘少奇谈的话题是“我们改造世界观从那里入手”。这次的谈话由于被王光

英记录下来，因而在“文革”中被广泛传抄。“文革”中被诬为刘少奇“六大黑论”之一的“吃小亏、占大便宜”，即是在这次家庭会上讲出来的。

这次家庭会议，是刘少奇夫妇出面邀请的。王光琦（王光美的二哥，当时为对外贸易部干部）、王光超（王光美的三哥，当时为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教授）、王光英（王光美的六哥，当时为天津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等人和他们的子女 20 多人聚集一堂。饭后，刘少奇应他们的要求谈了改造世界观等问题。他说：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有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很要紧的。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辩证的观点，是矛盾斗争的统一。不要怕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那个矛盾又会发生，要面对矛盾，揭露矛盾，才能处理矛盾。有一个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在谈到要处理好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同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利益牺牲一些，有时就要吃点亏，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点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了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心一意干工作，可能人家一时不了解，也许会说是沽名钓誉，一天看不清楚，一年看不清楚，但是十年二十年会看清楚。占小便宜，人们会看清楚的，那是蔽盖不了的，也许可以蔽盖一时，长期蔽盖是不可能的。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要丧失一部分，为人民做事，大家就会照顾。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拂去“文革”中加在这篇讲话的“市侩哲学”的尘埃，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公仆风范的人的坦荡心迹的真情流露，我们所感受的还是“那颗时刻与人民相通的伟大的心。”

## 他那颗心时刻与人民的心相通

我们在上文提到的刘少奇在湖南的 44 天的调查活动，也会使读者同样感受到“少奇同志那颗时刻与人民相通的伟大的心”。

刘少奇此次是由广州出发的。1961 年 1 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 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调整农村政策。刘少奇在全会上作了发言。他认为：1958 年大跃进以来，中央有些政策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毛泽东也在会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会议讨论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会后，刘少奇身体力行。他将调查地点选在了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长沙一带，在最基层扎扎实实地搞一次调查研究。

4 月 2 日，刘少奇一行来到了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他不顾当地陪同人员的阻拦，当即要随行人员把他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随行人员则住到了旁边的一间空猪舍里。随行人员在为刘少奇架床时，竟然找不到象样的铺床稻草。这一带本是鱼米之乡，现在竟连稻草都找不到。农村问题的严重程度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接下来的 5 天，在猪场这间破旧的饲料库里，伴随着一盏灰暗呛人的煤油灯，国家主席把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倾洒在这块曾经养育过他的土地上……

经与中共湖南省委协商，刘少奇把他调查的下一站定在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天华大队，他的居住条件稍微好了一



点：在一间长约5米、宽约3米的破旧平房里，在两条长板凳上搭了两块门板，上面也是铺些稻草；一个破旧的三屉桌周围放了三条长凳，桌上仍然是一盏煤油灯。他在这里一住就是18天！

在这18天里，白天他照旧不辞辛苦地走村串户搞调查研究，夜间又回到这里或听工作组汇报，或整理材料，或开座谈会，或找干部群众个别谈话。整个调查活动如前。但这期间发生了一件至今看来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

天华大队是一个全省出名的先进单位，一直戴着“红旗大队”的桂冠。但是，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发现，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不但与王家湾的情况一样严重，而且由于戴了个先进的帽子，反倒背上了“包袱”——不愿暴露问题的实质。事情的起因也正是这一点。

大队党支部书记彭秀梅为了掩盖问题的实质，想方设法阻挠刘少奇的调查，她发牢骚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的。”

其实，刘少奇并不留胡子，彭的说法是用当地的土话称呼，以示不满。

刘少奇则几次找她谈话，最后一次的谈话是在刘离开大队之前。刘对她语重心长地说：“彭秀梅同志，我作为国家主席，是你的

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天华大队的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但问题也不少，要总结。你们要作真正的‘红旗’，向前发展。”

说话的人一方是大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天底下最小的官，另一方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天底下最大的官；说的话涉及的是大问题：国家在农村的政策。彭秀梅表露自己态度的话虽然近于蛮横，但刘少奇明知彭的态度，居然还在临走时与她道别，并说上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接下来，这件事就有了令人满意的结局：

彭秀梅含泪表示：“我们天华大队的问题很严重，如不是中央首长来，问题发展下去，后果将更加严重。是刘主席帮我们发现了问题，我诚恳接受刘主席对我的批评。”

刘少奇当然很高兴：“彭秀梅同志这个态度很好。老百姓说我今年没有吃上红薯、芋头和鸡蛋，明年我再来一定有红薯、芋头和鸡蛋吃，我明年争取再来。”

刘少奇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的高位，对一个农村基层干部能有这样的雅量，充分证明他的人民公仆的风范，其令人敬佩之处恰在这里。十年浩劫之中，刘少奇在受辱临难时说道：“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在纪念这位伟人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重温这句掷地有声的话，其寓意不是发人深省吗！

## 欢迎订阅 1999 年《大江南北》杂志

《大江南北》主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特色：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主题深刻严肃，风格真淳纪实。

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  
大江南北杂志社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33号9号楼1楼。

邮编：200002 电话：(021)63291031

全国邮局办理订阅零售。

邮发代号：4—443。

每期定价：3.80元，全年45.60元。本社发行部亦办理订阅邮购。发行部地址：上海市茅台路690弄22号101室。

邮编：200336

电话：(021)62333247

# 十五大 在观念上的 新突破

● 任仲夷

这次我作为当选的党代表，出席党的十五大，感到很荣幸。对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我有几点深刻感受。

**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意义重大，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报告》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和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一样，其意义之重大是不可估量的。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使我们有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推倒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次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表明了我们党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心。这无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还是对人类进步事业，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这意味着全党和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循《党章》的要求，履行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坚持以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走向新的胜利。

**《报告》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有新的突破，这些突破对国有企业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将产生重要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报告》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有新的突破。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新的含义；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特别是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大胆探索公有制经济新的实现形式；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更不能把股份制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也可以发展股份制；提出要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重大突破，是对广大干部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肯定。马克思主义从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践出真知，广大群众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和创造许多切合实际的经验。党的任务，就是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以实现认识上质的飞跃。党在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方面的理论就是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



任仲夷在十五大会上

实践经验是我们制定政策和理论探索的重要来源和依据，党的政策和理论离不开群众的实践。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例子。农村土地承包是1979年在安徽省凤阳县搞起来的。当时该县的梨园公社小岗队18个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他们在一张纸上按了红指印，发誓“哪个因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悄悄干开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到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这个实践成果。1980年末，我从辽宁调来广东，当时广东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争论，各个地区在认识上尚未取得共识。如韶关地区一位领导同志对农民实行包产到户就还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必须按照党的红头文件办事，因为1980年的中央文件还是不允许农民包产到户的。从组织原则上说，他并没有错。但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和肯定农民的实践经验是对的。因为农民经过长期摸索，找到了一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发展路子。他们对发展生产有强烈的愿望。记得1981年我去仁化县的时候，张帼英同志就向我反映了这个问题，她是主张可以包产到户的。我当时对仁化县委的意见表示赞同。1981年后，中央又连续发了四个文件，充分肯定了群众的这一创造，总结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并上升成为指导农村改革

的政策和理论，我国农村从此便开始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对市场经济、公有制、非公有制等问题认识上的突破也是一样，也是来自群众的实践活动。近几年，广东顺德进行企业改革和体制改革，也有不少人看有看法，有的人甚至打小报告，说顺德已经没有国有企业了。我曾看到过两种意见完全相反的材料，一种是反对的，认为顺德没有国有企业了，而新华社内参则肯定了顺德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顺德的同志曾受到许多压力。但是顺德人最清楚地记得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讲

过的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可以大胆地去试验。所以顺德的改革没有因为压力和指责而停止。事实上，在股份制方面，一些地方早就进行尝试了。深圳宝安万丰村1984年就开始实行股份制，并取得很大的发展。这次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对广大群众的实践作出了肯定。如果说在经济改革中，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个里程碑，那么这次《报告》中这些新的突破就是在这个里程碑上添加了新的内容，成为我国经济改革新的理论。而这些突破，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是冲破阻力和束缚，尤其是冲破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禁锢的结果。这些突破对国有企业改革，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对加快经济发展将产生非常重要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确定，对防止今后主观主义、极左冒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报告》深化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理论，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已经提出，在党的十三大

报告中作了初步系统的阐述。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概念的含义,还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党的十五大报告重提初级阶段理论,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界定,既简要明确,又内涵丰富。报告对初级阶段的历史进程提得更加明确,指出“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算了一下,如果按20年为一代人来计算,几十代人,是多少年?就是少则几百年,多则一、两千年,即社会主义的进程需要千多年。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过去,不管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把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看得太容易,把它看得轻而易举。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就说过:“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还只有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可见,列宁当时曾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只须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建成了。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就完全放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顾苏联实际,违背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客观规律,想要早日建成社会主义。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看得更简单,他把当时的苏联称做发达的社会主义,并宣称20年就可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1957年访问莫斯科期间,看到苏联提出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便提出我们要用15年左右工业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而改为“7年赶上英国”,会后不久又认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年到3年。并在一个讲话中,提出让苏联先宣布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后宣布。他甚至把办公共食堂视为进入共产主义前沿阵地的标志。“大跃进”时期,山东范县(今属河南)县委的一个文件提出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批转了这个文件。他们几个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看得太简单,一个比一个看得更为轻而易举。过去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缺乏认识,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

脱离实际,做出许多违反客观规律的蠢事。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中,提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结果是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等,主观蛮干,违反客观规律,造成了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许多现在听起来很可笑的事,其实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人民流出的血汗和泪水,教训极为沉痛。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变化必须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的变化相适应,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是我们却往往在这一基本常识问题上犯错误,因而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十五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确定,对防止今后主观主义、极左冒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把握住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而不能实行别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同样,我们考虑其他各种问题和制定各项政策,也必须从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坚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再不能做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

**在经济改革问题上,不要乱扣“自由化”的帽子,要防止以“左”批右,决不允许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我认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严格说是不确切的。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特定含义的。**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中央曾发出4号文件专门谈这个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提得多些,近年来似乎没有重提过。这次十五大报告重提反自由化问题。我理解因为报告重提了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才又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党中央曾强调,经济上不能反对自由化,而在政治上不能搞自由化。至于什

么是自由化？怎样去反？应注意什么问题？报告均未提及，也没有再提到中发〔1987〕4号文件的内容。我认为4号文件是一个重要文件，文件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围、重点、政策界限、方法等都讲得很清楚，指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特定的含义，明确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在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中央强调政治上反自由化，但经济上不能反，不搞政治运动等。这些提法，在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使我们能够继续搞经济方面的改革。否则，经济改革就会遭受挫折，整个经济形势就不是今天这个局面了。现在重提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中必须十分明确和清醒，尤其是在深化经济改革，在经济改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的时候重提反自由化，应该重温一下中央1987年的4号文件，认真执行这个文件的精神，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自由化。特别是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不要乱扣“自由化”的帽子，要防止以“左”批右，决不允许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妨碍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我认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严格说是不确切的。无产阶级也不能搞自由化嘛！尽管我们讲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使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外国人看了不懂，觉得奇怪，人家会以为中国人为什么要反对自由呢？而在我们内部，如果不了解它的特定含义，很容易使群众甚至干部不了解“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干部有多少能说得清楚的，说不清楚也就难以把握得好，甚至又犯扩大化的错误。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就允许无产阶级自由化吗？实际上，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都没有搞自由化的。

《报告》强调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当前和今后的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我们要谨记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问题上，不是同等对待的，他强调的主要是

防“左”。这是对我们党内情况、对我国国情深刻了解，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几十年犯的 error，主要是“左”的错误。我认为，在我们党内思想上，“左”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以致造成巨大危害，致党于危难的境地。而右的思想还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党内不少同志长期以来都以为“左”是方法问题，右则是立场问题，怕右不怕“左”的恐右症至今还束缚着许多干部的思想和手脚，所以消除“左”的思想影响仍然是当前和今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必须看到，现在还有人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方式，散布和宣扬极左的思想，甚至把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说成是右倾。对此必须引起特别警惕，绝不可等闲视之。

**《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部份提出，我是没有想到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如不能同步进行，但也不能过于滞后。**

《报告》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部分提出，这一点我是没有想到的。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会议、文件中都没有提过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次省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稿中也根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词。我提了意见，后来加了“政治改革”四个字。我感觉既然采纳了我的意见，我就表示满意了。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对的。对内对外都不好。对内来说，会使人们想为什么不提政治体制改革了？对外来说会引起各种猜测，甚至恶意攻击。邓小平同志逝世后，中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中没有提及，恐怕不是无意漏掉的，在江泽民同志致的悼词中却讲到了，这也不是无意加上的。十五大前，一位起草报告的主要负责人来看我，我提出了要写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同时还提了不应把封建主义视为残余的问题。今天高兴的是，在十五大正式报告中看到那么重视这个问题，讲了那么多，而且作为一大部分来讲，想必是经过中央研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报告中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虽然不象经济改革问题那样有新

的重要突破，但把过去曾经提过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重新提出来，特别是提出要进一步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非常重要。如在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加强监督，建立监督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以及人事制度的改革等方面，都需要进行大量工作。尤其是在精简政府机构这个问题上，再不能象过去那样，精简一次，庞大一次，越精简越庞大的恶性循环了。我国的政权机构，恐怕是全世界最臃肿庞大的了，已经到了再不精简就难以运转的时候了。

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但要在经济改革上贯彻邓小平理论，在政治改革上也要贯彻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很丰富，包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军事等方面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本应同步进行，如果不能同步进行，为了稳妥，可使经济改革先行一步，但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否则就会严重制约经济改革和发展。事实上，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好。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报告》有意识地突出了对封建主义危害的批判，这是基于几十年实践的总结和认识的结果。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在很多领域中影响和阻碍着我国的进步和发展。**

《报告》在讲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问题时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这是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几十年来第一次把封建主义影响放在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之前来提出，而且没有讲封建思想是残余。我认为，这决不能把它视为一般的文字排列，不能认为是随意地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先后颠倒和简单的词句的改变，而是有意识地突出了对封建主义危害的批判。这是基于几十年实践的总结和认识的结果。我们推

翻“三座大山”后，以为封建主义已经不是前进的主要阻力，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资本主义。因此，一直以防止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主，封建主义只视作思想残余。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从城市到农村，甚至在没有商品经济的山沟里也开展对资产阶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相反，在不少问题上，却常把封建主义思想当做无产阶级思想，用来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实在荒谬之极。

由于长期放松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因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如家长制、长官意志、一言堂、终身制、论资排辈、等级观念、宗派观念、小生产习气等等，在很多领域中影响和阻碍着我国的发展与进步。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许多问题大都是根源于此。事实证明，我们现在进行的各项改革的阻力，最根本的仍然是封建主义。我认为，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几十年来都把封建思想视为残余来对待，是值得反思的。在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绝不可忽视对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在警惕右，防止“左”（主要是防“左”）的同时，还须把反对和批判沉淀在诸多领域中的封建落后的东西，做为一个重要任务。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我认为，不能一提资产阶级思想就认为全部都是腐朽的，否则如何解释资本主义至今尚未灭亡，其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还在发展呢？我们也不能说它已发展到最后阶段，不能说它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应当承认，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中，即使是阶级社会，有许多思想是没有阶级性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种对当今社会的各种思想都钉上阶级标签的说法和做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对资产阶级的腐朽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对其文明进步的方面要学习和借鉴。不仅在科学技术、管理方面要借鉴，而且对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经验和做法也应该学习和借鉴。

（本文是根据任仲夷同志在十五大广东代表团小组会上三次发言归纳整理的，并经本人审订。原载《广东党史》1998年第3期）

（谭一鸣、肖燕明、刘子健整理）

# “农业学大寨”的沉重教训

● 吴 象

大寨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进而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通过“农业学大寨”和后来的“普及大寨县”，人民公社体制“左”的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使人民公社否定了自己而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取代。

毛泽东为什么要树立大寨这面红旗呢？从前前后后的许多事实判断，大概因为毛泽东经过长期的选择、比较，认为大寨充分体现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体现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正确性，体现了个人崇拜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体现了反修防修的重要性。早在50年代合作化高潮时期他就说过：“只要有一个办得好的合作社，就可以把反对合作社的一切怪论打下去。”60年代前期，经过1959年庐山上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经过1972年七千人大会的暗中较量，他一定更需要一个办得好的人民公社，一个有说服力的典型。

## 从普通的丰产典型到农业战线的红旗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一个普通的小山庄，后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为丰产的先进典型。但作为先进典型也是个普通的典型，不用说全国，省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1955年毛泽东亲自编辑了一本名为《农业合作化

高潮》的大书，审阅了大批全国各地送来的典型材料，从中选出184篇，亲自动手编辑，不少还改拟标题，撰写按语，其中有山西的18篇，却不见大寨之名。

1963年8月2日，大寨遭到一场毁灭性的特大灾害，连续七天暴雨，山洪倾泄而下，经过10年辛劳垒石闸坝造成的沟坡地、“大寨田”毁于一旦，庄稼不是淹没就是倒伏，房屋十室九空，梁倒墙塌。谁知大寨从此却扶摇直上，变成了超过全省全国一切先进典型的政治红旗。遭灾后，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领导社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战胜了灾害，恢复了生产，而且响亮地提出了“三不要”（不要国家救济的钱、粮、物）、“三不少”（向国家交售粮食、社员口粮、留的种子饲料不少于上一年）的口号，后来总结出“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大寨在大灾之年没有减产，反而每亩增产到800斤，按《农业发展纲要》的标准，已经“过长江”了，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陈永贵跑到太原，通过一位昔阳老乡找到另一位昔阳老乡——省委副秘书长毛联珏，反映了灾后的变化。毛联珏高兴地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紧接着他就报告了省委书记陶鲁笏，陶又在全省电话会议上热情地加以表扬。省报作了长篇报道，还专门为此事发表了社论。

当年11月间，中南局候补书记李一清到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这位老共产党

员是昔阳南关人，距大寨只有10里路，小时就熟悉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山庄。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期间在山上打游击，曾任太行行署主任。听到大寨的事迹，会后赶回家乡去参观访问，看后深受感动，认为这是自力更生的典范、建设山区的榜样，值得大大推广。他到太原同老相识陶鲁笳谈了观感，又到北京写专题报告向中央反映。后来回到广州，遇到国家计委副主任王光伟，他原来是准备去四川考察的，听到李一清的介绍也大受感动，竟改变行程，专程到昔阳大寨来住了好几天，回京向周恩来总理作了口头汇报，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分别写了书面报告，邓小平、



陈永贵

彭真阅后也连连称好。从此大寨的事迹便逐渐在中央决策层传开，陈永贵的名字也开始出现在中南海的某些会议上。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和另几位著名劳模，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一身庄稼人打扮的陈永贵，头上还扎着白毛巾，在主席台上一亮相就引起全场听众的惊讶。一个农民，第一次到国家级的讲台上讲话，一开始难免有一点拘谨，但他很快就适应了，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什么老少组与好汉组，什么三战狼窝掌，什么自力更生十大好处，他如数家珍，讲得头头是道。尽管他不识几个字，却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坏事变好事、精神变物质这些新学来的名词，他都能理解并用他讲的生动事例融汇贯通起来，使这些听惯了大报告的北京人完全被镇住了。

接着，新华社记者宋莎茵、范银怀奉命到大寨采访，要写一篇向全国广播的长篇通讯。副社长穆青亲自到太原进行具体指导。2月24日，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向全国播发，《人民日报》专配了一篇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山西日报》记者张丽泉、郝占敖汇集了省报写的一些报道，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大寨的书：《大

寨精神大寨人》。

1964年3月28日，毛泽东南下视察，专列开进河北省邯郸车站，在此作短暂停留，把河北省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和山西省负责人陶鲁笳找来座谈。陶鲁笳抗日战争初期曾任中共昔阳中心县委书记，几次去过大寨调查，情况很熟悉，汇报既详细又生动，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便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陶鲁笳在纸上写清后，毛说：“听说过，报纸上有篇文章，我还没有细看。”随即让秘书把发表《大寨之路》的那张人民日报找来，继续听陶鲁笳汇报。他还插话说：“山沟里出了好文章，陈永贵识字不多，做的事情可不少！”据说毛主席视察路过各省，都谈过大寨的事，说过大寨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话从毛泽东的嘴里说出来，分量当然就不同了。1964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靠自力更生，要多出几个大寨，多出几个陈永贵。”随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靠大寨精神》。

1964年5月，农业部长廖鲁言亲自带领了一个工作组，到大寨蹲点考察了20多天。他充分肯定了大寨的经验，又调查了昔阳与



大寨气候、地理、土质条件不同的几个典型，互相做了比较，指出大寨的某些不足之处。他语重心长地说：“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是中央决定的，主席和总理说了话的。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他风趣地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臣过去是你们的老师，畜牧业搞得很好，现在他学你。过几年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频频笑着点头。廖部长接着说：“总理派我们来调查，就是让大家来学的。但先进不是一切都先进，各部门都要求大寨来个第一，根本不可能。这样会把大寨搞垮。千万不要搞垮了，不要把自力更生的牌子砸了。”

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大寨这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并对大寨精神做了概括：“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是中央领导人对大寨的权威的评价，经常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被引用而为人所熟知。但毛泽东选中大寨这面红旗，似乎更有其深意所在。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毛泽东一生很少请人吃饭，这次生日小聚可说是特殊的例外。应邀出席的有大寨代表陈永贵、大庆代表王铁人、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家耕。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餐厅，品字型地摆了三张桌子。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嘱托，特意把四位劳模和钱学森安排在毛那一桌上，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大区书记分别坐在另外两张桌子上。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同几位劳模碰杯。他还亲切地问这几个人的年龄，问到陈永贵时，陈回答：“50岁。”

“噢，50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接着，毛又感慨地说：“贾进才举能让贤，才使你露出峥嵘。这种事历史上有过，但确实少。”据董家耕后来整理的这一次活动的记录

看，便宴中没有谈到农业学大寨的事情。但是大寨成为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却因此而确定无疑了。

## “农业学大寨”使大寨日益自我膨胀

1966年8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了，震撼全国全世界的风雷激荡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文件强调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寨这80多户偏僻的山庄从此代表了未来农村的理想世界，成了“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圣地。此后十几年中，全国有700多万人次各级农村领导和基层干部及农民代表，不远千里、万里来此朝圣。还有134个国家和地区2288批国际友人，25478位不同肤色、不同国籍和不同信仰的外宾登临大寨的虎头山。最多的一天竟接待过50批外国的客人。其中不少是国家元首一级的大人物。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大寨红旗高高飘扬，陈永贵由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变为公社、县、地区和省级领导干部，数年之中升为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他仍然是一身农民打扮，头上还扎着白毛巾，频频出现在电视镜头上，这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中国幅员如此之大，农村的自然条件、经济条件千差万别，只树一面红旗，只学一个大寨，这种作法本身就不科学，不实事求是。廖鲁言在大寨蹲点调查时，新华社记者、《大寨之路》作者之一范银怀始终同调查组一起活动，晚饭后大家在坡梁上散步，他有机会多次与廖闲谈，廖曾对他谈过这个看法。大寨社员的艰苦劳动使廖鲁言很受感动，他对耕作上的“三深法（深耕、深翻、深种）”，“三保田”（保水、保肥、保墒），“海绵地”，“大寨田”等所表现出来的创造精神深为赞许，但对陈永贵和党支部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强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做法以及自报公议的评分办法却持

保留态度。

这种“自报公议工分”，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初级社时期，大寨的劳动记酬方法是“死分活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初期，实行定额管理，按件计酬。这个办法对调动社员积极性，提高劳动工效和农活质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定额太多，过于繁杂，影响干部参加劳动。1960年由繁到简，改为“农活分项计酬”的办法，这种办法基本上体现了多劳多得，社员还是比较满意的。1963年遭灾后，全部取消了劳动定额，实行了“标兵工分，自报公议”，评议时间也改为一月、一季或一年一评，简便是更简便了，社员民主权利却更少了，切身利益更受干部支配了。廖鲁言对此作过详细调查研究，担心长期下去社员的积极性能否持久。这时文革将临，突出政治成为风尚。陈伯达没有去过大寨，得知此事后却作了一次“关于大寨评工记分的谈话”。对此大加推崇，竟说什么“大寨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情况的新办法，是中国农民土生土长的新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是世界最好的办法，有普遍国际意义。”而农民却把这种评工办法称为“大寨工”或“大概工”，并不高兴。因为工分的多少关系到农民的直接利益，每天争吵固然不好，“大概工”实际上助长了平均主义，否定了“六十条”中规定的按劳分配、定额记分的政策，农民认为是夺走了他的“命根子”。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当时大寨还是个艰苦奋斗、建设山区的好典型。文革兴起，大寨成为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之后，日益政治化，也日益自我膨胀，自以为一切正确、一贯正确。1967年初，陈永贵被“造反派”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的好标兵”，参与了山西省和晋中地区及昔阳县的夺权，变成一个“造反派”头头，一直是昔阳县掌握实权的第一把手，成为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权势更为显赫，他同时兼任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各级的党政领导职务，而以大寨和昔阳为基点。在大寨和昔阳，一切由他说了算，他不点头，什么事也办不成。

## 从“农业学大寨”到“普及大寨县”

1970年夏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是有14个省市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也是农业学大寨的一个新起点。会议前夕的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昔阳从一个大寨大队发展为大寨式的县，粮食亩产过‘纲要’，其经验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县的范围内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社论还引用毛主席在一封信里的话：“昔阳能办到的，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这一句话，以后到处传播，给各地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在这次会议上，昔阳县革委会把解决“五种人”掌权，整顿农村基层领导班子问题，作为建设大寨县的一条重要经验，向全国介绍推广。所谓“五种人”指的是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被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即民主派。陈永贵经常说，“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1967年在昔阳夺权后，从冬季开始通过整党的形式，解决了五种人的问题。实际上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人为地制造各类“反面典型”，随意整治。当时以“五种人”点名批判的基层党支部主要负责人有117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陈永贵对可能危及他的声望和权力的人越来越猜忌，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加以批判和打击，把大寨和昔阳变成不许有任何反对声音的“独立王国”。昔阳建成大寨式的县，为毛泽东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样板，证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方针的正确性。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原来确实比较好，但后来夸大为“一、二、三”制度（即县级干部每年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劳动二百天，大队干部三百天），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却被推崇为反修防修的根本制度，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有力的支持。

昔阳建成大寨县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就

发展为普及大寨式的县，不仅农业要学大寨，工业、财贸、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得学大寨。反大寨、不学大寨、假学大寨者被视为阶级敌人，加以迫害。此外，还有什么卫生学大寨、邮电学大寨、文艺学大寨、民兵学大寨等等。

在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那些年，最响亮的口号是“大批判开路”、“大批促大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翻开报纸，几乎每天至少每隔几天都有关于大寨和昔阳的大块文章、大字标题，成为文革大批大斗中的一个突出的景观。新华社《文化大革命促进学大寨运动》的述评指出：“大寨不是个生产典型，而是所有制变革以后农村如何继续革命的一面旗帜”（1975年8月31）；人民日报10月21日社论：《普及大寨县》，强调学大寨要真学，真学就是抓根本，抓阶级斗争，要敢批敢斗。真所谓连篇累牍，使广大农村变成了斗私批修的大学校、大战场，天天大批判，处处搞斗争，造成了一种紧张、恐怖的气氛。在大寨，社员和干部谁也不敢对领导提意见，不敢向上级和外来的人谈论任何大寨的事情，后来干脆不许参观来宾和记者与社员接触。陈永贵经常说，吃吃喝喝中有阶级斗争，说说笑笑中有阶级斗争。许多人由于牛死马伤，说闲话，开玩笑，打扑克，戴手表，穿花衣服，顶撞干部而被扣工分、挨批斗、甚至被拘留。来大寨参观访问的人那么多，每天车水马龙，表面上轰轰烈烈，内部却是万马齐喑，谁对谁也不敢随便说话。

## 所谓“新套套”实际是“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

陈永贵夸耀大寨每年有个“新套套”，实际上往往是“左”倾错误的恶性发展，最突出要算“割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

大寨这个原来只有78户人家的小山庄，是个独立核算单位。说它是小队，是个大小队，说它是大队又是个小大队。公社化后一直

是大队核算，其实同一般生产队（小队）核算规模差不了太多。1963年遭灾后，新建的住房全由集体修建，从此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后来管理进一步加强，几乎是完全限制了社员发展各种家庭副业，没有户养的猪羊，不准社员到集市上出售农副产品。所有这些，都有大寨当时的具体条件，也同“大寨工”一样，有个演变过程。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这些便变成中央的政策向全国农村推广，发展到荒唐的程度。除了集体分给社员的粮、钱、物以外，凡是个人增加的东西，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当做“尾巴”加以割除。1970年，昔阳把全县到外地搞运输和其他副业的几千名劳力、几百辆马车收回社队，向全国介绍了“车马归队、劳力归田、大砍运输业”的所谓经验。有些大队只允许“一户一猪一树”、“一人一鸡一兔”，超过的都得割掉。“割尾巴”过程中，大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解释越来越五花八门，城关公社作了七条总结：“（一）搞农业是社会主义，搞工业是资本主义；（二）农业收入高于工副业收入是社会主义，工副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是资本主义；（三）公社搞是社会主义，大队搞是资本主义；（四）集体搞是社会主义，个人搞是资本主义；（五）在本地搞是社会主义，到外地搞是资本主义；（六）直接服务于农业的工副业是社会主义，和农业不能直接挂钩的是资本主义；（七）不赚钱或少赚钱的是社会主义，“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的是资本主义。”可谓把一大二公越大越公的“左”倾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后来又提出什么“批判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把“批资、堵路、割尾巴”从集体外部转入内部，推向新的高潮。普及大寨县的口号提出后，“割尾巴”、“取消自留地”、“穷过渡”更由昔阳而山西而全国，危害更大。

十年文革中波澜层迭，大起大落，变幻莫测。今天这个人打倒那个人，明天那个人又被另一个人打倒，不几天，连续打倒别人的又被别人打倒，像变戏法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大寨始终红旗不倒，非常能适应政治气候

的变化。大寨什么时候都正确，都能代表农民理直气壮地开展批判。哪怕昨天还在向你顶礼膜拜，学习、致敬。今天风向一变，一被打倒，立即掉转枪口反目相向，开展无情的大批判，上纲上线比谁都厉害。陈永贵出身贫苦，是种庄稼的全把式，能吃大苦，耐大劳。但他与一般农业劳模不同，机敏过人，能说会道，在旧社会做过小生意，当过维持会的代表，参加过伪组织“兴亚会”，是农村中的一个大能人。他掌握昔阳县的大权以后，那些曾经支持、爱护、培养过大寨的大批各级领导人，都被他以旧的成见或新的标准指斥为“砍旗”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连陶鲁笏总结大寨经验的文章，也遭到无情的批判，说文章居然“一字不提大寨红旗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树立的”，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公然篡改大寨精神的砍旗能手。”夺权后，原省委、地委领导全班人马被揪到大寨残酷批斗，省委副书记赵玉亭被扭断胳膊，副省长刘开基大叫：“快给我一枪毙了吧！”地委副书记苗枫被踢破膀胱，不久就死去了。陈永贵坐在主席台上，一声“小将们上！”造反派立即蜂踊而上拳打脚踢，无法躲闪。有的被害者十几年后谈起当时的场面，仍然心有余悸，不胜感慨。

大寨的水土治理和新农村建设在“左”倾时期农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能不对这自力更生的样板表示钦佩。大寨人特别吃苦耐劳，劳动强度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的辉煌成就并非完全来自于自力更生。大寨成名后曾得到昔阳县大批机关干部、工矿工人和兄弟社队在劳动力上大量的无偿支援，还有个固定的“长工队”，即大寨接待站的六七十个工作人员，每年要投工四千多个。大寨境内有六个蓄水池，只有一个小的都是自己修建的，其他五个和十多里长的渠道、涵洞、渡槽，都是县、社专业队、机关干部和解放军分别帮助修建的，总投工达七万多个。三百多间瓦房和一百多孔窑洞，大部分也是雇佣外来劳力修建的。昔阳建成大寨县，强调要算“政治账”，实际重搞“一平二调”。很多大工程集中在公路边，集中到几个先进队、参观点

上，为数众多的公路线以外的小村、山庄、穷队负担很重，得益甚少，面目改变不大。由于昔阳成为大寨县，也就从地区和省里得到了更多无偿的支援。昔阳县从1973年到1977年虚报1亿3千6百万斤之多。1977年末，联合国粮食考察团去昔阳考察，听说皋落大队搞得不好，就去了皋落，这里粮仓有10万斤玉米，但颗粒小，不中看，公社连夜让社员从公社粮仓借200麻包送到皋落粮仓充数，把原10万斤小粒玉米说成是饲料粮。

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对“大寨”和陈永贵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作为日益反感，带头揭开这个盖子的是一位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1978年7月，中国农学会在太原召开全国农业科学大会。会后他率领一批棉花专家、小麦专家、玉米专家、畜牧专家、水稻专家、园艺专家、植保专家、土壤学专家去大寨参观，经过实地考察，结果大失所望，认为没有树木、没有畜牧，也说不上综合经营，不符合农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回京以后，他以农业经济学会的名义，先后组织了有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作了进一步的研究。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的小组会上，他尖锐地提出：“我认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这一发言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得到绝大多数政协委员的支持和赞扬，一位来自大寨的委员却大吵大闹，农业部党组的一位负责人竟说：“老杨，你这个发言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说的，你不应该说。未经部党组同意，一切后果由你个人负责。”而且要他去向大寨那位委员道歉。杨回答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农业科学家，我要对八亿农民负责，讲出真实的情况。如果再捂盖子，我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盖子一经揭开，就再也捂不住了。到1980年，揭发、批评大寨的报道先后陆续见报，夏秋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使那些因吹捧大寨而平步青云的人变得惶惶不可终日，山西省委终于不得不就此写出检查报告。11月23日，党中央批转了这份报告，批语中说：“‘文

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对于大寨,批语中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先进的典型,周恩来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在全国的推广,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

大寨模式不仅同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而且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但教训必须深刻记取。当年有一个提法:“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搞农业”,在昔阳甚至山西一度颇为流行。这是大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全部经验的精髓所在。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已

经是二等公民,经过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想当二等公民也不可得了。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损失最重的是农业,受害最深的是农村,牺牲最大的是农民。许多农民付出了温饱和生命的代价,换得了年年“丰收”的虚假数字,维持着所谓的“大好形势”。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为133.57元,比1957年仅增长60.62元,每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90%,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同时,还有2.5亿多人口尚不得温饱。当时有一份关于某个贫困地区的报告曾经指出,过去我们不仅剥夺了农民的财产,也剥夺了农民的自由。这是造成农民贫困状况几十年改变甚少的两个重要根源。

(责任编辑:吴思)

## 祁所长门诊信箱

祁所长:

我今年69岁,男,退休后在家里看孩子。医生说我血粘度增高。请教祁所长,血粘度高有什么危害?应该注意什么?

高文波 98.11

高文波先生:

你的血粘度增高,心里着急。血粘度高是一种病。在得病早期,可有以下症状:

**晨起头晕,晚上清醒。**血液粘度高的,早晨起床后即感到头脑晕乎乎。到了吃饭后,精神状态最好。

**午饭后犯困,**血粘最高的人午饭后马上就犯困,需要睡一会儿,精神状态明显好转。

**蹲着干活气短** 血粘度高的,人下蹲困难,有些人根本不能蹲着干活,或者蹲着干活胸闷气短。

**陈发性视力模糊** 有些中老年人平时视力还可以,但经常有暂时性视力模糊状态。

如果中老年人存在上述症状,说明血粘度升高,应该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

血粘度升高,血液流降低,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容易使血栓形成。造成严重后果,即脑中风和心肌梗塞。危害生命。

高文波先生,请你对血粘度升高的严重后果有所认识要进行积极的治疗。饮食要注意营养平衡。要杂食,不要偏食。以素为主,荤素结合。注意一日三餐的食量,不要吃得过饱,八成饱就可以,尤其晚餐更要以少为好。注意持之以恒的锻炼身体。精神愉快,不要生气。

最后请你及早服用生命源DHA降脂胶丸,一日三次,每次一丸,在饭前半小时服用,吸收好。当你一个疗程(一个月)过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当你体会到降脂胶丸的益处后,最好再继续服用两个疗程。

祝

一切顺利

研究所 98.11

地址:海淀区东王庄27号楼生命源保健品

祁所长

电话:(010)62351917 (010)62044313

联系人:刘大夫 邮编:100083

# 革命党谋炸袁世凯

● 王光远

1912年1月16日，在北京东华门闹市区发生了一起革命党人谋炸袁世凯事件，此事震惊中外，成为中华民国开国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后，袁世凯再次出山，担任了内阁总理，他一方面利用革命党的势力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一方面又挟清廷势力让革命党人交出政权，使中央大权落入自己手中，然后再登大宝，实现其皇帝梦。他把这套“掉枪花”的作法称之为“拔树”策略，他对人说：“要想拔树，光用死劲，树是拔不起来的。只有将树左右摇晃，等它的根部松动，不用大力，一下子就拔起来了。”

革命党人认为袁世凯是靠出卖戊戌变法而得宠的，根本不可能支



彭杨黄张四烈士墓

持革命。他这次出山后，一面向隆裕太后许下了“岂忍负孤儿寡妇”、“一定主持君主立宪”的诺言。一面残酷镇压北方的革命运动，大肆捕杀革命党人。

为了刺杀袁世凯，革命党人专门成立了北京暗杀团，并准备好了手枪和炸弹。张先培还带领众人在北京龙泉寺隆重宣誓，大家皆抱着必死的决心参加暗杀活动。15日，张先培得到了袁世凯第二天要去早朝的消息，于是连夜在荆州会馆召开紧急会议，做了具体布置。他们扮成茶客、酒客，游弋于东华门、王府井两条大街之间，

16日11时3刻，袁世凯退朝，带领大批护卫出东华门向东而行。当马车来到三义茶馆时，张先培立即投出炸弹，因车速较快，没有投中。袁世凯惊魂未定，黄之萌等又从祥宜坊酒楼中投出炸弹，护卫管带袁金标当场被炸死，内卫差官杜保炸成重伤，不久亦死，随从差官申明善受伤。另炸死亲兵二人、行人二人。袁世凯马车左侧辕马受伤，但未倒下，车夫刘二，为人比较机警，看到情况危险，立即驾车速逃，接着在枪战中，因众寡不敌，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等十人当场被捕。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被杀害。张先培，贵州省贵筑县

人，陆军测绘学堂毕业，由罗明典介绍加入共和会北京分会，生前在军谘府测地局供职。黄之萌，贵州省贵定县人，与张先培同学，曾参加过河口起义。杨禹昌，四川省资中县人，经黄复生介绍加入同盟会，后又经彭家珍介绍加入京津同盟会。黄之萌临刑前留下一首壮烈的绝命诗，最后两句是：

红点溅飞花满地，层层留与后人看。

1912年8月，孙中山来到北京，将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烈士和炸死良弼的彭家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三贝子花园（万牲园），谥为“四烈士墓”，供人凭吊。孙中山亲自参加了迁葬仪式，并给予四烈士以高度评价。后来，胡适为歌颂四烈士的高风亮节，写下一首“四烈士歌”：

他们是谁？三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成功的好汉。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他们不能咬文嚼字，他们不肯痛哭流涕，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

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他们用不着纪念碑，他们用不着墓志铭，死文字赞不了死汉。

他们的纪功碑，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责任编辑：陆迈）

# 毛、刘分歧 与 “文革”的发动

● 曹英

##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

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3年困难时期已严重地暴露出弊端，为了公开而比较彻底地纠正其错误，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毛在1月30日的会上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说：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的这个自我批评并不深刻。当他听到刘少奇在会上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的批评，对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估计，特别是对三面红旗所明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毛表现出非常不满。刘在讲话中说：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

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

刘在家乡湖南宁乡县花明楼作过调查，早就提出“人祸”是造成全国大多数地方困难的主要原因。刘在七千人大会上更对三面红旗提出保留意见，说：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 毛泽东 要维护“三面红旗”

毛所谓承认错误，是指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 error，对“三面红旗”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认为这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法宝。错误只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中央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线、任

务有什么错误。因此，他对刘的批评十分不满，突然在自我批评后，借谈民主、集中问题话题一转，出人意料地提出：

“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毛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强调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模式，并且毛在这里更是强调“高度的集中”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前面以民主的姿态所作的自我批评大相径庭。毛这里隐晦提出的严厉警告，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才拨开了云雾，此时刘已被打倒。毛说，我们党内的斗



毛泽东来到红卫兵中间

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 邓小平说,要树立领导核心,根本办法是搞民主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请陈云“出山”,主持计划经济的管理工作。在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将七千人大会没有涉及或未充分展开的经济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尤其是对经济困难的局面作了充分的估计。陈云提出,农业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基建规模摊子过大,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刘少奇则在会中的插话和会议的结论报告中,

讲得更为深刻、尖锐:

“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紧接着,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的工作会议,进一步部署调整计划。刘在讲话中要求以唯物主义态度看待困难,如果对困难认识不足,自己安慰自己,又不积极采取措施克服,那是真正的右倾。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强调,一要对干部进行甄别平反,调动积极性;二要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根本办法是搞民主”。

1962年7月至9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首先对刘少奇等对形势的估计提出批评,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11月,毛泽东又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揭露黑暗,人们是不喜欢看的,鲁迅把它叫做谴责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人们爱看,因为它有希望嘛。《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它的淫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揭露黑暗。会上,有的同志说,‘三面红旗’究竟打不打?现在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了。有的同志说,大跃进似乎很难开口了,简直就不好提了……。”

对此,刘少奇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 邓子恢与“单干风”

所谓“单干风”，是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率先在该省试验的一种“责任田”，即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田家英等对此非常热情，毛却甚为反感。认为这是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一再地对“单干”进行批评，甚至是严厉指责，说现在刮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毛还从中寻找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对象来，并成了毛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毛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

毛泽东对“单干风”可谓刻骨铭心，把它归纳为“三自一包”（工商业自负盈亏、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业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邓子恢由此一再遭到严厉批判，连他担任部长的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田家英亦遭批判，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曾支持责任制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受到毛泽东的指责。

1963年2月，金日成来访时，

毛对此事袒襟露怀地对他谈得更多，更深入。

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同高岗、彭德怀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那么回事。……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譬如，彭德怀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这些人总是想复辟的……”

“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这样中国人民是会感谢你们的。”

毛泽东后来还多次向外国党的领导人讲过类似的话，进行“吹风”，逐渐将矛头引向中央上层。

## 毛泽东说 中国要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

“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一定会出马列主义。”

在全会最后通过的会议公报中，毛泽东对其作了精心的反复的修改，充分反映了毛对党内特别是中央上层中有关阶级斗争的一些考虑：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

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 毛、刘严重冲突

毛泽东在发现“修正主义”就在党内时，便说服全党接受他在全中国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并进而发展成为“挖修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作为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重要措施。这场从农村开始的政治斗争强化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绝对化和“合理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解决农村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作出研究和安排。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及社教运动如何进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成为两人政治关系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12月2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这一

问题上，毛断言：“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住了问题。”刘一再坚持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毛强调：“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交叉的教育运动。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次年1月5日，毛泽东再次对刘的观点进行批评，并严厉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明白地指出，“走资派”指的就是那一部分老干部。关于社教运动

如何进行，毛批评刘提出的秘密扎根串连、大兵团作战、不能依靠干部等作法是形“左”而实右，认为这样搞打击面过宽，会出现一个“左”的潮流。

1月3日晚，毛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尖锐地批评刘的这种运动搞法，当天，是三届人大选举刘为国家主席的日子。毛说：

“四清工作队集中大批人员，是搞人海战术；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搞繁琐哲学；反人家的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扎根串连，结果冷冷清清；搞四清运动一是不读文件，二是不管人多，三是不管那样扎根串连，要依靠群众，清少数人，有则清，无则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因此，毛在经其重新审定、修改的会议文件《二十三条》中对刘少奇进行十分严厉的指责，并进行定性：“不说是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

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在此次会议前后，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件和插曲，也反映了毛对刘的不信任、不满已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11月底，毛泽东针对他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效果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干部下去的情况，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邀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席间毛指责刘少奇



王光美在迎接刘少奇骨灰的专机上

关于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实际上指邓小平及其书记处、李富春及其主持的国家计委）。毛并提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前几日上同刘少奇的争论及会前邓小平好意请其不必出席一般的汇报会，怒气冲冲地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我要求要有言论自由。”

时任中组部长的安子文受多数党内领导人之托，找刘少奇谈话说：“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你要多考虑，对主席可不能不尊重。”接着，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在会上作了检讨，表面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运动不再不一致了。但刘为这种为维护毛的威信，无条件地退让和服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由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时提出警惕匈牙利事件到60年代初防止修正主义，再到这时一再提出警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直到提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要打倒刘的决心已难动摇了。

## 刘少奇非常被动

1966年4月下旬，刘出国访问回到北京。此时的国内，已是政治运动箭在弦上，《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彭真已被打倒，高校造反学生，有“星火燎原”之势。刘的处境十分为难。政治人物开始大分化、大改组，以前曾追随刘的陈伯达、王力等都急剧“左”转，迫不及待地要与他划清界限。

《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尽管这是针对《二月提纲》而提出的一个“通知”，

但已经很明显，毛提出了对“文革”运动的总体设想、斗争目标、运动方式等内容，并将斗争对象不仅仅是指向彭真等人，而是对着中央一线。因而可以看成是毛号召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动员令”。毛泽东在文件中加写了几段极富个性与尖锐的又带有指针性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林彪18日的讲话则告诉人们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毛泽东确认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有发生反革命改变的可能。林彪透露，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后来，毛自己在1967年2日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就明白无误地介绍说：“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我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所以，你们才能到处走，我们也能到处走。”

## 毛、刘摊牌

毛对中央第一线的猜忌、不信任已达到顶点，但在党的体制下，从

组织上合法地清除刘少奇等人，毛没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希望以群众盲目的政治热情和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神”的形象及多年来形成的国内阶级斗争环境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在领袖与群众之间联系的纽带就是有着特殊身份的林彪、江青、康生等“左派”，因此，毛先后给这些人交过底，“左派”有了“尚方宝剑”，怀着天将降大任于他们的喜悦心情，抱着“舍我其谁”的志向，在群众中制造对现行秩序的冲击，使刘少奇、邓小平无所适从，陷入被“革命”的境地。

有高干子弟广泛安插的大学校园，成为“文革”在基层掀狂飚的发源地。康生先来到北京大学煽风点火，北京大学一张大字报出台，旋即经毛泽东同意，根本没有通过刘少奇等中央常委，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播发，全国为之震动，局势急转直下。6月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会议，根据以往经验，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以期约束、控制运动，并规定“八条规定”，这些虽是中央会议的决定，但在杭州的毛泽东却未置可否。刘多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未作明确的答复。6月4日，刘邓曾乘专机去请毛回京主持工作，但毛却让刘相机处理，自己仍留驻杭州。

因此，从这时候起，工作组问题，就成为毛刘冲突最终决裂的关键问题。工作组本意是企图使汹涌而起的学生运动能有领导、有秩序、有限制地进行，这无疑会打击一大片骨干分子，甚至出现“学生领袖”与工作组严重对立，反对工作组、驱逐工作组的浪潮就成为这一时期“左派学生”运动的主潮流。但刘少奇、邓小平等是坚决主张派遣、反对撤出工作组的，这与支持造反学生的康生、江青发生尖锐冲突。

毛泽东观察两个月后，于7月18日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并立即听取江青等的汇报，召集中央常委

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对派工作组的错误，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

这样，经过两个月的较量，工作组在与造反学生（“红卫兵”）对抗中彻底失败，刘少奇等的政治命运也即将终结，毛泽东发动“文革”之火更加狂猛，“十年浩劫”的来临已是无可挽回的了。

## 刘少奇之死

红卫兵运动在各高校、中学如野火般燃烧，呈不可阻挡之势时，在8月1日开幕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打破会议进程，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对刘少奇与中央第一线的错误主要指出两点，1962年的“右倾”与1964年的“形左实右”，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应为省）的吗？”

在会议进行的中央常委选举中，刘少奇被安排降至第八位，接班人地位被废除，11名常委：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12月25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剃大富经过精心策划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打出“彻

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的旗号，并散布《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十大罪状》的传单，“打倒刘少奇”运动全面推向社会。

13日，应毛泽东之约，刘少奇与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交谈。刘向毛提出：

“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并介绍法国动物学家海格儿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两人再无话可说。最后，毛在送别时，对刘只说了一句：“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这两位共事40余年的战友、同乡最后一次会面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1月18日，刘少奇家电话被拆除，与外界联系被切断，只能通过几个孩子到外面看大字报来了解信息。4月1日，《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此文由毛泽东审阅批示发表，文中公开提出：“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不几日，造反派闯入刘宅，勒令刘今后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夜里工作、上午休息的作息习惯。4月10日，清华大学召开30万人批斗大会、主斗王光美，并进行人格侮辱；6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亲自报告中央，刘身边工作18年的厨师郝苗可能是国民党军统

特务，赶快捕审，郝随即被捕；7月13日，3万多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连续3天举行游行示威，“声讨”刘少奇；18日晚，中南海秘书局造反派经江青同意，在中南海大灶食堂举行揪斗刘少奇大会，这是刘第一次遭到公开批斗，8月5日，毛泽东所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刊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天安门广场还召开了浩大的300万人的誓师大会；中南海内则由康生之妻、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指挥，召开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光美被捕入狱，关押秦城监狱12年，并以莫须有罪名大批逮捕有关人员。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九易其稿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诬称刘“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11月2日由全国所有媒介向全国公布中央决定，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此日正是刘70岁的生日，刘当即浑身颤抖，大汗淋漓。11月24日，浑身是病的刘少奇在严密监视中得到这一消息，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上升260/130，体温升高到40℃。

1969年10月17日，生命垂危的刘少奇被战备疏散到河南开封，负责看守的中办负责人拒绝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11月12日晨4时，刘停止呼吸，年71岁。病历上写着“该犯除患有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和轻度糖尿病外，主要病症是肺炎。”14日，刘的遗体以“烈性传染病病人”被秘密火化。“文革”中因刘案受株连判刑者28000多人。

（责任编辑：刘家驹）

# 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一段曲折

● 温济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在思想理论战线上进一步做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党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个会是当时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前后历时3个多月。前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开到2月中旬,继续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大多数与会者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

春节休假5天和继续休会几天之后,务虚会继续进行。但情况有些变化,会议由党中央领导,最主要的是在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到4月初就匆匆结束了。

## 真理标准讨论出现曲折

务虚会之后不久,李洪林同志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三篇文章,我认为这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正确理解,但听说被扣了帽子,打了棍子,并且听说是乔木同志提出

批评的。当时我还把乔木同志看作“理论权威”,就没有多想多说什么了。过些时候,李洪林同志又发表了《回答一种批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后,受到更加严厉的批判和处理。我对此有了怀疑,但仍保持缄默,没说什么。

在这前后,我听到乔木说,毛泽东过去说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当时正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我觉得乔木讲得有道理,就在研究生院向师生传达了。不久,某省某学院的学报上发表一位讲师持有同样观点的文章。但却听说乔木要通令批评这个观点。我想,这不是乔木你自己说过的吗?怎么现在倒批评别人呢?

不久,我又直接听乔木说:“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同时我又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还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我这时仍然把他看作“理论权威”,又在研究生院向师生说过乔木同志上述看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我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搞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我不好直接去问乔

木,但暗自下了决心,以后还是应独立思考,再不随便盲从他了。

后来,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社科院党组开会讨论。我说,社会上有这种思潮值得我们注意,但是据我了解,我们院里还没有发现这种思想倾向。乔木说:“在我们院里就有。”当时我是院党组成员,在科研局工作。

又一次院党组开会,邓力群同志批评于光远同志,说他说过“不但要斤斤计较,还要两两计较”,这是违反共产主义大公无私精神的。光远未到会,我说,我听他是在反对吃“大锅饭”的时候说这话的。他说我们不当再搞“大锅饭”了,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不行,按劳分配就应当看一个人的劳动成果,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不得食,我们不但应当斤斤计较,还应当两两计较。我把这次会上讨论的情况告诉了于光远,以后他自己到会作了说明,还写了一个报告送给邓小平同志。

接着一次党组会,力群同志又批评了黎澍,说他反对毛主席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时黎澍未到会,我说,我

听黎澍说过，他只是就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两种说法进行比较研究，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我的发言刚结束，黎澍推门进来了，力群同志没有再批评黎澍，而用手指着我说：“怎么党组批评一个人，你总要辩护，我看，还有你！”

我有点吃惊，就回答：“怎么还有我？我得辩白几句。”我说，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务虚会的最后一次大会上讲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当时我听得专心，并且边听边想，党组指定我参加筹备全国纪念五四运动学术讨论会，我拟定的选题计划中，重点是科学和民主问题，如果再加一篇论述爱国主义、论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论文就更好了。吃午饭时，我就在饭厅里找人商量写这篇文章，找了好几个人，只有丁守和同志答应了，

但他提出条件，要与我合作完成，他只写到新中国建立为止，只写近百年来中国人怎样摸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由我写建国后的部分。时间太紧迫，我只好答应了。我同丁守和写成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提交讨论会，我代表我们两人在大会上发言，引起许多人重视。会后，就有学校、机关、工厂、部队等30多个单位请我去演讲。我极力宣传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怎么还批评我“自由化”呢？

乔木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微笑着看着我：“你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不少通俗化的工作，但是不能满足于写通俗文章、作通俗演讲，满足于听众的鼓掌，现在你到了社科院，今后要注意加深研究社会科学，注意提高。”我回答说：“你的意见我完全接受，但是我没有搞自由化啊！”力群说：“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嘛。”

乔木说，不要满足于通俗演讲

和听众掌声，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时，北京市东城区共青团团委找到乔木，请他到东城区共青团员大会上作报告，乔木工作太忙，就要他们找我。我听说他们是乔木介绍来的，就一口答应。作完报告刚一个星期，东城区团委又来要我再讲一次。我说，我也很忙，你们就听录音吧。来说：“现在召开大会很不容易，许多人不怎么感兴趣。但你上次的讲话一下子传开了，许多没有听到的人都要求你再讲一次，有些人听过了还想听，特别有3个女同学，在听你讲话的前一天，向学校团委交了退团申请书，理由是当团干部太花时间，听你讲话后的当天就把要求退团的申请书收回了，听说你又要来讲，她们还想再听一次。”来找我的人带着恳求的口吻说：“你就满足这些孩子们的要求吧！”

我不忍心推辞，就答应了。这次还是同一个大礼堂，只是人更多了，



温济泽和胡乔木

楼上也坐了很多。我讲到革命先辈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时候讲了一些故事。讲到李大钊英勇就义时，我引用了当年一个记者写的目击记。李大钊是1927年4月8日下午被绞死的，他面不改色，昂首阔步地走上绞刑台，绞索套住了他的脖子，他昏死过去，刽子手把绞索放松，用一桶冷水把他浇醒，强迫他在台上绕行一周，又用绞索套住，再用冷水浇醒，再绕行一周，第三次才把他绞死。我又讲到青年领袖恽代英，他被捕时化名王作林，被当作一般的工人判了5年徒刑，关在南京的中央军人监狱。1931年，由于大叛徒顾顺章告密，敌人才知道王作林就是恽代英，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4月29日，在监狱操场临刑时，敌人逼恽代英跪下，恽代英说：“共产党人是不会下跪的，你们开枪吧！”他身上好几颗子弹，才倒在血泊中。我讲到这些往事时对孩子说，革命先辈为了寻找社会主义，经历了千辛万苦，多不容易啊！为了救国，为了社会主义，有多少先烈流血牺牲了。我看到台下的听众，特别是不少女同学低头擦着眼泪，报告结束后，孩子们激动地起立鼓掌，经久不息。那3个曾想退团的女孩子都有20岁，站在礼堂门口等我。我同她们亲切握手，谈了几句热情鼓励的话。事后，东城区团委又向乔木作了汇报。这就是乔木在党组会上要我不要满足于作通俗演讲，不要满足于鼓掌的缘由。

可是，此后党组的某些人对我继续追查，邓力群同志担任中宣部部长后离开社科院，1982年整党时，一天晚上，他要我到他家，同去的还有研究生院分党组书记和机关党委书记。邓力群拿出两份材料问我：“……这些话你说过吗？”“……这些话你说过吗？”我回答：“我没有说过。”同去的两位同志也证明没有听我说过这类的话。我问：“这些还

是1979年两次学术讨论会（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庆祝国庆3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有人汇报的吧？邓力群说：“也许是别人说的。别人汇报了，你没汇报，总有点自由主义吧？”我看他想下台阶，就说：“这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有人这样说，我不知道，当时两次会都分成10个小组，我无法听到小组会的全部发言。一种可能是汇报的人断章取义，汇报不真实。说我有自由主义，我承认，我在延安就有，今后我还要多加注意。”邓力群把我们送到他家门口，还拍拍我的肩膀，叫我以后不要同于光远搞在一起。我说：“什么叫做搞在一起啊！在党组会上我们说了一些相同的意见，但是，事先我们从没有商量过。”我以为这样总算解决问题了。没有想到，以后继续整党时，院党组却仍要我检查“自由化”，我实在没有，检查总是通不过，直到我不得不承认“反自由化不力”，才让我过关。

我这次挨整，算不了什么。1982年，社科院党组还有两位同志受到批评。一位发表了一篇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被批评有修正主义观点，另一位发表了一篇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只不过对市场调节作用稍加强调了一点，也被批评为有修正主义观点。这只是就社科院党组讨论的范围说的，至于社科院各个研究所、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等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发生多少和哪些曲折，我就不完全清楚了。仅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来说，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来说，就有不少正确的意见被说成是“精神污染”，被错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所经历的曲折之多之大，可想而知。

## 最大的曲折是1983年对周扬的批判。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

周年，3月7日，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和教育部联合举行学术报告会，报告人是周扬，地点在中央党校礼堂。周扬因身体不好，负担过重，这时已经辞去了在社科院和研究生院的职务，专做文联、作协的领导工作。那一天，我比较早地赶到礼堂，坐在前几排，为的是想听得更清楚些。

周扬慢步走上讲台，看来身体又差些，他开头讲了几句话，就请一位女播音员代念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位女播音员名叫潘捷，是周扬怕自己讲时体力不支，事先要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请来的。我熟悉她，她是有名的播音员之一，抑扬顿挫，语调能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原稿的含义，宣读清晰流畅，全篇读下来没有打一个结巴。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不时地响起一阵阵掌声，报告结束时鼓掌热烈，经久不息。

我们都期待着《人民日报》能早日发表周扬的报告，但是一直拖延到3月16日。听说拖延的原因是胡乔木对周扬在报告中讲的“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有不同意见。3月16日《人民日报》见报，事先没有得到乔木和中宣部的同意，主要责任在报社副总编辑王若水，王若水因此受到处分，周扬也受到批评。周扬讲话的内容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在纪念马克思的时候，作些理论问题的探讨有什么不可以呢？有不同意见也应“百家争鸣”，不应由“长官意见”来压制嘛！

过了大约8个月，11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周扬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内容是就发表论述“异化”和“人道主义”文章的错误作自我批评。几天后，我又去看望周扬，他的态度似乎轻松和平静一些。他说，3月以后，乔木就“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找他谈过三次话，但谈不

拢,他自己也不冷静,每次谈话他都拍了桌子,同乔木争吵起来。以后乔木找薄老同他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和中顾委的会议上又有组织地对他进行一边倒的批评;最后又派新华社记者要他发表谈话。这时,他那种“拍桌子”的气愤似乎仍未平息,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是个老党员,总要顾全大局啊!我不得已承认‘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

我知道周扬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早有研究,我查找到1963年12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面登载了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战斗任务》,其中就讲到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前后一致的,他是我国研究“人道主义”特别是“异化”问题的少数几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之一。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大加鞭挞批判呢?周扬病已加重,气愤难平。

乔木说话变来变去,有时做事令人难以捉摸。在理论务虚会上,开始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时,他同大多数人意见一致。而当讨论热烈展开后,他的态度就有些变化了。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提出,政策宣传和科学研究是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工作,政策宣传遵守党和政府决定的政策界限,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则必须有研究的自由。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应当允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允许有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自由,有批评和反批评的自由。周扬的这篇稿子乔木事先也看过,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又变卦了呢?我猜想,由于那时许多人把他看作“理论权威”,因而他变了,在真理标准问题的深入讨论中,他听了一些过头或偏颇的话后,不善于甚至不愿意去

引导和疏导,但又不能容忍不同意见,这就导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发生不幸的曲折,走上弯路。听说1984年1月,他把他那本批判周扬的小册子赠送给周扬,不久又写了首白话诗送给周扬,承认自己用利剑割伤了“好友的手指”,请周扬“原谅”,并希望周扬“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周扬把他的小册子气愤地扔在一边,他后来完全成了植物人,伤口再不可能愈合,友情再不可能保持了。乔木和周扬都是我长期尊重的领导,后来都成为我亲近的良师益友。如果人死而有知,我希望周扬能得到安慰,乔木能理解我此时此刻追述往事时的心情,一种不愿回首又不得不说的痛苦心情。“吾爱我师,尤爱真理”,良师有错,我只能服从真理了。

## 世界不停地发展, 思想解放如滔滔巨浪, 谁也阻挡不住。

从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到党的十五大确立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党的行动指南,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经恢复并更加发展。

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统一的,我们党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始终坚持三者的辩证统一,推动了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

马恩列斯和毛泽东、邓小平都

有许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论述,在这里,我想引用一段斯大林的论述。1942年,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在毛泽东倡议、主持并亲自审定下,编过一本《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以后规定为干部必读书之一,参加编辑的有二三十人,我是其中之一。在这本书出版40周年时,我向中央宣传部建议,重编一本《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经同意后,我联合二三十个同志帮助我,我任主编。在这两本书里,都引用了斯大林早期在《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中的这段话:“伊里奇(列宁——作者注)说过,管理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检查执行情况的问题。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搞得糟透了。领导——这并不等于写决议和发指示,领导——这就是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不仅检查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从生动的实际工作的观点来检查这些指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如果以为我们所有的指示都百分之百的正确,那就可笑了。同志们,这样的事情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检查执行情况,正是要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实践的烈火中不仅检查我们指示的执行情况,而且检查指示本身是否正确,因此,这方面有缺陷也就是我们的整个领导有缺陷。”斯大林犯过许多严重的错误,但是这段话仍是至理名言。

“海压竹枝低复举,风吹山角晦还明”(宋·陈与义《观雨》诗句)经历过风风雨雨,我们现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认识已经“低复举”、“晦还明”了。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前进的大道上,我们应当更加勇于探索,着眼于对新的实践的总结和认识,在实践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责任编辑:致中)



# 彭德怀在“三线”的 苍凉岁月

● 王春才

1966年9月中旬，西南三线建委工作会议在成都锦江宾馆举行。我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9月15日夜，会务组安排在9楼大会议室放映电影《战上海》。我坐在第12排位置上。电影准时开映，可是我身边靠走道还空着一个座位。不久，服务员打着手电筒引进一个满头灰白头发的老人，把他安置在我身边。我仔细一看，他竟是我敬重的彭德怀！

此刻，正落魄的彭大将军，竟然坐在我身边，心中不觉一阵酸楚。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以后的事，我也知道：上书，罢官，归田，来三线，时下正在批判这位庐山“海瑞”。忽然，彭总用手碰了我一下，将他的茶杯端到我面前，示意我喝茶。我的眼睛一下模糊了。

这一次与彭总看电影巧逢，给我留下了绵延的记忆。

彭德怀于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被罢了官。

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

196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与彭德怀谈话，

彭真说明主旨：“今天由我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感到太突然，沉默了片刻回答：“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表示对工业生产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9月21日，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

9月23日早8时半，毛泽东在颐年堂与彭德怀谈开了。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彭德怀答：“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我想去边疆搞农业。”

在座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一起劝说，彭不改初衷。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毛泽东又说：“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

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身穿染成黑色的军呢大衣，乘33次列车离开北京，30日抵达成都。就在彭德怀到达成都赴任的当

天,《人民日报》学术栏内转载了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刚下塌省委招待所的彭德怀,抓起那张人民日报气得厉声斥道:“我今天到,文章今天发,打了我彭德怀一记耳光!搞什么名堂!”这仅是一个信号,在彭德怀去西南大三线的同时,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正在加紧审查他的“反党”罪行。可想而知,彭到三线工作,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尴尬局面。

但是,彭德怀决不因打击而消沉,他决定利用有限的时间为人民干点正事。

这年冬天,在重庆潘家坪宾馆召开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向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任西南三线建委副总指挥的决定。会场鸦雀无声,接着这位负责同志在主席台上放下文件,点燃一支雪茄烟,抽了一口,操着江西口音说:“彭德怀同志到你们那里去检查工作,他的指示你们觉得不合适,可以不办,三线军工就不要他接触了……”参加会议的地师级以上干部,当即明白了这番话的意思。

彭德怀到成都后,由西南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组织建委各局(除机械、军工局外)向彭德怀汇报工作。彭德怀一连听了几天汇报。不久,西南三线建委领导分工,安排他分管燃料局(煤、电、天然气)。由于层层打招呼,不让彭了解军工,他的老部下、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主任蒋崇璟,两人又在成都相逢了,见面时只互相点头打个招呼,从不谈工作。1966年4月中旬,彭德怀去川南视察。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厂长李鸣鹏请示宜宾地委如何接待。地委负责人向他传达了四川省委的五条规定:地委第一书记不出面,由主管工业的地委书记接待陪同;接待单位要做好保卫工作,确保彭德怀安全;不搞宴请,但食宿要安排好;不准参观军工厂,民用厂涉及保密部份不得向彭德怀汇报,也不给参观;限制其接近群众。凡有关彭德怀活动,要求地委每晚有专人向省委汇报。

4月25日上午,彭德怀在西南三线建委

燃料局局长王思和宜宾地委书记沈学礼陪同下,来到纳溪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视察,李鸣鹏先用挂在墙上的厂区平面图,向彭德怀汇报了工厂的生产,然后参观了工厂厂房、生产线。泸州的江对岸是第五机械工业部的255厂。这个厂,在抗美援朝时期生产弹药做出了极大贡献,曾受到当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多次表扬、感谢。沈学礼书记非常担心彭德怀提出参观255厂。但彭德怀只是隔江遥望工厂远景,什么也未说。下午沈书记陪彭德怀参观水稻研究所。

彭德怀还在原志愿军炮兵司令员、第五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西南三线兵器建设总指挥朱光陪同下,参观了五机部华莹山308厂、338厂建设现场。这两个厂是西南三线建委抓的学大庆艰苦奋斗搞“干打垒”典型,彭德怀参观338厂已投产的望远镜车间时,谈起抗日战争关家垴战斗时他使用过的望远镜,表示要拿来交给工厂技术人员鉴定,优势互补。

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有20多个委员,7



这是成都永兴巷7号院,彭德怀住在这里。  
在围墙边他栽过树种过花。



警卫班战士田文义在彭总门前值勤(1966年)

个常委，朱光是常委，彭德怀虽然是三线建委副主任(副总指挥)，但不是常委。1966年3月中旬，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到西南视察三线，朱光与西南三线建委另一位负责人向这位中央首长汇报完兵器三线建设后，朱光话题转到彭德怀的工作上，希望让彭德怀同志分管军工三线建设。军工三线建设包括核工业、航空(含航天)、兵器、船舶、电子、国防科研行业。这位中央首长操着山西口音说：“不行啊。彭德怀同志管得起来吗？他管不了。”朱光不好再申述了。可叹的是，刚进入“文革”、“五一六”通知一下达，这位政治局委员首先被打倒。

彭德怀身处逆境，仍然巡视数十个县、市的数十个大型工地，行程几千里，踏遍三线的座座大山深沟。他纵观三线建设的布局，提出了“突出一点、一线、一片”的指导方针，确保了攀枝花钢铁基地的建设。他视察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工地，肯定了“打一、备二、看三”的作法，促进了该厂按期建成投产。他深入贵州六盘水煤矿区建设工地，指导施工部队总结了“三结合”、“五统一”经验，运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歼灭战的办法建设煤矿，既加快了煤矿建设速度、还节约了

投资，也确保了工程质量。

一天，他来到大渡河畔，听说当年为红军摆渡的老船工帅士高正在附近的石棉矿治眼疾，就把老人请来，一见面，彭德怀双手握着老船工的手问：“你是帅士高吗？我们是老朋友了，早就想到安顺场渡口去看看你们。当年是你一老一少划一只船嘛！”帅士高上前紧紧搂住彭德怀说：“啊哟，你就是彭德怀啊！好久没有听说你的名字了，你好吧？！”两位老人亲切地谈天说地，亲热得很。

1966年4月26日，彭德怀要去江津地区考察花果山煤矿。临行前的4月25日晚上，宜宾地委书记沈学礼去看望他。彭德怀轻声慢语地说：“看了几天，你们接待得很好，照顾周到，这几天你们陪我也辛苦了，谢谢你们。”彭德怀点燃烟，抽了一口说，“泸州这个地方气候好，农业搞得不错，有发展前途。我在进军西北以后，不进北京就好了，要是在新疆建设兵团搞农垦，抓农业，该多好！解决五亿农民吃饭是个大事，我喜欢农业，要是这样，也就没有后来那些事了。”说着说着，他的声调低下来，“1959年我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是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我常接到战士农民来信。现在有人说我反毛主席、反党，我哪里是反毛主席、反党嘛？！我通过去农村调查，反映了实际情况与群众意见，把农村工作搞实在些，大家都能丰衣足食。我是个老粗，没啥大本事，后来上井冈山，这才真正懂得怎么闹革命，怎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办事。我跟毛主席几十年了，他了解我的倔脾气，自己认为是对的，非干下去不可。我有错，也愿意改。来成都，想为人民干点事，唉！不管那么多了，报纸上批判文章逐步升级，让他们去批吧……”沈学礼听了彭德怀这些话，百感交集，非常同情他，但又不敢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彭德怀一改缓慢而低沉的声调，对沈学礼嘱咐说：“芙蓉矿区，要搞快点，请沈书记多关照。”沈学礼当即表示：“我们一定按彭主任指示办。”接着又对彭德怀说：“您要注意身体，什么事都要想开些。来了之后，我们对您照顾

不周,请原谅,欢迎您下次再来。”

1966年5月下旬,彭德怀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视察。正准备动身去贵州、云南,5月28日晨,突然接到西南三线建委电话通知,让他马上返成都,学习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修正主义”的狂风很快在全国刮起。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赶下了台,中共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北京主要大学的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

6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南局首先在领导层内学习“五一六”通知。西南局所有书记都参加了,彭德怀不是书记,让他参加了学习会,是要他进一步交待庐山会议“三反”问题。彭德怀火了,站起来说:“庐山问题,我早说清楚了,加在我头上的种种罪名,我知道,你们也知道,有什么好讲的……。”说着,彭德怀起身拍着桌子掉头走了。

对彭的这一“猖狂”行动,由西南三线建委局以上干部组织了一次批判,会开得很神秘,规定内容不能外传。参加会议的不到20人。主持会议的是西南局一位书记。批判时大都唱一个调子,说“彭德怀是老右倾分子,一贯反对毛主席、反党”。只有一个说得具体些,说他“到西南后仍不悔改,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人心,给大渡河老船工30元,3包大前门香烟……”彭德怀仰靠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一言不发,坦然地听着对他的种种指责。彭德怀最后说:“什么给群众小恩小惠,老船工当年冒着枪林弹雨帮红军抢渡大渡河,他生活困难,给了点烟、给了点钱,这是人之常情,人家为了红军打胜仗,死都不怕,这点钱就能把人家收买了,这是什么道理。我已经是政治上的僵尸了,有什么好批的!我要交待的都说了,你们批吧!”那位会议主持人说:“彭德怀是只‘死老虎’,态度不好,不再批判了。”并亲自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封信。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使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机关无法办公了,西南三线建委机关也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有的领导同志干脆到外地出差避风了。西南三线建委副秘书长杨沛受西南局书记李大章的委托,好心劝彭德怀到内地外地躲一躲。彭德怀拒绝了。

此后不久,他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屡受批斗。1967年11月1日,他给毛泽东写了最后一封信,说:“我已于27日押解回北京,现被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同志因不堪长期的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与世长辞了。

(责任编辑:刘文)

(王春才:原任国家计委三线建设调整办公室主任)



红卫兵批斗彭总

# 从新公布的一封信看 胡适与虎谋皮

● 雷 颐

胡适在国共党争中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弊取其轻”的选择。他坚决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也曾有相当激烈的批评和冲突。为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曾作出决议要求严惩胡适，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胡适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到南京晋见蒋介石时，批评者变为建言者。1948年末，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蒋介石曾派人北上邀请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为胡婉拒。不久，蒋便派专机到北平将胡接去台湾。

新近公开的胡适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为人们了解、研究胡适晚期政治思想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1997年2月27日台湾《联合报》）。这封信写于1951年5月31日，其时胡适离开大陆到达美国刚刚两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任管理员。他在给蒋介石的这封四千余言长信中，他从共产党的斗争策略和国民党自身的问题这两方面对国共的胜败原因作了分析，直言无讳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适认为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策略

知之甚少，所以在致蒋的信中首先建议：“在这点上，我要向我公建一议，盼望我公多读一点中共近年出版的书籍。例如：1.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2.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3.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胡适认为不仅蒋介石本人应读这些，而且希望蒋能“指导政府与国民党的领导人物，切实研究这种敌人文献”。他提出“国防部长”与“参谋总长”必须细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而党务、宣传工作者应读《反对党八股》。他写道：“我这一年来研究近代史实，颇感觉斯大林确是一个战略大家，而毛泽东确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好学生、好徒弟。他们都得力于克劳司威茨的战略，所以我要我公略知克氏书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

胡适亦对国民党自身的原因作了非常尖锐的分析和批评，并明确提出要蒋介石辞职。他认为，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有两条，一条是“由立法院与监察院联合妥商一个宪法上规定的总统、副总统选举方法的紧急补救条款”，否则“将来必有大懊悔之一日，已来不及了。”另一条更为重要，他的建议也

更为详细：“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近一年内所谈党的改革，似仍不脱“党八股”（不知是否受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启发）——笔者按）的窠臼。鄙意今日急需的改革有这些：1. 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2. 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的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立的政党。3. 新成立的各政党应各自立纲领，各自选举领袖，各自筹党费。4. 新成立的各政党此后以政纲与人选，争取人民的支持。5. 立法院必须修改议事规则。凡议案表决，原则上均须采取唱名投票制，以明责任。”

他进一步写道，“但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一党专政’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故今日要改革国民党，必须从蒋公辞去总裁一事入手，今日要提倡多党的民主政治，也必须从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一事入手。今日的小党派，都不够做国民党的反对派。最有效的民治途径，是直爽的承认党内几个大派系对立‘而且敌对仇视’的事实，使他们各自单独成为新政党。这些派系本是同根同源，但因为不许公开的竞争，所以都走上暗斗、倾轧的路上去。其暗斗之烈，倾轧之可怕，蒋公岂不知之。如欲免除此种倾轧的暗斗，只有让他们各自成为独立政党，使他们公开的作合法的政争（公开的政争，是免除党内暗斗的唯一途径）。但蒋公若继续作国民党总裁则各派系必皆不肯独立，必皆欲在此‘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的政权之下继续其倾轧暗斗的生活。在此状态之下，国民党的改革，除了多作几篇‘党八股’之外，别无路子可走，别无成绩可望。”“若各派系公开的独立成为新政党，则各派系必将努力于收罗新人才，提倡新政纲，在一转移之间即可以有生气，有朝气，有前途了。”“数年来，我公曾屡次表示盼望我出来组织一个新政党，此真是我公的大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会上致词时病发逝世，这是其逝世前的最后镜头

度雅量，我最敬服。但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勉强。在多党对立之中，我可以坚决的表示赞助甲党，反对乙党，正如我近年坚决的赞助我公，而反对国内国外的共产党一样。但我没有精力与勇气，出来自己组党，我也不同情于张君勱曾慕韩诸友的组党工作。”“因此，我在这几年之中，曾屡次向国民党朋友大谈‘国民党自由分化，成为几个独立的政党’之说。此说在今日，对内对外，都不容再缓了，故敢为我公详说如上。”

胡适很清楚，在近代中国其他所谓“反对党”只是无足轻重的摆设，所以他知道蒋介石要他“组党”亦不过是一种把戏，因此一直婉拒，反寄希望于大权在握、但又派系林立的国民党的自我分化、改造来实现民主政治。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想要通过这种“理性”来说服国民党实现派别公开化、合法化，甚至分裂出来独立组党，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甚至可说是“与虎谋皮”。

（责任编辑：刘家驹）

# 一位铁道专家 在“三反”中的困惑

● 黎 白

1949年5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周恩来发布命令，委任铁道专家黎亮为军委铁道部工务局第一副局长。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黎亮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设计局副局长。

不久，黎亮主持勘测设计建筑兰新铁路的工作，组成了勘测大队，他兼大队长，又兼任了西北干线工程局局长，陕西军区司令员王世泰兼了工程局政委。黎亮率领大队勘测人员，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行政、医务、警卫、财会人员和熟练技术工人等从北京出发，自陕西省境内开始，向甘肃河西走廊一带进行艰苦的勘测工作。

甘肃省的河西走廊原来主要是回族聚集地区，清时人口本已稀疏，后来，清朝派左宗棠率大军清剿回民的“叛乱”，采取了烧杀和并村的诸多残酷手段，更使这里几十里甚至百里之内不见村寨，人烟稀少。

黎亮率大队进入河西走廊，立刻就面临着几桩极大的困难。第一个是饮水极端困难；第二个是吃饭困难，当地筹集不到粮食，只有靠自己携带，但勘测大队的几部汽车主要携带众多各式各样的仪器，所带粮食有限；第三是尽管这里人口不多，但正在流行恶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不仅威胁着当地

人民的生存，也影响着勘测大队的安全。

黎亮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三项决定，第一，暂停勘测，全大队所有人员全力投入对人民群众中已经发生的恶性传染病的消灭工作；所有医护人员日夜抢救患者；所有药品一律保证抢救工作的需要。第二，黎亮签批人民币一亿（合新币一万）元，派专人到西安等地迅速购买药品运来投入治疗。第三，发急电给兼政委王世泰，请他委派部队运送粮食、衣服、棉被、饮水、以便散发给当地群众。

有人犹豫地提出：“我们是负责勘测的，抢救群众，消灭恶性传染病，是地方政府的事，我们全部力量停止勘测，用来抢救，是不是过了一点？”

黎亮火了，说：“我们是共产党员，见到这种传染迅速的疾病每天在夺去人民群众的生命，为什么不救？为什么不全力以赴的救？一定要全力，半力不行，不然，我们就不配称为共产党员。这一点，不允许讨论。”有人提出：“是不是拍急电给甘肃、陕西省的省长和书记，请他们立即派医疗队和抢救队带上物资赶来？河西面积这么大，当地群众居住又这么分散，我们尽全力也忙不过来啊！”

黎亮连连点头说：“提得好，我没有想到。”立刻拍急电给甘陕两省领导同志，列出

所需对症药品、粮食、棉被，并提出：“如能派部队赶来和我们一起投入抢救并与政府一起处理善后实属十分必要。”

抢救患恶性传染病群众的工作结束后，正常的勘测工作重新开始。

几个月之后，勘测工作初步完成，黎亮回到了北京。

这天，黎亮在家里正在向妻子、孩子们讲述在河西走廊所见、所闻、所感，接到了部里要他去一下的电话。

黎亮赶到部里，迎接他的是老熟人已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武竞天。

武竞天颇为热情地握住黎亮的手，两个人一起走进副部长办公室。

武竞天说：“你知道‘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已经展开了的形势吧？”

黎亮点点头。副部长特地把他找到部里来说三反五反问题。难道发生什么事了？他严肃地看着武竞天，说“你讲吧，在三反五反中，部里对我有什么看法？”

武竞天也严肃地说：“部里收到对你的揭发信，除了滕部长因病住院之外，全体常委进行了研究，并依组织原则上报国务院六办。六办指示要查清楚。这是今天我要和你谈的主要问题。”

黎亮听有人揭发自己和三反五反有关，心里很坦然，他一向廉洁自律，确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三反沾不上边。平静地等待着武竞天下边的谈话。

武竞天说：“黎亮同志，你是不是在甘肃勘测时期利用职权批了一亿多元购买药品，用于不属铁路范围的事情，而且拒绝某些同志建议呢？”

黎亮这才明白了。点着头说：“确有其事。揭发检举者没有写出来是为什么吗？”

武竞天说：“写得很不清楚。但是，一亿元按三反的划线，算是大老虎哇，揭发信中质疑是两条：一是有受贿嫌疑；二是挪用专款用于与铁路无关的事。还有就是不听反对意见，独断专行。”

黎亮一下站了起来，说：“武副部长，你当



1952年任铁道部设计局副局长黎亮

然很清楚，在我的职权范围之内，我有权批用两亿元以内的开支，对吧？”

武竞天点头说：“我清楚”。

黎亮说“好，首先这是我职权之内的事，与独断专行无关。”

武竞天又点点头。

黎亮说：“我为什么批一亿多元去买药？本来，事后我已经给部里写过书面报告，因为同时我决定暂时停止勘测工作。那是因为河西地区发生恶性传染病。当地群众患病的很多，死亡率很高，而且死亡很快。那里人烟稀少，传染面积很大，当地政府无力解决，有个别地区连村政权还没有建立。我不能眼看人民群众不断死亡，就决定全大队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分赴农村各地抢救群众，同时急电甘陕两省派医疗队和部队来支援，也批了那笔钱派专人去西安等地购买抢救药品。当时研究措施的时候，确有的同志提出这种作法都不妥当，认为铁路专款不宜挪用，认为我们铁路工作人员管不着那些事，应由当地政府管。言下之意是我们不应该多管闲事。我批驳了这种谬论，我认为我们是共产党，是人民政府，哪有在人民遇到生命危险的刻不容缓的时候，我们不去抢救。还要墨守谁是铁路



系统，谁是地方政府的区别？见死不救，还算什么共产党？当时，时间是极其紧迫的，早抢救，就能多活一些人，按部就班去办，流行病传染是无情的，不等人的啊！基于党性，良心，我相信，如果是你在当地，你肯定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办的”。

武竞天很认真地听着，没有说话，没有提问，等黎亮讲完沉默了片刻，说道：“黎亮同志，我只是受常委委托告诉你这件事。六办也在追查。‘三反’运动对党政军各级干部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高级干部。所以，我以为你应该尽快写一个详细报告材料，时间，地点，问题发生经过，所采取措施的经过，当时不同的意见也要写详细”。

黎亮说：“好的，我明天就把报告送给你并部领导和常委。我再说明一点，我批的一亿多元，立刻由医生带去西安购买药品，我本人没有离开河西地区，没有与任何一个药品公司或药品商人见过面，也没有任何公私信件电讯往来。因此，受贿的揭发，属于谣言。”

武竞天说：“这一点也要详细写进去。不要遗漏，这很重要啊。”

黎亮临走时，武竞天说：“没关系，如实写明情况再说嘛！现在我说什么也不很方便的。”黎亮惊讶地看了看武竞天，似明白似不明白地走了。

以后的十天，黎亮作了四次检查，总是过不了关，他的思想陷入极度困惑之中。他参加革命以后，几次运动——“土改”、“三查、三整”以至建国后的“镇反”运动期间，他做为铁道专家，受组织委派，一直忙于业务工作，没有参加运动，这一次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居然会涉及到自己，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批了一亿元用于购买药品抢救人民群众，错在哪里？为什么有人提出是一只大老虎？为什么自己当时写了报告，组织上知道这件事，却没有态度？他知道在部级、局级领导干部中间，除了党外人士之外，按资历，按革命斗争经验而论，自己是水平最差、资历最浅的。他想找一两位老同志谈一谈。奇怪的是，仿佛几天之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

大变，许多人躲着他。原来一些热情微笑的面孔不见了，即使是走个面对面，对方也是把头一偏，装成没看见一样侧身而过。这种变化，使黎亮很不理解，也很感难过，他想找老熟人武竞天，武副部长带工作组到下面去检查“三反”运动开展情况去了。

正在他心情苦闷，无所适从的时候，在部队工作的长子志华来到他的房间。

黎亮严肃地对儿子说：“今天咱们撇开父子关系，以党员对党员的态度谈谈“三反”中的问题。”

志华当然了解自己的父亲，一生清廉，生性耿直。所以很能理解父亲在运动中的苦闷心情。

黎亮讲完在河西走廊抢救恶性传染病的情形以后，苦笑地说：“这是我第五次的检查，无论如何也想不出该怎么检查了。第一次，我把情况如实讲了，开会通不过，认为我避实就虚，美化自己。第二次，我检讨自己有些独断专行，应该事先与王世泰同志通话取得一致。这个检查，我已经有些违心了。当时救人生命第一，那有时间电讯往来联系呀！何况，我作出的决定，当时就发报到陕西告诉王世泰了。还报铁道部了。这次检查又没通过。认为我检查独断专行是企图掩盖一亿多元开支的去向。第三次，我又加了一条，就是不经请示，擅自批用一亿以上的经费，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其实，这又是违心之谈，我有权不经请示批用两亿元以内的开支。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检查了啊。”

志华说：“又没通过，是批评你避重就轻，要你老实交待经济上的重大问题，对不对？”

黎亮说：“对呀。”

志华问：“爸，你认为批用一亿多元抢救人民群众的行为对不对？”

黎亮说：“当然对，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遇到那种情况也一定会和我一样干的。”

志华说：“既然是正确的，我有一个建议，推翻以前所有的违心的检查，实事求是地如实地写一个申诉材料交部党委常委，请常委审查。你应该保持这股正气，硬着头皮顶下

去。结果可能吃亏倒霉，却对得起党性，良心。君子坦荡荡么。”

黎亮猛地站了起来，说：“对！”我这些日子内心深处天人交战纷纷乱乱，总是想找个能适应客观需要的检查，实际上，适应不了啊！我不能丧失党性，良心！”

几天之后，黎亮交上一份给党委常委的情况报告书。再次如实阐明一亿多元开支情况，同时又加上了一句话：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员都会作的。

黎亮的问题被挂起来了。黎亮本人每天照常上班，但当时是以运动为主，所以他突然清闲起来。黎亮是不习惯在办公室里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消磨时间的。他利用这个时间考虑全国铁路网和新线路的建设问题。这样过了些天，副部长武竞天又到办公室来找他。热情握住他的手，说：“首先，我代表部领导向你赔礼道歉，批钱抢救人民群众是正确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都是不实之说。幸好还没有对你采取什么措施，否则就更不好向总理交待了。”

黎亮惊奇地问：“怎么，还惊动了总理？”

武竞天说：“你的问题，部里有不同意见。当然，也有同志认为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办的，办得很对，滕部长在医院听了汇报就表示了这样的态度。最后，由于意见没能统一，就把不同意见也都附上去呈报给六办。六办特呈给总理。总理刚刚把六办和我们几个找去，他先询问处理意见。然后郑重地说：“王首道同志，滕代远同志都因病没来，我已经和他们通过电话。我们要说的不仅仅是对铁道部设计局副局长黎亮同志的无理审查问题。你们都是老党员，如果是你们遇到黎亮遇到的抢救人民群众的事，请问，你们应该怎么办？也许不一定像黎亮同志那样果断处理吧？我们认为黎亮同志是完全正确的。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有的品质。此案彻消，向黎亮同志赔礼道歉……报告里还写着挪用公款，这种挪用是对的，我们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拿你们铁道部的钱去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为什么不行？你们讲出个道理

来嘛？你看，我就是挨了总理的批评，又受了总理的教育，马上就来找你的。”

武竞天又问：“老黎，你还有什么意见，想法？对常委，六办的，我都负责转达”。

黎亮连忙说：“没有，没有，我深深感谢总理，对六办和部里领导同志，我没有意见。”

武竞天说：“那好，我宣布一个常委决定，由你担任设计局党委书记，当前主要是抓运动，把“三反”搞彻底。”

黎亮怔住了，说：“不成，我不懂得政策呀，我还刚刚结束受审的状况，怎么能去查别人？我还是去勘测，设计路线吧！工作半停顿也已经几个月了。”

黎亮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履行了书记的职责，抓起了设计局的“三反”运动。设计局原本是个清水衙门，黎亮又反对使用逼供信的方法，所以，在运动里设计局没有抓出一只老虎，那怕是一支千万元的小老虎呢！尽管有些闲言碎语，部里面却没有否定设计局“三反”的态度。而且，黎亮本人的问题是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才予以解决的消息也传播出来，人们对黎亮自然就另眼看待了。整天客人不断，黎亮还是对来客一律热情接待。

“三反”、“五反”运动过去了。铁道部及所属单位同样也结束了这一运动，依中央指示，在高级干部中间要搞一次小整风。整风会上，有的同志认为黎亮在“三反”中抓设计局的运动很不得力，收效甚微。说他：“不是采取斗争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而是企图以种种手段来适应矛盾。”

对这类批评，黎亮心里总是压抑住一股怒火。却又不想讲出来。若是凡事都采取斗争的方式解决，没有问题，硬要用斗争的方式制造出问题，岂不要天下大乱吗？他有点体会出“说得清楚又说不清楚”的处境了。

（本文是黎白所写纪实文学《湘潭黎氏》的一节。全书即将脱稿）

（责任编辑：致 中）

# 不妨把视野放宽些

## ● 邨人

看古今中外人物，教科书教我，用“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这把尺子一量，一切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将黯然失色，只有共产党人最光彩。就连大清官包拯也不例外，因为他是封建官吏，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到现实中，这把尺子失灵了。千百年来，包公成为无私廉明的化身，他的故事被演绎成各种文艺形式被老百姓传颂，不论是封建社会的老百姓，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抑或社会主义时期的老百姓，都喜爱他。可见，老百姓自有老百姓自己的尺子。那包公廉洁公正，铁面如山，不畏权贵，体恤民情的形象，不正是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吗？应该说，包公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脑海里，那把尺子仍在暗暗起作用，所以在包公身上总也抹不去“封建官吏”的阴影。直到近日奉读了《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才真正发现自己的冥顽到了何等荒唐可笑的程度！

那文的题目叫《国民党名市长吴国桢》。我心里想：蒋介石豢养的鱼肉百姓的鹰犬，能是什么好东西？当我读到1934年长江水大涨、张公堤告急那一段：“身为汉口市市长的吴国桢亲率军民人等，终日奋战在大堤上。据吴夫人介绍：国桢坐守在堤上、食在堤上，睡在堤上，国桢还告诉我，你若听到礼拜堂钟声，你就知道张公堤已破，你赶快抱二女儿上楼。意即他已与堤同去了，其言甚为悲壮。”不知怎的，咱心里老犯嘀咕：此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都是欺压百姓的吸血鬼，高高在上，作威作福，不会真正关心人民群众的死活；只有共产党才能身先士卒、吃苦在先、处处替老百姓着想。就像现在的朱镕基总理和千千万万个优秀共产党员一样，他们和广大群众在一起誓死保卫长江大堤。然而国民党的官吏怎么会和人民群众战斗在一起保卫长江大堤，不是奇怪得很吗？

当我再读到他当上海市市长那一节——“48年初，上海学生继“五·二〇”

运动之后,再次掀起反迫害、争民主的大规模斗争浪潮。同济大学学生为反对校方开除学生,决定自1月18日起无限期罢课,开展绝食活动,并准备于29日赴南京请愿。29日,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等20余所高校的数千名学生,前来声援同济学生赴京请愿的行动。吴国桢一面竭力阻止学生的罢课、请愿行动,一面又对学生的行动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宽容”到什么程度?文章引用吴夫人的回忆说,当时吴国桢的帽子挤甩了,眼镜砸了,烟斗也断了。但吴仍告诫随员“不能随便开枪!”

读到这儿,再也读不下去了。我问自己:一个国民党的头子,为什么能容忍“暴徒”的“打、砸”呢(既然“打砸”了市长当然就是“暴徒”)!用“阶级分析”看他身上哪有一点国民党的影子?就像陈希同没有共产党的影子一样。如果吴陈二人打个“时间差”,互调个市长的位子,说不定会出现什么怪事件哩!因为人不同、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处理问题的手段也不同,效果当然也就大不同。本来可以用嘴解决的非用刀枪不可,而能用刀枪的偏要用嘴,你说这个世界怪不怪?但历史就是由一个个面貌不同的怪人用他们的言行写就的。

话有点像梦呓中的胡说八道。但不幸的是有的话已变成了现实——吴国桢先是被迫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后又批评台湾当局“一党专政”、“特务横行”、“思想控制”、“言论不自由”,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我说他不像国民党么!)陈希同也因贪污渎职被关进共产党监狱。(我说他不像共产党么!)

可见,一个人是红是白,不是靠帽子、旗帜的颜色;是忠是奸,不是看他喊什么口号,而是看他怎么干的、都干了些

什么?

写到这儿,咱有理由自信:我并没有美化国民党,因为吴国桢已被国民党开除了,而且他还有明显的进步倾向。他说“小平先生想做之事,乃扭转乾坤之事。”邓颖超主席邀请他回国观光,可惜命运之神没有允许这位在海外飘泊了三十年的游子回到故土。1984年6月6日,他逝世后,邓颖超和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还分别致电哀悼。然而当今中国,你不能保证没有人恶意中伤制造恐怖。五十三年前,在重庆,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毛泽东:中共对“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如何界说?毛泽东答复:“自由民主的中国……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四大自由的其中一条即是:要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说,一个人发表政治见解时,不会战战兢兢的。这一条,毛老人家没有做到。邓小平也没做到。拯治民族心灵创伤的工程,是何等艰巨啊!因为你发表意见,那怕是正确意见,没准儿就有人从“左边”射来暗箭,让你的心滴血。有人已经习惯了。更多的人看到血也害怕。因此,要人们免于恐惧,必须解散那边的队伍,收缴毁掉他们的弓箭!对此,我们热情地寄希望于党的第三代领导。

暗暗地,我给自己订下一条规矩:读毛泽东、邓小平的书,也读罗斯福、克林顿的书,读《资本论》,也读《我的奋斗》,还有影响世界历史的其他十几本书;读《共产党宣言》,也读《圣经》;读社会主义,也读法西斯主义。兼听则明。兼看则更明。我不敢“藏拙”,因此才不揣冒昧把粗陋的体会奉献诸位——不妨把视野放宽些!

(责任编辑:致中)

# 我和聂力

## 烽火中的童年友谊

● 周密

我认识聂力已经半个世纪多了。同班小学毕业，同班中学毕业，一起赴苏留学，一起回国分配到国防科委老五院，同在国防科研战线上（她在最上层，我在最基层）干到了退休。对我来讲，她是我相处最长相知最深的大姐，对她来讲，恐怕我也是她最老的朋友了。

我一生中命运之转折，几乎都与聂伯伯、聂力有关，若用老话说，很托聂家的福，他们对我有大恩大德。可惜我从来没回报过什么。现在老人们都已辞世，每每想起，心中不免黯然，所以就想写点什么，特别是少年时代晋察冀度过的三年，以铭记聂力大姐对我的情谊。

与她初次见面是1946年春，那时我在张家口市立第一完小念书。因为参加宣传队演出活动，常常缺课。一天听人说，班上来了位新同学，是聂司令员的女儿。出于好奇，我跑回教室看看。只见后排坐着一个女孩，白净皮肤，浓黑的大眼，高颧骨，大嘴，看起来很文雅沉静。我走过去，相互询问了姓名年龄。她当时叫李丽，比我大五六岁，刚从上海来张家口不久。没几天我们就熟了，与我的性格恰恰相反，她不苟言笑，很少说话。不久她邀请我端午节上她家去玩。

军区司令部离我家住的东山坡不远，没多久就走到了。李丽在门口等我，进去穿过一个大操场，我们边走边聊。她说，她原以为妈妈长

得很高大，一看又瘦又小，颇失望，决定“气她一下”，故意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说“中央军比八路军好”，气得妈妈说她“中毒太深”。讲到这里，她调皮地笑了起来，黑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快乐的火花。我第一次见她这么活泼，非常惊讶。长大些我才明白，这时她回到父母身边快两个月了，正在从童年的苦难阴影中走出来。

她家住在一所日本式平房里，张妈妈——聂荣臻伯伯的夫人果然生得身材瘦小，看起来干净利落、朴素大方。那天聂伯伯好像不在，但吃饭时来的“客人”不少，大圆桌旁围坐了十来个人，其中有叶挺将军的两个儿子，他们四月八日刚刚失去父母弟妹，从延安来。那个大的叫叶正明，一脸悲伤，眼睛有点红；小的约十二三岁，叫叶华明。我觉得大家都尽力想法让他俩快乐和高兴一些。我是最小的客人，即席表演了唱歌跳舞，看到叶正明脸上偶尔露出一丝笑容，大家和我心里都很满意。进城后，叶家的孩子们平时都住在聂伯伯家，受到聂家的照顾，聂力对他（她）们更是和大姐一样。我和叶华明也有了二十几年婚姻，并生了两个女儿。这些都是后话和题外之话了。

我们在张家口同班没维持多久，7月妈妈带着我和弟弟随机关撤退。之后在山西、河北“转悠”了半年多，这期间，行军途中翻车夭折

了我六岁的弟弟，妈妈和我也受了伤。爸爸调到华北中央局，我们到了阜平县城南庄，暂住在附近一个叫汤沿口的小山村养伤。我伤轻（小腿骨折），很快就四处乱跑了，妈妈还躺着不能动，也管不了我。我成天和当地孩子们一起玩，割柴禾、拣树叶，推碾子、做豆腐，做针线、编草帽、赶集卖菜、扭秧歌跳霸王鞭等等，有时上马夫班骑马玩，有时到电话总机班帮帮忙，那种生活真有趣，虽然没念书，却学到了不少东西。

这段逍遥自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47年5月初，我被送进了军区干部子弟小学——荣臻小学。说来，这又是托聂伯伯和李丽的福。1947年春节（或元旦）中央局干部都到司令部所在村——南湾去团拜。妈妈把我收拾干净，我兴冲冲地跟着爸爸去参加这次“社交活动”。再次见到聂伯伯、张妈妈和丽丽，还认识了两个年龄相仿的新朋友——吴铁梅和唐宛文，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那天人很多，我和许多孩子们一块在挖防空洞推出的一个大土坡上爬上滑下玩了个痛快，弄得个个像是从土里刚拔出来的萝卜。丽丽姐没参加这种“小孩子游戏”，她和几个大姑娘在一旁说话。开饭前，张妈妈打来一盆水挨个儿给我们洗脸擦手，还挖鼻孔，丽丽姐在旁边拿把笤帚扫我们身上的土。当我看见洁白的毛巾上抹出一块清晰的黑手印时，羞得脸都红了；李丽过来把我头发重新梳理了一番，同时高兴地告诉我说，聂伯伯同意我上荣臻小学了。因为按规定，我该上政府系统办的光明小学，它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

荣臻小学驻地易家庄离我家只有四五里，全体学生住校，最小的只有六七岁。第一任钟校长，第二任边校长，都和老伯伯一样。有一位姓张的中年老师，专管小同学的生活起居，像一位慈善的母亲。因为我在张家口只读过一学期四年级，所以报到时学校开始打算把我插到五年级。但李丽坚持说，我和她张家口同班，她现在是六年级，我也应上六年级。这样，我又和她同班了。我们班还有四个男生，我来后一共六个人，李丽是班长。到第二学期又来了一个

女生唐宛文。现在北京八一学校的校史馆中还有我们七个人的毕业合影，我们是这个学校第一期毕业生。

记得我们女生宿舍有一条大炕，住着八九个七岁到十一、二岁的女同学。李丽年纪大，特殊照顾：两个条凳搭上块门板就是她的床。我新来插班，没地方了，就拿两块长条木板，一头搭在李的床头，另一端靠在炕沿上。不过它实在太窄且不牢固，有一天夜里我一翻身它就塌了。当时我睡得正香，忽觉什么东西重重砸在头上，醒来发现自己坐在地上，脑门上有点疼，还湿乎乎的，是血。于是我大哭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听见李丽下了床，摸摸索索去找火柴，点着小油灯，一看，原来是我掉下来后床板砸了我的头。炕上的小妹妹们听见哭声都以为是狼进屋子来叼人了，个个吓得蒙住脑袋不敢出声。山区狼很多，我们的房子又没门，只挂个布帘子。还亏李丽胆子大，不仅点上了灯，还敢跑到院子里去叫人。一会儿，老师和校医都来了，重新搭好了我的床铺，剪去了我脑门上一撮头发，上了药贴了纱布。第二天一早，两个调皮的男生在院里起哄，说要看看“光荣负伤的英雄”，我又气又羞，不肯出屋。是李丽站在门口把他们训了一通，批评他们不该幸灾乐祸，又哄着我去吃早饭。从此，我就把她看成是最可依靠的大姐姐。实际上，她也是我们全校同学的大姐姐。她经常协助张老师照顾低年级小同学，收拾床铺、调节纠纷等等。她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整洁，看我洗衣服马虎，她常拿出重新搓一遍，然后命令我下次洗干净；我常忘记梳头，后来索性连木梳也弄丢了，她总是一面训我一面按住我的脑袋梳理那粘在一起的头发。

关于她苦难的童年，当时她很不愿多谈，我也不太主动去问，只知道她父母去苏区后把她留在一位同志家中，但这个同志也参加革命离开了家。他的地主母亲待李丽不好，把她当丫头使，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当时她还留了一件血债斑斑的衬衫，但聂伯伯和张妈妈为了顾全大局不伤害那位同志，就把它扔了。李丽稍大一点，又让她当童工，吃不饱穿不暖。在家还下稻田，虫叮水泡，小腿上留下一片片黑

色疤痕；冬天干活，冻烂手脚。她年年犯冻疮，我们常用脸盆收雪，帮她擦脚治冻疮。谈到这些，她总非常羡慕我，我童年在延安度过，虽然生活比较艰苦，但有父母的照料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我的童年很幸福。

不久，司令部搬到城南庄，我家也搬到中央局机关驻地——新房村，这样我家离李丽家不到一里路，星期六晚饭后可一块回家，星期天七点前回校晚点名，然后开生活检讨会。

学校到家约五六里，多是河滩地，中间经过一片枣树林。秋天，又甜又大的红枣挂满枝头，伸手可取。但和李丽一块走是绝对不敢犯群众纪律的，所以这段时间我常约婉文同行，乘机偷几个枣吃。其实我们并不担心碰上老乡，相反，当地老百姓对我们特别好，会主动摘些叫我们捎回家吃（我们怕父母批评，当然不敢要），我们主要是怕碰上男同学，尽管他们自己也有这种“不法行为”，却会在周日的研讨会上揭发我们，我们就会挨班长李丽批评。李丽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办事又公道。挑不出毛病，就连最调皮捣蛋的男生也怕她三分。

1948年3月，我们小学毕业，进入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同编在十七班，李丽是班长。当时〈联中〉驻地在离石家庄六里远的柏林庄。

这是一所干部学校，同学毕业后（或没毕业）都根据组织需要分配工作。当时正是我军大反攻阶段，前方捷报频传，后方也全力支援，所以入校不久便分配工作，我上文工团，李丽及一些大同学参加被服厂缝军装，有的男同学参加土改队，有的种菜养猪。有时也上课，每个班还是一个集体。

记得那时常挨敌机轰炸，我们在村边大路两旁的斜坡上挖了很多洞，每个能容两个人。飞机一来，大家就沿着一定路线向村外跑。有时飞机来得早，还没起床警报就响了。有一次我只来得及套上一条裤腿，另一条提在手里跟着队伍跑，露水打在那条光腿上又湿又冷。跑到一个拐弯处，李丽正站在那儿，一把把我拽出队伍，一面赶紧帮我穿上长裤，一面骂了我几句什么，然后连拉带扯和我赶上队。又一次，正上课时敌机来了，当时我正好陪一位生病的

同学回宿舍休息，我俩爬到床底下听着敌机扫射声。敌机刚走，还没解除警报，李丽和几个大同学就跑进来了，看见我们在屋子里平安无事，才松了口气。大概就是因为老有敌机骚扰的缘故，这年秋天上级决定把我们学校转移到阜平县城南庄。

为躲敌机，我们夜行军，下午行出发，凌晨休息。出发那天正好阴历八月十四，月光如洗。全校学生排单列行进。我们班最小，走在前面。开始大家还挺兴奋，不时和走在旁边的班主任丁塞老师讲讲笑话聊聊天。半夜，说是离敌占区近了，不许高声讲话，全队人马静悄悄地沿着滹沱的沙滩地北行。下半夜，不习惯夜行军的我们就困得迷迷糊糊摇摇晃晃了。丁老师不时提醒大家别睡着。我记得自己朦朦胧胧看着前面同学胳膊上扎的白毛巾，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走。好不容易到了宿营地，天已快亮了。我们班女生分配到一间空民房里，打前站的高年级同学已在地上铺了很多草。我把背包一扔，靠在上面就睡着了。迷糊中，感到有人给我脱鞋，睁开眼一看，是一位高年级大哥正在准备给我洗脚、挑泡。李丽和其他几个大同学正在展开背包，给大伙铺“床”。她们也一样累、一样晒，不过好像成习惯了，总是先照顾我们这些年纪小一点的同学。就这样昼息夜行，走了六天才到达目的地——阜平县城南庄。这时华北军区司令部和中央局已迁往平山县，我们学校正好占了这两大机关的原址，学校也改名叫华北育才中学了。

可到城南庄不久，又碰上天天有飞机。但我们已经不觉得害怕，因为这里是山区，而且旁边就有个很坚实的防空洞，它的进口前还有很长一段防空壕。我们去的前几个月，毛主席、聂司令员等中央领导都到这个防空洞中躲过。他们住的平房给炸毁了几座，剩下的成了我们的校部。每逢跑警报，老师们都是跑在最后照顾同学。我身体好跑得快，不用照顾，但我见过好几次，班长李丽和班主任丁塞老师一起背、抬、扶那几位身体差的同学。

冬天到了，最难受的是在结着薄冰的小河里洗东西，风一吹，手裂出一道口子。那时也

没什么毛裤、绒裤、棉毛衫之类，一身单衣冬天就当内衣用，衣服本来不多，换洗时往往要相互帮助：一个人躺在被子里，另一个在炉子上烘干洗过的衣服。我又懒又脏，身上头上长满了虱子，寒假回到平山，父母不在，我暂住到聂伯伯家。到家那天，张妈妈把我们的行李全挡在门外，叫我们用热水洗了头洗了澡，换上一身妈妈给我留在那儿的衣服，经过这番处理才放我们进屋。我和李丽同住，她的床铺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她还经常提醒我早上别忘洗脸，晚上要洗脚上床。我好像早已习惯有这么位大姐，常挨她训，也备受照顾。

1949年春进城后，原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转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直到高中毕业，她既是我们的班长，又是我们的大姐。现在想来，如果1946年没有结识李丽，可能我的生活道路完全会是另一种样子，不会在进城前就上

《联中》，就没有机会经受那番锻炼，后来上大学也未必会学航空专业，更不会在航天工业系统干一辈子航天技术工作。

多少年来，她一直是我的老大姐，即使我已做了母亲，做了姥姥，碰上犯难的事还免不了求助于她，她见了我仍像对小妹妹一样。聂伯伯张妈妈对我的父母和我也都是关怀备至，这类事例多不胜数。那年聂力生病住院，我下班后顺便去看看她，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临走，她把一大把进口香蕉（那时进口大香蕉很稀罕）硬塞到我的拎包里，说给孩子们吃。探望病人的反倒拿病人的东西回家，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些一块从解放区来的孩子们才有这种情分。我为自己与聂力大姐有这层缘分感到幸运，她是我终身的老大姐。

（责任编辑：致中）

紧扣热点 资料翔实 分析透彻 信息量大  
欢迎订阅

## 《中国国情国力》月刊

创刊六年 每年一个台阶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由国家统计局主管，中国信息报社和中国国情研究会主办。

本刊开设的主要栏目有：谈中国/本刊特稿/专家点评/国情国力论坛/本期焦点/中国问题/来自统计局的报告/国际比较/世纪广场/社会观察/长话短说/政策信息/资料库等。

本刊报道的主要内容：中国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国力诸要素政治、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外交、资源的情况介绍，社会经济形势的调查和预测，重要人物、事件的专访，国家统计局和省区市统计局的国情国力分析报告，中央及国务院各部委有关全局的重大决策，中国在世纪之交和下个世纪必须正视和面对的问题，国家基本情况的总量数字，

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国际比较等。

本刊为国际标准大16开本。国内统一刊号：CN11-2840；国内邮发代号：82-460。每本定价：4.50元，全年订价54元。每月7日出版。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本刊同时发行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台湾、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

地址：北京三里河国家统计局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

邮编：100826

电话：(010)63449297

63266600-30913、30911

传真：(010)63449297



# 胡愈之与《南洋商报》

● 岑贵鸣



胡愈之与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右1),黎沛华(右2),鲁迅(左1)

报。周恩来答应了，我向他推荐了你。你去了，无疑可以加强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进一步扩大我党在侨胞中的影响，还可以扩大和发展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这一新的任务，胡愈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几天后，胡愈之悄然离港，衔命奔赴新加坡。……

## 二

胡愈之，原名学愚，1896年生于浙江上虞，早年就读于绍兴府中学。1914年夏，他听说商务印书馆招收练习生，随即从家乡来到上海，并通过父亲的一位好友将自己撰写的几篇文章送呈商务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张先生读罢文章，觉得他颇具才气，于是欣然同意录用。就这样，胡愈之自此便与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最终竟成了屈指可数的自学成才的著名文化人。

青年时期的胡愈之，是“五卅”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支持者，曾参加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1920年，他与茅盾等发起了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三年后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出任《东方杂志》的主编。1933年，胡愈之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总会中央委

员；同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愈之在上海倡议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同时还先后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等报刊。武汉沦陷后，周恩来安排他赴桂林做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统战工作，同时负责桂林一带的群众抗日文化工作。

胡愈之一到新加坡，便根据廖承志的介绍，首先找到了在《南洋商报》任编辑的张楚琨。

张楚琨是一个左派，时为陈嘉庚先生的助手。他知道胡愈之是位了不起的文化名人。眼下，能与他在一起共事，是自己求之不得的快事。当时，郁达夫已早他两年来到新加坡，在《星洲日报》编辑副刊，一度还代理该报的主编。《星洲日报》为南洋著名侨领胡文虎所办，与陈嘉庚办的《南洋商报》均代表着各自的经济利益，其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亦有不同。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调查了解，在基本熟悉掌握了南洋华侨社会的基本情况之后，胡愈之迅速地进入了角色；即按照党的指示，以无党无派人士的面目出现，积极开辟海外宣传阵地，使《南洋商报》真正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有力工具。

1940年冬，陈嘉庚结束了在中

1940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来到香港国际新闻社，急切地找到了由桂林抵达香港的胡愈之。

廖告诉胡，最近，陈嘉庚向周恩来提出，他在新加坡办有一份《南洋商报》，考虑到该报在南洋一带有着广泛的影响，他建议中共派遣一名得力的文化人去帮他办

国各大战区为期 10 个月的慰劳考察活动，回到新加坡。对《南洋商报》这段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和办报的宣传方针则大为赞赏。他告诉胡愈之，这次回国，最值得留恋的是暂短的延安之行。他大赞中共的救国救民、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捍卫真理的精神，陈先生的一腔爱国热忱，深深地感染着胡愈之。就这样，凭借陈先生在华侨中的崇高威望，并通过他的关系，胡愈之很快结识了华侨中各方面的人士。

作为主编，胡愈之无论是自己撰写社论还是选编他人稿件，始终以抗日救国运动为中心，突出强调民族团结、南洋华侨团结，以及南洋华侨在抗战救国中的作用，积极主动地配合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工作。他一方面始终与“救国会”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亦与香港和内地文化界的同志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由胡愈之编辑出版的《南洋商报》在南洋引起广泛的社会效应。

人们惊奇地注意到，《南洋商报》每天报道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抗战消息，是那样地及时、准确；它那连续发表的一篇篇社论，又无一不是对激荡变动中的国际国内形势的追踪述评，其言之所触、文之所至，条分缕析，公允客观，言之成理。

于是，人们为贪求先睹为快，争相订阅购买。一时间，《南洋商报》的销路大增，其发行量跃居为各报之首！

1941 年 1 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事件真相的报道受到了种种限制，胡愈之在《南洋商报》上则及时如实地报道了事件的真相，并连续发表社论。这在南洋华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广大的爱国华侨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千古奇冤”，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这一分

裂倒退行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彻底查究，严惩制造磨擦分子”，“坚持团结抗战国策”！

1 月 17 日，《南洋商报》发表题为《民主团结乎？独裁反共乎？》社论。社论严正指出，“祖国抗战进入了最后重要阶段，民主团结则生，反共分裂则亡”；这期间，其他华侨报刊都相继发表社论或评论，指出，“抗战与内战不能并存，分裂与投降必相为因果，如果有人可以说可以一面反共，一面抗战的话，那不独是欺人之谈，实是准备投降的烟幕弹”。

在《南洋商报》等华侨报刊的舆论宣传下，广大爱国侨胞为维护团结抗战局面，南洋地区有 31 个闽侨社团，立即召开联席会议，坚决支持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一致决议——

……向中樞当局作紧急呼吁，恳其立即释放全国爱国政治犯，明令保障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火速撤销一切防共部署，承认一切抗日党派之合法地位，援助敌后之抗日的民主政府，恢复抗日有功武装。……

美洲及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无不表示愤慨，各地侨团纷纷驰电，华侨报刊纷纷发表社论，纽约侨团群社甚至直接致电蒋介石和林森，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蓄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

### 三

1941 年 12 月 8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接着，日本海陆空军对整个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各国和岛屿都发起了进攻。半年时间，已相继侵占了马来亚、泰国、菲律宾、关岛、新加坡、荷印、缅甸等广大区域……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处于国门之外的胡愈之与郁达夫等文化人，随即动员起新闻、教育、书业、文学、

音乐、美术等各界文化朋友和爱国人士，成立星洲（新加坡简称）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胡愈之分任正副团长。成立后的战时工作团，立即又成立了一个青年战工干部训练班，主要负责训练青年干部，让他们去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同时，还迅速地组建起了宣传队，用演讲、戏剧、歌咏等形式到群众中间去进行抗日文化宣传。不久，胡愈之又出任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并兼任宣传主任。当时，这个抗敌总会辖有劳工服务团、保卫团及民众武装部等基层组织。

大敌当前，整个南洋华侨的抗日情绪已是十分高涨。很短的时间之内，他们即组织起了 3000 多人的华侨抗日义勇军，那些青年战工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们都当上了义勇军的政训人员。

然而，战局的发展使得南洋的形势急转直下。因为，英殖民当局根本就没有在南洋抗日的决心。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步步进逼，英军正在节节败退！

“新加坡总督准备当俘虏，我们可不能！”面对万分危急的新加坡形势，1942 年 2 月 1 日，陈嘉庚先生在大声疾呼。两天后，即 2 月 3 日，陈嘉庚决定暂离新加坡，先去印尼爪哇。与此同时，胡愈之亦紧急召集文化界的抗敌工作人员，具体商讨有关撤离事宜，最后决定，先撤往易于隐蔽的荷属苏门答腊的乡村，因为那里知道和认识他们的人不多。在此之前，胡愈之已安排沈兹九带领部分妇女和儿童，先行撤离了新加坡。

2 月 4 日晨，胡愈之随最后一批抗敌文化人，坐上一艘只有几公尺长的摩托舢板。自此，便开始了他那后来三年半的抗日流亡航程……

（责任编辑：刘文）

# 人民币 诞生记

## ● 邓加荣

1947年12月2日，毛泽东坐在陕北一家农民窑洞的土炕上，收阅一封中央工委董必武拍来的电报。

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工委已同意……

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过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他还说，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进北京那样，各带各的钞票。”

毛泽东听了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一些……”

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

报。

董老收到中央回电，立即将南汉宸找来说：“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有：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

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董老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

南汉宸非常服董老的这番解释，精明透测，于是说：“到时候，钞票上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还得请你来写。”

1947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就挂在平山县离西柏坡一里许的夹峪村一家农民小院里。

1948年秋，筹备处迁至石家庄，正赶上国民党飞机来狂轰滥炸。筹备处同志在弹片飞啸中去抢救赶印的人民币和其它备用物资，南汉宸带头

在火海中搬运抢救，没有一个人顾及到个人的安危。

为了筹划人民币的发行，董老亲自骑马到位于阜平县南峪村的晋察冀边区印刷局里去视察。

董老在印刷局（即边区印钞厂）里一连住了几天。他睡在办公室角落里临时搭起的一张木板床上，每天都深入到各个车间里去，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察看钞票的印制情况。

厂房全是用土坯搭起来的，一下雨就滴漏不停。工人们赤脚站在水里，带着斗笠披着雨衣干活。机器和油墨纸张是绝对潮湿不得的，工人便在机器上面支起雨衣、雨伞。雨下大了，雨衣不够用，工人就将自己身上的雨衣、斗笠全都遮在机器上。

厂里没有电力照明，全靠汽灯。每个车间里都有十几盏汽灯，各归一个专人负责。有一个姓程的老工人，多年来一直掌管着汽灯的打气、换罩、上油、点火等事，人们都叫他“汽灯司令”。每天太阳一落山，“汽灯司令”就蹲在场上给汽灯上油打气，然后一盏盏地点燃，把光明送到各处。

董老还专门地查看了材料保管库。为了防备敌人出来清乡和扫荡，印刷局将所需的油墨、纸张、化学药品等二、三千种材料都分门别类地存放在山洞里。有些山洞是天然的，各种材料放进洞里之后再用品草皮盖在洞口伪装。这些材料洞，分散在几条大山沟里。材料保管员每天都要顶风冒雨来往运料取料。

印刷局所需的这些材料和印制出的产品，全靠着一支由百十人组成的运输队转运，交通工具就是百十头骡子。山高路险，风骤雨狂，时有从悬崖窄桥上跌落下去的事发生，而且还经常遭遇到敌军的袭击。

有一次，运输队赶着几十头骡子连夜赶路。走着走着，队伍就停下来，队长走到前边去问，赶头骡的说：“天黑路险，没法走了。”队长一看，前面是一条窄窄的羊肠小路，两边都是数丈深的水沟，一旦跌下去人和骡子都

是有死无生,而且,前面的骡子受惊,后边就会跌下去一串,这样的血的教训几年前在唐河就曾发生过。队长找大家商量看怎么办?停是不行的,天明了就无法通过敌人封锁线了。这时,有个体格健壮的班长说:“天黑人看不见路,牲口可以看见路,给我一头稳健的骡子在前边带路,后边的人牵着骡尾巴跟着走就行了。就这样,他们人牵着骡子尾巴,在月黑夜黑里越过了敌人封锁线和险峻地,及时地把印刷物资运到。”

董老从南峪村边区印刷局回来之后不久,有一天他把南汉宸找去,对他说:“你们设计的人民币票版样中央工委同志都看过了,前几天我又打电报给毛主席,告诉他票版正面印的是毛主席像。今天主席回来电报,不同意在票版上印他的像。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当上政府主席再说吧!汉宸,你把票版拿回去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下!”

“那么,票面上改成什么图案为好呢?”南汉宸问。

董老思忖了一阵说:“人民币,是人民自己的货币,应当以反映解放区人民从事工农业生产为主。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人民币是新中国的货币。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在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了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不能像某些货币那样,掺杂着英文字!”

南汉宸回去,告诉了设计师王益久、沈乃镛,根据董老的意见对钞票重新进行设计,并将董老写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钱数的一些字也一并带过去。

两位设计师很快就设计出拾元、贰拾元、伍拾元三种票版来,所有的图案都是工人农民搞生产的图案。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车水,右侧是矿井场区;贰拾元的正面:左侧是农民牵驴驮货,右侧是火车在铁道上行驶;伍拾元的正面:左侧是毛驴井边

车水,右侧是煤矿的煤车。以至后来发行的壹佰元、贰佰元、伍佰元、壹千元、伍千元、壹万元的票面,也都沿用这种工农业生产的结构。

1953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时,负责设计工作的是著名画家罗工柳。开始时,他们参照苏联货币都印有列宁头像的做法,设计出各种票版也都是毛主席的像。毛泽东审定时,又否绝了。第二次送审时,周恩来还是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

原来,伍元券主景民族大团结中,有人高举毛主席画像,周恩来指示说:毛主席的意见不要把他的像画上,这里还有画像,应当改为标语牌。壹元券主景画面天安门上,原来有红旗、彩灯和毛主席像,周总理也指示将画像取下。

1948年11月,四野解放东北全境之后百万大军全部开进关内,对天津等地实行了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战略包围,革命形势发展十分迅速。面对这一形势,周恩来打电话给南汉宸,让他赶紧动员一切力量发行全国统一的人民币,否则就要采取别的措施。

根据周恩来这一指示,董老于11月18日主持召开了华北人民政府第二次政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

会上,董老再一次慎重地向南汉宸问道:“汉宸,时不我待呀!你们的筹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可不可以明天就把人民币的牌子挂出去?”

“我看可以了!经过一年多的筹



南汉宸

备,各项工作都已经就绪了,十二种面额的票版,已经请中央几位领导审定过了,如果明天挂出人民币的牌子,明天就可以把钞票发行出去。为了准备北平解放后立即有我们人民币占领市场,我们城工部的同志已经派人携带印版进入北平,同那里的一家印刷厂谈妥,已秘密地代我印出一批钞票。等解放军一进城,人民币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了。”南汉宸充满信心地说。

董老当下拍板做了决定:“好,这样我们就定下来了,马上对外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贴出布告,宣告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

就在这一天,第一批伍拾元票面的人民币,在河北省平山县银行正式对外发行;接着,又在石家庄发行贰拾元、拾元票面的人民币。

(责任编辑:仲文)

# 共和国一次超规格的葬礼

## ● 窦孝鹏

1954年12月3日，西北风肆意在北京上空呼啸着，把严寒撒进了人们的心头。灰蒙蒙的西郊机场上，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彭德怀、贺龙、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粟裕、黄克诚、张宗逊、陈赓、王震、谭政、萧华、甘泗淇、萧劲光、刘亚楼、宋任穷、周纯全、李聚奎等臂带黑纱，伫立肃穆，眼含悲怆，翘首遥望远空。

三点五十分，一架飞机从天空徐徐降落，彭德怀、贺龙、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沉重地举起右手致敬。

他们迎接的是人民解放军财务部部长杨立三的灵柩。

杨立三因患脑癌，同年6月到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去治疗，不幸于11月28日逝世。他的骨灰，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副武官石侠和杨立三夫人李琴的护送下，用专机运抵北京。

杨立三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起义军三个团在浏阳文家市会师，他即开始了在红军中的后勤工作。他负责安排毛泽东的食宿。9月29日，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剩下的700多人缩编为一个团，杨立三为团部副官。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组

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编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秋收起义部队编为三十一团，杨立三任三十一团辎重队长。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杨立三出任副官长兼总经理处处长。从此，杨立三走上了总后勤工作的服务岗位。

杨立三一生专心致志地战斗在后勤战线。1945年8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杨立三出任常委，并任经济部长，还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长。聂荣臻说：“杨立三同志又是我党我军中长期地专心致力于一项专门业务、任劳任怨、廉洁奉公，一直到死而后已的具有优良革命品质的干部。”

杨立三在后勤领导岗位上，经历了我军成长发展壮大的全过程。

在苏区一次次的反“围剿”期间，先后担任中革军委财政部长和红一方面军副官长（负责后勤工作的组织指挥）兼总经理处长（负责后勤供应）的杨立三，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红军筹粮筹款筹集弹药，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尽最大力量保证了前方的供应。

抗日战争开始后，面对几十万人吃饭、穿

衣、看病和打仗，作为八路军后勤部长的杨立三，在党中央和总部首长的领导下，搞生产，办厂矿，抓征收，搞贸易，建银行，抗灾荒，争取外援，厉行节约，一个钱掰成两半花。在他的筹划下，几十万军队挺过了八年，抗战胜利了。杨立三不仅保障了部队的供应，还为中央军委积攒下一大笔银元。1947年8月，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杨立三积攒的这笔银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中国刚成立，我们还没喘一口气，抗美援朝战争又开始了。对于打这么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消耗是巨大的。杨立三又没黑没明地为志愿军筹集各种物资。各种物资每天消耗多少？运上去多少？还差多少？从哪里解决？他都要经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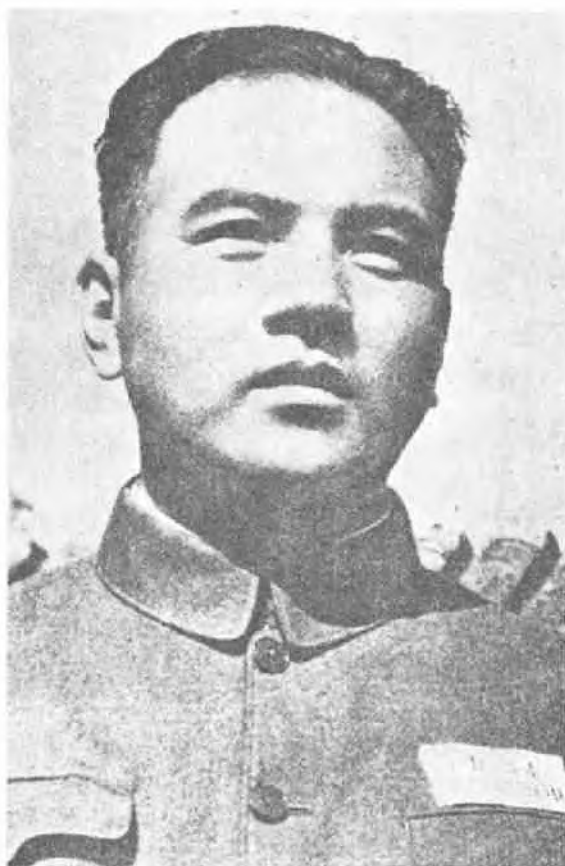
杨立三重视制度建设，他还为我军后勤建设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我军后勤编制体制的确定，机构的设立，各种供应标准的制定，各项后勤工作规章制度的建立及后勤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规划等，都有他付出的心血……

5日和6日，国防部为杨立三举行隆重的吊唁活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送了花圈。不少领导人亲自来到灵堂参加悼念。

在吊唁签到簿上，打头的两个名字是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接着是林伯渠、董必武、徐向前、彭真、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彭德怀、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薄一波、杨尚昆、胡耀邦等人的签名。

望着这些领导人的签名，你似乎感觉到了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杨立三结成的战斗友谊。

人们还特别注意到，在吊唁签到簿上签名的还有许多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如陈叔通、邵力子、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张治中、史良、许德珩、黄炎培、许广平等，他们来吊唁杨立三，不仅仅是出于“公事”，而更重要的是系于深厚的感情。他们敬佩杨立三，敬佩人民解放军以小米加步枪打败美械装备的蒋介石800万军队，敬佩解



杨立三同志遗像

放军后勤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有力地支援人民战争取得胜利。

在两天的吊唁活动中，中央军委、国防部和各总部的领导人，由彭德怀、贺龙领头，每班两人，轮流为杨立三同志守灵，他们当中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粟裕、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罗瑞卿、谭政、萧华、甘泗淇、宋任穷、陈赓等。

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人，还把自己对杨立三的敬意，写成各式各样的挽词，献给杨立三的灵前。

杨立三的追悼会于12月7日上午举行。主祭人为周恩来总理，陪祭人有彭德怀、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彭真、陈叔通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宣读祭文后，周恩来总理作了长篇讲话，介绍杨立三的革命经历、功绩。当他



周恩来、彭德怀等为杨立三执绋引棺

离开稿子，悲不自胜地说：在长征途中，我患重病，立三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抬担架，把我抬出草地……他硬咽得几乎讲不下去了。参加追悼会的千余人，几乎个个热泪盈眶。

那是1935年8月下旬，红军开始过草地，随三军团一起行动的周恩来正身患重病，高烧不退，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断然决定：“抬！宁可把装备丢掉一些，也要把周副主席抬出草地！”他交代军团参谋长萧劲光负责组织担架队。萧劲光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要求担任担架队长，军委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参加抬周恩来。

草地荒无人烟，野草丛生，沼泽遍地，加上时而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一会儿又会冰雹临头，给行军带来极大困难，杨立三和战士们一样，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草地泥水中，双肩磨破了，一歪头就疼，到后来连胳膊疼得都举不起来了，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不离开周恩来一步。躺在担架上的周

恩来看着这一切，心里十分不安，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但都被杨立三劝止了。就这样，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和战士们一起，终于把周恩来安全地抬出了草地。但这时他自己却病倒了……

杨立三追悼会是在北京新街口总政排练场举行的，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党和国家及军队的领导人，亲自执绋引棺到西郊八宝山。走在左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周恩来，随后是彭真、陈叔通、吴玉章、徐特立等，这是文官队；在右边最前头执绋的是彭德怀，随后是贺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这是武官队。当杨立三棺槨被徐徐放入墓穴，周恩来、彭德怀等注视着，接着在墓地绕行三周，眼含热泪，与杨立三作最后的告别。中央和军委以如此高的礼遇、如此隆重的仪式办理一个军队领导人的葬礼，杨立三是第一人。

（责任编辑：刘文）

# 漫 步 日内瓦

● 杜 莉



孙大姐和她的丈夫老李是光明日报驻日内瓦记者。听说我来了瑞士，便几次打来电话请我到日内瓦玩。我们相约周末九点钟在日内瓦火车站碰头。从我的住地洛桑到日内瓦只需半个钟头的火车；但因为我是第一次去日内瓦，人生地不熟，便早早来到了车站。车站上冷清清的，大概刚走了一趟车。我徘徊了一会儿，找了一张长椅坐下，取出刚买的报纸，翻阅起来。

“小姐，这里没人坐吧？”

我抬头一看，前面站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我赶紧挪动一下身子：“没人，你坐吧！”

“谢谢！”

小伙子是个乐于言谈的人，坐下不一会儿，便耐不住沉默了：“你是日本人还是越南人？”

“都不是。”

“是泰国人？”

“也不是，是中国人。”

“啊，中国人！我还是头一回遇见呢！”

可能因为大家都在等候同一趟车，旅途结伴儿，总是件快事。所以我们很快便交谈起

来。听说我第一次去日内瓦。他马上热心地介绍起日内瓦这个城市来：人工喷泉、花钟、万国宫、圣·皮埃尔大教堂……他兴致勃勃地一口气介绍了许多。火车来了，我们一起上了车，他继续侃侃不停地介绍……我努力把那些地名记在脑海中，以便等会儿亲临其境时能留有更深的印象。他告诉我说，日内瓦虽然不很大，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十七万市区人口，但在世界上可是个举足轻重的城市，是二百多个国际组织的所在地。小伙子的话语中流露出他对日内瓦的热爱；再一了解，原来他是个百分之百的日内瓦人。我很庆幸在到达日内瓦之前先结识了一位日内瓦人。小伙子的热情使我还未见到这座城市便被她吸引住了。

日内瓦车站到了。我刚走出车厢，一眼就见到了孙大姐。我把小伙子介绍给孙大姐。分手前，只见小伙子说了声“稍等一下！”便一转身不见了。过了不一会儿，只见他手里拿着一支艳丽的红玫瑰走过来，笑吟吟地把那支玫瑰递给我。

与小伙子分手后，我随孙大姐从车站出来，顺着勃朗峰大街朝日内瓦湖方向走，一路



上都是星级饭店、豪华商场、国内外银行……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繁华热闹：两边人行道旁，成片成片的露天咖啡座，吸引着过客歇脚小酌；琳琅满目的橱窗令人驻足观赏。我们边走边聊，很快便到了大街的尽头，到了勃朗峰桥上。放眼向东，是一汪开阔的水域，是莱蒙湖，但这里的人们都称它为日内瓦湖，看来日内瓦人多么想独自拥有这个美丽湖哇！在湖心不远处有一道白色的水柱，直冲蓝天；水雾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一条七色彩虹，弯弯地挂在空中，非常引人注目。

“那一定是日内瓦的象征物——人工喷泉！”我想起小伙子的介绍，立刻惊喜地叫道。

“是呀！这个人工喷泉建于1958年。水下安有两个高功率的水泵，喷口处的水速达每小时200公里，进入喷管的水压有16个大气压，无风时水柱可高达145米，停留在空中的水量达7吨，这是全欧洲最大的人工喷泉，也是世界上第二大人造喷泉；最大的是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格里芬湖上。”孙大姐真不愧是记者出身，记了满脑子的数据。孙大姐接着说：“晚上，周围的几个聚光灯一开，齐照喷泉，色彩缤纷的水柱直射茫茫的夜空，那才既壮观又神秘呢！”

我心想：下次来这里，我一定选个晚上，非好好看看日内瓦的迷人之夜不可。

我突然发现勃朗峰桥下水流急湍，清澈见底，连逆水而上的鱼儿也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定是日内瓦湖的尽西头。桥的西面两岸收窄，想必是著名的罗纳河。我曾在一些资料上读过：大约有四十多条发源于阿尔卑斯山的河流注成了日内瓦湖，其中最大的一条便是罗纳河。它以湍急的流势从湖的最东头流入，又从湖西头流出，再经法国注入地中海。它是法国境内最大的河流之一。我惊叹这湖水和河水的清澈。孙大姐说：日内瓦市的食用水是从湖中汲取，所以这里的人们十分关注湖水的防污染工作。瑞士和法国政府联手专门成立了“防湖水污染国际委员会”，每年定期开会，商讨净化湖水的办法，共同投资实行各

种措施以防范湖岸施用的化肥和工厂排放的污水流入湖内，并经常检测水中磷、氮及其他有害物质的含量。难怪湖中鱼儿成群，湖边水鸟成片。这里的生态环境确实令人赞赏。

勃朗峰桥以西的罗纳河上，建有好几座桥，单单流经日内瓦的这一段据说就有八座桥。离勃朗峰桥最近的一座名叫贝尔格桥，桥中间连有一个绿树葱翠的小岛。罗纳河就象少女玉洁的脖颈；小岛象一块硕大的翡翠由一条精美的项链串在这少女的脖颈上。孙大姐注意到我那舍不得移开的目光，便介绍说小岛叫卢梭岛。啊！卢梭！但凡学法国文学的无人不晓卢梭。卢梭的生平立刻在我的记忆库中重现：他虽是法国人却生在日内瓦。1712年6月28日，就在这座城市格朗大街40号的一幢房子里，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和启蒙思想家诞生了。当他在法国成名后，依然深深地思念着他度过童年生活的日内瓦。虽然他的童年是困苦的，虽然因为他那尖刻的文章日内瓦政府并不欢迎他，但他依旧在42岁和50岁的时候重返日内瓦。这位酷爱大自然的伟人一直依恋着日内瓦的山山水水……孙大姐陪我来到了岛上。小岛周围有许多白天鹅、绿头鸭和湖鸥嬉戏玩耍……据说，这岛是1583年填土而成的。岛虽小，方圆只有几十米，却长满了高大的树木，中间有一块平整的绿草地，卢梭铜像就座落在草地中央。卢梭面向日内瓦湖，手执笔卷，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沉的思索之中。铜像底座上写着“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岁月终于使日内瓦认识到卢梭是她最伟大的儿子。于1835年2月24日把罗纳河上的这个原名叫贝尔格的绿岛改名为卢梭岛，并以这尊铜像作为对他永久的纪念。

我们从贝尔格桥南端下来后，便朝湖滨方向款款东行。首先见到两座象征日内瓦和瑞士独立的青铜纪念碑，随后便来到了围满游客的大花钟旁。这个花钟镶嵌在突起的一片草坪上，造型美观大方，由6300棵植物聚成，直径达十六七米，日日夜夜风里雨里不知疲倦地给人们指示着准确的时间。这不禁使

人联想到瑞士的钟表业：瑞士的钟表业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尤其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取缔新教后，大批受迫害的新教教徒逃来日内瓦，难民中许多是钟表名匠，在他们的推动下，日内瓦的钟表业迅速发展并带动起全国的钟表业；钟表业渐渐变成了瑞士工业的支柱之一。难怪在许多高大的建筑物上挂满了钟表商标和广告；大小商店及游览点摆设有各式各样的钟表，大的几米高，小的似绿豆，琳琅满目，叹为观止；无论走到城市还是乡镇，举目稍作寻视便可见到时钟，带手表真有点多余之感。日内瓦每年还举行国际性钟表展销会；据说，瑞士钟表销售占了世界市场的二分之一……瑞士真不愧是“钟表王国”，而日内瓦可称得上王国中的王宫了。虽然这些年来日本经济崛起，冲击到瑞士的钟表业，但瑞士钟表的质量和信誉至今在世界上仍是首屈一指的。

花钟旁边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名叫“英国公园”。公园中间有一个美丽的烛台式喷泉。除了喷泉外，便是花卉树木及曲径小路。这个精致的小公园，自然是散步小憩的好去处。然而，为什么称它为英国公园而不称为法国公园或其它什么公园呢？这连孙大姐也无从明白了。

出了英国公园。我们沿湖滨大道继续向东。路旁全是一排排法国梧桐树。离开湖岸向南，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坪中间。周围是高大参天的树木，南面正中的草坪缓缓升起，高处座落着一幢房屋，听说那房子连同那片草坪原属私人所有，后来赠给了政府。房屋里面有个博物馆和图书馆，但一般不对外开放，政府有时在这里为外国贵宾举行招待会。草坪东侧是一大片色彩缤纷的花圃。走到近处，竟全是玫瑰花，品种花色繁多，人象走进了花海之中。孙大姐说，这个园子叫谷仓公园，由于玫瑰花甚多，人们更喜欢称它为玫瑰公园。每年6月，这里都要举行国际玫瑰花大赛。这时，一个花匠正推着割草机割草……在这片美丽的景色中手推割草机，实在是件浪漫的事；我不禁跃跃欲试，便恳求花匠

让我推一推。但没想到那割草机一到了我手中，竟那么沉重，而且极不听话，急得我脑门上直出汗。花匠笑吟吟地过来帮忙，嘿！那机器马上老实了，孙大姐见状抢上一步，“喀嚓！”拍了个特写镜头。

一晃间，已是十一点多钟了。“这里离家不远，先回去吃个便饭吧！”孙大姐接着说：“老李上午有个重要采访，抽不出身来陪你，下午他有空，我们坐他的车可以跑远些。”

孙大姐想得真周到，早为我安排好下午的活动内容了。

两点钟，老李开车把我们带到了老城中心地带的圣·皮埃尔大教堂。教堂是双塔式的，矗立在中心区的最高处，给人一种雄伟凛然之感。老李对建筑风格颇有研究，他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这个教堂从十世纪便开始建造，整整经历了几个世纪才完工。里面的拱顶是罗马式和哥特式的；三角楣是希腊——罗马式的。外面的穹顶模仿了古罗马的潘提翁神殿，它融汇了多种建筑风格。宗教改革前，这里是天主教堂、每届新上任的主教都要在这里宣誓。自1533年，先是法海儿接着是加尔文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经历了14年的斗争，新教终于取胜。而这个教堂正是加尔文布教的主要场所。从此之后，这个教堂也就便成了基督新教的教堂。日内瓦逐渐形成了‘新教的罗马’；收容了欧洲各地遭受天主教迫害的难民。现在这个教堂既是一个宗教活动中心，也是日内瓦人民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每届新选出的州政府要员都要来大教堂举行就职宣誓仪式。每逢民俗节庆，教堂一带总是最热闹的地方。日内瓦特有的‘登城节’每年12月11日晚就在这里欢庆。人们在教堂门前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篝火，鸣鼓奏乐，欢歌载舞到第二天。”“为什么叫登城节呢？”好奇心使我穷追不舍。“这里有一段故事：十六世纪上半叶，日内瓦人摆脱了萨瓦公国的控制，赶走了萨瓦人的大主教，进行了宗教改革。为了重新控制日内瓦，萨瓦公国便串通其它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州，对日内瓦进行各方面的封锁，使日内瓦处于困境之中，但日

内瓦人民不但没屈服还加紧修筑城防工事。这更激怒了萨瓦方面；萨瓦便联合西班牙的军队，于1602年12月11日晚乘日内瓦人进入梦乡之际，架起跳板和云梯偷袭日内瓦。警觉性很高的日内瓦巡逻队发现了敌情，立即敲响警钟。从梦中惊醒的日内瓦居民不顾严寒纷纷参加战斗。有一位鲁瓦约姆妈妈，她的房子下面临近城墙，她便端起一锅正烧得滚烫的肉汤毫不犹豫地朝攻城的敌人头上浇去，然后把锅也一起向敌人砸去。许多妇女都像鲁瓦约姆妈妈一样表现得英勇顽强。在全市居民的奋力抗击下，黎明时分，敌人终于溃败。从此之后，12月11日便定为这里的登城节。”

听了老李详细的讲述后，我心里油然而生起对日内瓦人民的敬意。

“教堂南面是州政大楼和市政大楼，西面有日内瓦大剧院和哈特博物馆，西南方稍远些有一片略微高起的绿地，那儿便是泰宜公园，风景十分幽雅。这是日内瓦中心地带的一叶肺，当地居民很喜欢在这儿休闲散步。从这里可以远眺东面的萨莱瓦山、西面的汝拉山和穿经日内瓦的罗讷河。也可低头俯视新广场和日内瓦大学……”一听“大学”两个字，便挑起了我这位大学教师的兴致，没等老李说完，我便迫不及待地提议去日内瓦大学看看。我们很快就来到了幽静的日内瓦校园。可能是因为这所学校出过许多名人，也可能因为有许多名人来过这所学校，学校的知名度颇高。我已久仰其名，今天终于能亲临此地。日内瓦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设有七个学院、四个学校和五个研究中心，而最有名气的是医学院和新教神学院。就象日内瓦被誉为“国际城市”一样，日内瓦大学也称得上“国际大学”；几百年来这里一直接纳大量外国留学生，外国学生的比例总是接近于百分之七十。我们面前的这幢建筑是一组U字形的楼房。里面主要设有大学的领导机构、图书馆和小部分院系，大部分院系分布在全市各处。因为今天是周末，这里只开放图书馆。图书馆一楼是陈列室，里面挂着不少与该校有关的名人肖像，如加尔文、索绪尔等，还摆放着名人们的手稿和著作，二楼是阅览室。

尽管是周末，仍有许多学生在这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为了不影响他们，我们只是向里面环顾了一下，便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据说这个图书馆是日内瓦最大最古老的图书馆，藏书已达百万册。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可真是够有福气的了。

离开日内瓦大学，我们驱车前往万国宫。万国宫位于罗讷河右岸的新城区。新城区的风格与老城区迥然不同：楼群高大整齐，马路笔直宽阔，许多国家的办事处及国际性的组织都设在这里，充分反映出日内瓦现代化和国际性的特点。

我们的车在一个有栏杆围着的大花园前停了下来。透过栏杆，可见一座浅黄色的雄伟建筑，这就是著名的万国宫，尽管这是联合国驻欧洲办事处总部，但大院以及部分大厅还是向游人开放的。我们首先来到主楼正面的院子——荣誉院，葱绿的草地和高大的松杉显得十分雅静；中间有一个水池，名叫募捐池，游人们常在这里投硬币。池子中央有一个铜制的大浑天仪，上面镂雕着天体十二宫。老李夫妇自然忘不了在这里给我拍照留影。据说万国宫占地面积达32600平方米，分新旧楼两部分。新楼在北侧，1973年才建成；两楼靠一条空中走廊连接，大楼共有50个门。老李对这里十分熟悉，由于工作需要，他时常出入其中。光明日报还在记者工作厅租有一格办公室。我们从新楼的第40号门进入。新楼西侧有700个办公室和6个小会议厅。东面上下层有4个会议厅；下层的会议厅有600多个座位，上层的会议厅有900多个座位。座位上有耳机，可提供六种语文服务。一些公开性的会议参观者可随意旁听。穿过空中走廊我们便来到旧楼。旧楼包括图书馆、大会议厅、理事会议厅和秘书处。据说整个万国宫最漂亮的大厅是理事会议厅，但那里是不对外开放的。我虽然不能亲眼目睹那理事会大厅，但一想到在那庄严的地方总有中国代表参加会议，而且在决定国际事务的关键时刻，中国代表拥有举足轻重的一票，便不禁为自己是个中国人而深感骄傲，我默默地祝愿祖国更加强大大昌盛。

离开万国宫已是下午五点。尽管老李和孙大姐建议我在他们家吃晚饭，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我打算直接去车站乘晚六点钟的火车回洛桑。

时间尚有宽裕，老李便载着我们“跑车观花”，浏览了世界劳工组织大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厦和世界卫生组织大厦。据说日内瓦的国际机构有二百四十多家，除了联合国系统外还有些政府间的组织，如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国际教育中心、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等以及非官方的组织，如保卫儿童国际联合会、世界议会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等，这里每年

举行上千次的国际会议，这都赋予日内瓦显著的国际性。日内瓦连同郊区共有 32 万人口，其中外国人就占了 11 万，而且百分之九十九的联合国成员国都在日内瓦有自己的侨民。可见日内瓦在国际上具有极不寻常的地位。真不愧是一座国际都市。

我带着一种满足感，怀着一腔谢意，乘上奔往洛桑的列车。我告别了朋友，也告别了迷人的日内瓦，但我还会再来，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这个不平凡的城市。

(责任编辑:致中)

## 告慰天下心脏病、骨质增生患者

打个电话或写封信《心康医讯》《骨刺论坛》免费寄给您

任《老年循环系统疾病中医治疗》副主编，《高血压中医治疗》主编、中国名医会员、中国中医药学会高级会员，两次被中央电视台专题报导的王长勇主任，心系天下心脏病、骨刺患者，他运用“中医辨证与辩病相结合治疗各类型心脏病，局部与整体调节融为一体治疗全身各部位骨质增生”，深得患者信赖，应边远地区患者的急切期盼，精心推出《心康医讯》、《骨刺论坛》，内容翔实，针对性强、通俗易懂，它一问世便受到了众多患者的一致赞誉、同行们的共鸣，

称这是免费聘请了一位“家庭医生”。倍受心脏病、骨刺病痛煎熬的患者欢迎，因数量有限，邮寄从速，愿这位“不速之客”给您带来病愈康复的曙光。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 2 号管城中医院王长勇(收)

邮编：450004

电话：0371 - 6321791

证明文号：豫中医广证字〔1998〕第 98 号

## 告知天下“男”言之隐患者

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男性之友》小丛书、《男性之窗》报纸给您

中国中医药学会男科治疗中心最近在郑州市管城中医院男性病科成立，该科是我国最早开展集治疗、研究、诊断、咨询为一体的专科之一。中心主任常松山是我国著名男科专家、全国百名著名医学专家。他潜心钻研、独出机杼，提出的“滋阴固精法治疗阳痿；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征服前列腺炎、附睾炎；优化组合治疗男性不育”等鲜明独特的科学理论，使男科病的治疗取得突破性进展。常主任情系天下男性病患者，同时受中国中医药学会的委托，为开展性知识教育；消除性愚昧，特精心编写了《男性之友》小

丛书和《东方家庭报》“男性之窗”增刊，内容翔实、图文并茂，一册一报在手，尽可“人在家中坐，会诊邮局来”。您只要拨通电话或写封信，一套资料免费寄给您。路迢迢情在咫尺，病煎熬愈在今朝。

地址：郑州市城东路 60 号郑州管城中医院男科常松山

电话：0371—6334610 6336410

邮编：450004

豫中医广证学〔1998〕第 109 号

# 外国记者观战汾阳城

## ● 屈德骞

正是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1944年春，美、英向中共提出：拟派出美、英、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赴延安及黄河以东抗日前线了解八路军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实施的各项政策，以便最后确定能否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军力反击日寇。

在延安宝塔山下王家坪的窑洞里的毛泽东，看过美、英的要求电，微微颌首，对朱德、周恩来说道：

“我们没有么子见不得人的事，敞开大门让他们看，请他们向全世界人民张扬张扬。”

他让周恩来回电表明态度。事情似乎就成了。可国民党顽固派怕外国记者冲破他们的封锁线，便多方设障碍阻拦，直到5月下旬才有条件地同意外国记者团进入延安。其条件是：记者团要有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并派CC特务的骨干担任团长、副团长。

经过几番折腾，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终于组成，团长谢宝樵（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副团长邓友德（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外国记者有：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科学

箴言报》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同盟劳工新闻》的艾泼斯坦，合众社、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福尔曼，路透社、加拿大多伦多《明星周刊》的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的夏南汉神甫，苏联塔斯社的普金科。中国记者有：《中央日报》的CC分子张文伯，中央社的徐兆镛、杨家勇（杨系国民党中统特务，临时以中央社记者名义参加），《扫荡报》采访部主任谢爽秋，《大公报》的孔昭恺，《时事新报》的赵炳粮，《国民公报》的周本渊，《新民报》主撰赵超构，《商务日报》总编金东平。

## 二

6月10日，朗朗晴空，宝塔山身披绿装，捧来延水琼浆，欢迎远方宾朋。

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中共军委参谋长叶剑英代表朱总司令致欢迎词。美国记者艾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开诚布公地说：

“这次来到延安很不易，在同盟国家的阵营里，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关闭起来，不让他们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

这番话委婉地抨击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政策。谢宝樵和邓友德听了很不是味。昨日，他俩提出自架电台发新闻稿，又被中共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拒绝，确定由延安的电台发出。

会后，中外记者由翻译柯柏年、凌青陪同在延安参观座谈。以一个下午的时间，由凌青担任翻译，介绍了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抗击日寇的情况。

周恩来为使记者团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又安排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等，作了有关方面的报告。

朱德总司令应美国记者斯坦因和英国记者福尔曼的要求谈了四个小时。这时，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跨进中央大礼堂会客厅。他侃侃而谈：“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

他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再次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合作，为着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

接着，他又逐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此时，艾泼斯坦提出了毛泽东意想不到的要求，他说：“我们能否看看八路军打仗？”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谁个敢看枪炮林立、子弹横飞的战场？！

首先反对的是重庆来的中国人。

西方人爱寻求刺激，几个外国记者积极响应艾泼斯坦提出的要求。

毛泽东愣怔片刻，说了一句洋人始料不及的话：“中国有句古训：‘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外国人也信奉这一条，好。”

毛泽东随即给河东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交待：千方百计保障外国记者的安全。没提看打仗的事。

### 三

记者团正副团长谢宝樵和邓友德本来就怕到黄河以东去进一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现在外国人又提出看打仗，这更是要命的事。于是，出面极力阻止，当阻止不成时，只好将中国记者全部拉回重庆。美国《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也随中国记者返渝，其余外国记者坚持不走，决心去河东访问。

这一闹腾，耽误了一个月，外国记者才于8月上旬离开延安。离延安前，毛泽东到交际处为他们饯行。

次日，五个外国记者在翻译柯柏年、凌青的陪同下来到黄河西岸。这里河水汹涌，浊浪排空，岸边仅有几只羊皮筏，他们跳上一只羊皮筏，那高达丈余深陷数丈的浪峰浪谷未能把小筏掀翻。可有两个洋人却翻江倒海地吐了一滩小米饭。

过到河东，来到晋绥军区的防地。记者们参观了作过战的战场、医院、工厂、学校、农村，并访问了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游击队员、农民、村镇居民、乡绅、政府工作人员等。

这使他们看到了军民团结对敌，战斗不忘生产建设，生产为了支前的生动场面。一致认为，有了这样的党，这样的人民，这样的军队，配合盟军反攻日本侵略者是绝对有力量的。许多记者纷纷发出消息报道。

此时，艾泼斯坦心中很纳闷：为何还不安排看打仗呢？他等不及了，便向政委罗贵波提出来。

这可把罗贵波问愣了，上面没有交待呀！他把情况报到贺龙那里，贺龙乐了：“哈哈！既然他们想见识见识我军的威力，那就让他们去看好了，最好捉几个鬼子兵请他们当场过目，让他们帮我们宣传。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我就管不着了，那是你罗贵波的事。还有，这一仗要打得绝对漂亮，由你罗贵波负责组织指挥。”

### 四

罗贵波最担心的还是外国记者的安全，他和政治部主任李曙森带着几个参谋，秘密地围绕汾阳城的四周选择参观点，历时两天，选在距汾阳城东三里外的一座山岗上。此山高于汾阳城，既看得见，又有一定的距离。罗贵波看罢这里的地形，对李曙森说：

“枪弹一般不会打到这里，炮弹就难说了，另外，我最担心的是，怕战斗发展危及到这里。因此，我建议你带一个骑兵连来保护，随时准备用战马驮着外国记者迅速撤离。”

经过一番精心的组织与准备后，李曙森带着骑兵连，护卫着五个外国记者两个翻译，于9月13日黄昏出发了。

老外们骑在马背上，随着马背上下颠簸，看到这神秘莫测的行动，心脏怦怦跳动，胆怯起来。他们于子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到达了预定参观点。

罗贵波早已在此等候，他迎上

前来和外国记者们一一握手，并说：“请先生们用点夜宵。然后睡觉，养足精神再参观。预定战斗打响的时间是明日拂晓。”

他说罢，下山组织战斗去了。

此刻的洋人们老实得像羊羔，吃罢玉米糊和烤山药蛋，便各自寻找隐蔽而又能躺下身子的地方，盖上带来的军用毛毯，紧缩脖子睡觉。老外们心中有事，凉风袭人，个个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李曙森从骑兵连中挑了七匹快马和七个最佳骑手，负责驮外国记者和翻译撤离；并以一个骑兵排担任警戒，以二个排作为机动作战力量，随时应付出现的意外情况。

日军在汾阳的主力有第59旅团一个加强大队和直属部队约900余人，另有伪军400人，城防工事坚固。东门外火柴厂、汽车站、大营盘和北门外飞机场有一个大队，约400余人，并有伪军300人配合，城西六里处协和堡有两个中队，约200余人。

罗贵波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法，先打城外诸据点。

14日凌晨，一夜不曾入睡的外国记者们纷纷拿起望远镜张望。不多时，在汾阳城三个不同的方向上出现雷击般闪亮的火光，接着传来激烈的枪声和隆隆的炮声。外国记者们兴奋得像孩子似的喊叫：“打响了，打响了！”有的忘情鼓掌，奔跑呼号。英国记者福尔曼和美国记者斯坦因、艾泼斯坦表现最为活跃，李曙森和翻译连忙制止他们：“请先生们安静，注意隐蔽。”

天色微明，战斗场面清晰地呈现在眼前：那浓黑的硝烟在正方形的城头上滚动，一个个碉堡爆炸升空，火柴厂、汽车站、大营盘、飞机场地区，潮水样的人群呐喊着，涌来荡去。枪炮声不绝于耳。

两小时后，枪炮声停止，涌动的人群不见了。外国记者们忙问这是怎么回事？李曙森解释：“敌据城居

高处，我们白天不便进攻，要等到天黑再发动攻击。”

不久，参谋带领几个战士押了五个日军俘虏，来到山岗上。外国记者们一拥而上。

参谋立正向外国记者行了个正规军礼报告：“这俘来的鬼子兵，是我们贺龙师长特意送给记者先生们的见面礼。目前我们已经攻下了敌人城外的据点汽车站和大营盘，共歼灭日伪军 100 余人，俘 200 余。”

“啊！真了不起。”

外国记者们欢呼跳跃。

艾泼斯坦见了抓来的活生生的日军俘虏，“共产党不抗日，八路军不打仗”的谣言立刻在他心头消失。他转身走到俘虏跟前，指着一个年龄较小的问：“你怎么来侵略了？”

“他们说中国好玩，有花姑娘。”

小俘虏这样回答，艾泼斯坦气得七窍生烟。

苏联记者普金科问一个年龄较大的俘虏：“他年岁不大就想花姑娘，你呢，你是为啥来的？”

“大东亚共荣。”

普金科连连摇头：“你是受骗的可怜虫！”

## 五

红日西下，夜幕降临，汾阳城头骤然响起枪炮声，外国记者们争夺望远镜观看，手舞足蹈，哇哇喊叫。

此时，火柴厂方向出现一片蓝、绿、黄色的火光，这是制造火柴的化学药品被引燃了。紧接着，北门外飞机场冲起一道耀眼的金光，响声有如山崩地裂。李曙森告诉外国记者，这可能是未能逃走的飞机被引爆了。

洋人们更加兴奋活跃，如同那二尺顽童，不知疲倦地蹿上跳下。

午夜过后，外国记者们要求向汾阳移近一些，李曙森同意了。于是下山来到通往汾阳的大路上。此时，道路两侧已有民兵警戒，还有不少男女民兵忙着前运弹药后送伤员。这种紧张而有序的神秘场面，老外们是第一次见到，颇感新奇而又惊异。李曙森带领骑兵连护卫着他们顺利来到距汾阳不足一里的一座土岗上。李曙森把外国记者和翻译安排在破碉堡里，通过了望孔朝外观察。

这里与上一个参观点截然不同，八路军战士的喊杀声和鬼子兵的惨叫声，听得真真切切。拖着火红尾巴的曳光弹嗤嗤横空掠过，猫在碉堡里的外国记者们，此刻对那常用的形容词“惊心动魄”才体会到是个啥滋味。

时至 15 日破晓，火柴厂、机场的枪声停止了，只有协和堡方向还在炒豆般地响着。猛然间，汾阳城东门冲出一伙鬼子兵！“不好，敌人杀出来了。”李曙森立即命令骑兵备马，准备驮着外国记者们后撤。外国记者们那里见过这种阵势，开始惊慌起来。

刹那间，一排炮弹呼啸而至，拦住了鬼子兵的去路，旋即八路军迎上去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厮杀。

“呵！罗政委的引蛇出洞成功啦。”李曙森喜极了。

“成功啦！成功啦！……”

艾泼斯坦等孩子似地呼叫起来，想钻出碉堡去看个仔细，李曙森忙把他们堵回碉堡里去。

上午 8 时许，罗贵波下令撤出战斗。

最后这一仗，又歼灭日伪军 200 余人，俘 450 余人，炸毁飞机一架。

## 六

汾阳之战结束后，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在驻地张灯结彩锣鼓宣

天召开大会，欢迎从战地观战归来的外国记者。

罗贵波要外国记者们自由评说。

英国记者福尔曼先代表外国记者讲了话。他激动地说：

“我们不懂军事，但我们只知道仗打得好，歼灭了那么多的敌人。我要说的是，这次来看到许多东西，知道了过去有些人告诉我们的是不对的。他们说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在打仗；他们说八路军没有捉到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到的俘虏；他们说这地方的人民害怕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这里的人民热爱八路军、拥护八路军。”

“我看过你们的武器，你们的武器太旧，比日本的武器差多了，但你们打赢了。这次战争证明了最要紧的东西，是精神和勇敢。”

美国记者艾泼斯坦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讲了话，他说：

“我们在前线看见了八路军与游击队、民兵及人民配合作战，是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所需要的作战。我们是新闻记者，我们不单要将所见的事实告诉世界人民，并将你们的坚强战斗意志也告诉他们。如同罗政委所说的那样，在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共产党、民主政府是受一种物质上的封锁与新闻上的封锁。但是，今天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阶段，这种情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只有共同携手，才能最后战胜法西斯。”

外国记者们也的确履行了他们的诺言，在他们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报道了延安和边区欣欣向荣的面貌，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特别是亲眼看到八路军打仗的情形。

(责任编辑：刘文)

# 澳门赌王何鸿燊

● 吴跃农

濠江闻人何鸿燊，是澳门赌王，他不仅是澳门支柱产业的象征，也是澳门回归祖国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分子，他是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是1998年5月在北京宣告成立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89年6月，在香港的十大超百亿资产的富翁名单中，出现了一个新名字，他就是何鸿燊。

当人们进入澳门境内，举世闻名的葡京大酒店——鎏金的“皇冠”式建筑耸空而立，十分“抢眼”，这就是何鸿燊名下的“葡京娱乐中心”。它与摩洛哥的蒙地卡罗，美国的拉斯维加斯的世界大赌场齐名。

澳门是以旅游业立足于世的，而旅游业的核心则是赌场，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殊的娱乐业。没有赌场，就没有澳门的繁荣。

澳门开埠至今已有400年历史，赌业也有400年历史，只不过，澳门的赌业在150年前还是民间性的聚赌，1847年，澳门政府颁布法令，宣告赌博业合法化，一时间，澳门赌档林立，江湖人物控制了其中的大部，流血火并事件层出不穷。

为了杜绝赌业的混战，澳门政府在1896年开始对赌业实行“博彩专利权”，由民间竞投，价高者得。1961年，何鸿燊竞得此专利权，走上了澳门赌王的不归路，与此同时，澳门的赌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1962年至1974年，澳门此项娱乐收入20余亿澳门元，1975年高达60亿澳门元，1986年，澳门赌场的特许经营权续期，之后以每年38%的速度递增，仅1989年，也就是何鸿燊跻身香港十大亿万富翁行列之时，澳门政府从赌场所得收益高达1.77亿美元，占澳门政府总收入的一半。

别以为赌场的钱就好挣，何鸿燊说，“我现在常常教导伙计，工作要勤力，要有奋斗心及隔夜心，时刻要想办法解决难题，如果做老板的一上班就要找你，你就成功了！财产如果利用得好，就可以不断翻跟斗，拿着一百万，可以当五百万用……”

这位高鼻凹眼的赌王有着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20年代，何鸿燊出生于何东大家族，他的祖父是何东的弟弟何福，是一位中英混血儿，由于精通英文，又兼有中国的“根”，他成为香港商务中的买办。何东

几个兄弟都是先做买办，随后经商，发家致富的，何东又是最突出的，他在怡和洋行一干就是20年，同时自己经营地产，到1906年，他已是东南亚最富的华人，并获准在中区半山“高尚住宅区”居住，成为首位入住此区的中国人。何东富裕之后乐善好施，他的捐助，至今无人可与相比，1956年，何东逝世，他的慈善基金会仍然每年拨款千万余元，分赠给香港的100间慈善机构。

何鸿燊的父亲叫何世光，是当时渣甸洋行的买办，还是立法局议员及华东三院主席，是香港的著名的富商。这时的何鸿燊，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纨绔生活，他在香港最好的学校皇仁书院读书，成绩很差，何鸿燊后来回忆说，“有钱子弟读书总是差点，我念的是第三级D班，即是成绩最差的一班。”

要不是何鸿燊父亲一夜之间家道破落，实在是很难讲有没有今天苦苦奋斗出来的何鸿燊。何世光凭着自己的中英皆通，当时在香港的股市上是如鱼得水，正大把大把赚进，谁知，怡和大班给他设了一个圈套，让他相信怡和的股票要大涨特涨，结





何鸿燊

果，何世光中计，被怡合套牢，因欠巨债难还，索性一走泰国了之。

父亲逃走了，穷困逼来了。本来，何鸿燊一家是住在香港的麦高奴道的花园洋房中的，这是祖屋，当然首先是卖掉用来还债，还有在赤柱的渡假屋及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去抵债了，何鸿燊陪伴母亲借住在一间狭窄的小屋之中。

贫穷要挨白眼，何鸿燊自小懂得了这份“悲愤”，一次，他的一颗牙蛀烂了一个洞，痛得他吃不下饭，坐立不安，可他又没钱去补牙，强忍着痛又实在是受不了，怎么办？他想起自己的一个表丈是牙医，就去找他，姑表太

看了看，不屑地说，“你没有钱，补什么牙，拔掉算了。”何鸿燊泪水夺眶而出，转身就走，他知道，有钱的亲戚见到他们母子是绕开道走的，生怕要向他们求助似的，母亲为此常常独自落泪，看着母亲眼角因操劳过早长出的鱼尾纹，何鸿燊一下子成熟起来了，他开始勤奋读书，为

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拿到奖学金，赚了钱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何鸿燊终于在D班考得第一名并获得奖学金，创下皇仁书院D班考得奖学金的记录，之后，他又以优秀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也获得了奖学金。到第二年，他的成绩全院第一名。

何鸿燊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当时发誓要成功，但绝没有报复的因素，我始终认为，无论如何，没有人喜欢过贫穷的生活。”

香港沦陷后，何鸿燊进入澳门联昌公司。这是他一生经商的开始。澳门是中立区，是中国南部的国际避难所，在抗战期间，

这块弹丸之地的居民竟达50万之众。当时联昌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供应这50万人口的粮食，主要是易货贸易。何鸿燊以自己的流利英语，在公司担任了秘书职务，同时，他又苦攻日语，何鸿燊的记忆力非常出众，当时澳门的两千多个电话号码他能倒背如流，只要老板一有事问，他马上就能随口应答，再加上他善于周旋四方，这样，老板不断地给他重任，他的职务也就步步高升了。

易货贸易，就是当时的澳门政府将所有的物资，如拖船、小汽船等等，都交给联昌公司，让他们带到广州去换回粮食、面粉、糖、盐等供应澳门50多万人的日常生活。必需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也必须与海盗周旋，有一次，何鸿燊到公海上做一笔30万的生意，由于内奸出卖，引来海盜劫财，公海上茫无人烟，机关枪一阵阵的扫来，何鸿燊不动声色，脱光衣服让海盜搜走现金，赶在海盜争抢之时，开船奔逃，挣脱了被海盜灭口的噩运。

由于何鸿燊的才能和出色工作表现，被任命为联昌公司供应部主任。他上任后，着力解决日趋严重的澳门供粮问题，当时，澳门的粮食危机是一触即发，四百多块银元才买一担白米，何鸿燊上任后，急赴广州，四处恳求救济，经过艰苦地奔波，终于买到了几船大米急运澳门，当何鸿燊押着大米返澳入港口时，受到了澳门被饥饿困绕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何鸿燊成了澳门的英雄。

这使何鸿燊在澳门有了知信度。1943年，何鸿燊自己独资开设了一家煤油公司，还与朋友合资开设了一家煤油提炼厂，澳门电力公司的燃油，十有八九来自何鸿燊的煤油提炼厂，这时的何

鸿葵，经营范围十分广泛：拆船、金银买卖、药品代理、火柴制造等等，不到一年功夫，何鸿葵就赚进了一百万。

何鸿葵的生意做大了，成了澳门的重量级人物，这时，有人心理就不平衡了，要除掉他而后快，派了刺客来寻刺，那天，何鸿葵去香港提货，刺客扑了空，竟往他的煤油厂连扔四颗炸弹，结果，有两颗被工人及时扑灭，有一颗未能爆炸，还有一颗扔在了刺客自己的脖子里。何鸿葵决定把公司迁往香港，在离开澳门时，何鸿葵暗下决心：我决不认输，我一定要回到澳门来的。

何鸿葵到了香港后，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与人合资建立了利安建筑公司，向蓬勃兴旺的香港房地产市场发展，到50年代中期，他在香港已经是有名的大亨了。

然而，他的梦还在澳门。当时的澳门，以黄金交易和赌业而闻名，他要在赌业上发展。何鸿葵自己不赌，但他懂得赌业是高赢利的，决心拿下澳门的赌业经营权。1961年，澳门赌业的霸主傅老榕与高可宁先后去逝，他们的专营权也到了期，他们的后代正准备与澳门政府续签合约，何鸿葵毅然回到澳门。这时，澳门政府把赌业的税收猛然提高了10倍，并向外公开招标，高可宁的后代迟迟不出来应标，准备以此要挟澳门政府、迫使政府降低税率，此时，何鸿葵出手了，何有1000万港币在手，竞投绰绰有余，然而，与赌业相关联的娱乐场所和大酒店的建造，都是需要大笔资金的，非何鸿葵一人力所能及。何鸿葵想到了他的朋友，香港地产强人霍英东。何很快就与叶汉、叶德利、霍英东结成联盟，以公司的名义向澳门政府申请牌照，并签署了应标协议。

何鸿葵的杀出，把与澳门政府讨价还价的傅高后代气昏了头，他们联手向何鸿葵施加压力，要逼何鸿葵离开澳门，否则，就要他的命。何鸿葵当即还以颜色，他说：“如果有人出10万元来杀我，我就出100万让人毙了他的命。”对手看何鸿葵如此“硬”，另生一计，停开至澳门的轮船，让赌徒上不了岸，何鸿葵没有被难倒，他出资入股“佛山轮”，成为该轮的永久股东，自然，也就不受人制约了。

何鸿葵上手后，先是让叶汉主持赌场的工作，他自己则赶紧到蒙地卡罗和拉斯维加斯两地去考察，把国际上新流行的一些赌博花样推广到澳门，这对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产生了吸引力，营业额直线上升。与此同时，他把赢利的钱拿出来投资到澳门的酒店旅游业上，把赌业与豪华酒店的各种服务融为一体。叶汉看到何鸿葵如此能干，不久宣告退位，到1975年，澳门的赌业大权已由何鸿葵独立执掌。

早在1972年，他就已经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自己的信德公司，主要经营港澳的海上客运，对地产和饮食也有涉及，由于经营得法，公司赢利相当惊人，第二年就挂牌上市，一直是香港股民追捧的强势股。到了80年代，何鸿葵通过一系列漂亮的收购，信德的市值又有大幅度增加，到80年代中期，何鸿葵在澳门的地位已不可动摇，这时，他“老虎下山”了，开始在香港、台湾、祖国大陆投资，成为商界的强人，到1994年，信德公司股票突破了140亿港币。而此时，何鸿葵旗下的赌场，也是兴旺蒸腾，每年的投注在1300亿港元之上，相当于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6倍，每年上交给政府的赌税超过40亿港币，占澳门总财政收入的50%之

上。有30%左右的澳门人直接或间接受雇、受益于他的公司。实际上，他是澳门相当一部分居民的“老板”，就经济上的影响力而言，何鸿葵是澳门的无冕之王。有人曾向他打听成功秘诀，他说：我算不得什么人物，也没有什么秘诀，不过经营上倒是有点值得注意：一是做事必须勤奋；二是锲而不舍，有始有终；三是一定要有好帮手；四是待人忠实，做事雷厉风行。钱，千万不要一个人独吞，要让别人也赚，做生意一定要懂得有取有舍，有的虽可获一时之利，但无益于长远之计，宁可舍弃，不可强求。

为了澳门赌业的长盛不衰，适应社会的发展，何鸿葵促使澳门政府于1982年5月修改了立法条例，将“赌博娱乐”改为“幸运博彩”，并明确宣布澳门是“永久性博彩区”。

何鸿葵是混血血统，体内流着英国、波斯、犹太和中国四个种族的血，但他只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他长得特别迷人，1980年，正当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获选为“香港十大最迷人的男士”，何鸿葵一生风流韵事不断，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当时澳门的葡萄牙丽人 Ciementina Leitao，但他最记忆深的是早年因囊中羞涩，班上一位漂亮的姑娘向他频送秋波之时，他却连请姑娘喝一杯咖啡的钱都掏不出来，只能“逃”之大吉，他感叹地说，“谁也不愿意受穷”，现在，他发达了，他没有忘记过去，他对自己的母校皇明书院、香港大学的捐资是很慷慨的。何鸿葵对跳舞特别爱好，他的三步舞跳得特别好，在澳门，处理好土生葡人的利益、香港方面的利益和中国内地方面的利益，恰恰是他那腾挪手脚的“三步舞”。

（责任编辑：刘文）

# “父教育母实业” 的实践家张謇

● 邱 健

早在50年代初,毛主席在谈到中国近代工业时曾经说过:“讲民族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在中国近代史上,很难有一个人既是实业家,又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的思想是那样博大精深,性格是那样坚韧不拔。直至今日已过去七十多年了,我们还能感到他的存在。他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他的事业,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

70年来,国内外关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研究中,对张謇研究之风颇盛。其中尤以日本经济界为甚,他们连张謇的“大生纱厂”的历年帐本都在收集研究。日本著名学者野泽丰先生认为:“如果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是怎样进行的,就要研究张謇,因为他是现代中国企业家中伟大的先驱者。”法国学者玛利安娜·巴斯蒂,着重研究了张謇为发展现代教育而作的努力,并指出:“张謇从他的企业盈利中捐出大量的钱用于教育事业,这与他的‘父教育、母实业’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 寒门弟子夺魁状元

张謇出生于1853年江苏南通

市海门县常乐镇一个农商兼作的小户人家,到父亲这辈才开始读书识字。

当时的中国已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侵略者用洋枪火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延续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一步步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国人民的处境更加苦难深重。少年张謇忧国忧民,寒窗苦读。他四岁时,即由他父亲张彭教授《千字文》,他能熟练背诵而不错一字。由于他刻苦攻读,15岁时即把《尔雅》、《礼记》、《左传》等古书念完,能做八韵体,并制艺成篇。他12岁时,在一个老师家中读书,老师见门外有人骑白马而过,即给张謇出了一个上联:“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很快应声对出了下联:“我踏金鳌海上来”。老师听后大喜,到处夸奖他将来有做状元的预兆。张謇16岁考中秀才。

1869年,原通州知州孙云锦赏识他的学识和才能,便将他带到南京和开封当他私人秘书。这使他有幸结识了许多政界要人,也目睹了淮扬地区民众的贫困疾苦和黄河灾民家破人亡的惨状,使他蒙发了想要治理黄、淮两大河流的雄心壮志。

1892年,他又成为清军爱国将领吴长庆倚重的幕僚,此时,在亚洲

正发生了“壬午事变”(即朝鲜发生反对日本侵略的壬午兵变)。29岁的张謇随吴长庆督师援朝。十年幕僚生活,为他增长了不少政治经验。他针对日本急于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的紧迫形势,代吴长庆撰写了《朝鲜善后六策》等一系列对日防御等策论,上书清廷高层,因而得到了翁同和(光绪帝之师)等达官贵人的赏识,然而张謇的这些主张,却被北洋大臣李鸿章斥为“多事”而束之高阁。

1885年,张謇乡试中举,九年后,即公元1894年已逾不惑之年的张謇终于荣登榜首,状元及第。

## 弃官办实业 实现救国理想

考中状元后的张謇,甚得慈禧太后器重,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南书房,从此名震全国。当时有些封疆大臣以聘张謇入幕为荣事,而张謇却发出“南不拜张(树生,广东总督),北不拜李(鸿章,直隶总督)”的壮语,正可望在仕途青云直上之时,他却毅然“退屏江海”,“弃官而营实业”,以实现其救国理想,并身体力行,以实业家闻名于世。

张謇为何辞官而投身实业?这与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四伏的现状是

分不开的。1894年7月，日本不宣而战，爆发甲午战争。一向警惕日本侵略野心的张謇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与他恩师翁同和等人奔走呼号，奋力推动清政府整军抗敌。然而由于执政者的腐败无能，战事节节败退。张謇怀着强烈的爱国忧愤，毅然上书痛斥李鸿章“主和误国”的主张，要求罢免李鸿章，显示出他超人的胆识和勇气。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南通，张謇义愤填膺，在当天的日记里抄录了这个卖国“和约十款”的主要内容，忧心忡忡地发出“几罄中国之膏血，眼看国势衰弱，外患内忧，国体之得失无论矣。”的怒吼，他奋笔撰述《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提出八条救国改革措施，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志士南北呼应，力促清廷变法强国。

1898年6月，发生“戊戌变法”，张謇在这场变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年以后，他又单独向清廷奏陈《变法平议》，实际上是“戊戌变法”思想的延续和发展。1903年，张謇东渡日本作实地考察70天，深感必须效法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回国后，他竭力鼓吹和推进中国宪政运动，筹办了具有近代议会政治色彩的江苏省咨议局，成为中国立宪派的领袖之一。

清政府抱残守缺，无心变革，搞假立宪欺罔视听，使张謇大失所望。于是他摒弃君主立宪，彻底转向共和，拒绝了清政府的任命，与清王朝公开绝裂，实现了他一生政治上的最后转变。1911年，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张謇接受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提请，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

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恢复帝制，张謇坚决辞去原先所担任的一切职务，与之分道扬镳，以全部精力投身于“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艰难事业征途之中。

张謇弃官投身实业，是与他本人的经济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方针分不开的。他在《海关进出口货价的表序中说：“自海禁开通以来，各国洋货输入，我之金钱日以漏出，国人皆知其病灾”，“捐我之资产以资人，人即用于我之货以售我，无异沥血肥虎，我日贫，国于何赖！”张謇提出“救货之法唯推实业，致富之法亦唯推实业”、“国非富不强”，“富非实业不能”的结论。可见，张謇的经济思想出发点就是救贫救国，而要达此目的，就必须振兴民族工业，走“实业救国”之路。这就是张謇完成了从封建士大夫到资产阶级实业家决定性转变的社会背景。

## 近代中国民营企业的典范——大生企业集团

张謇返回故乡南通后，对办实业之事进行了认真、慎密的思考。他认为不普及教育不足以救世，而普及教育，则非靠兴办实业不能提供资金，而兴办实业，又以纺织最为有利。因南通是产棉区，产量高，质量好，“冠绝亚洲”，棉纱销路很旺，办棉纺厂很适宜。于是他于1885年开始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如今这座103年的高龄老厂（今改名为南通国棉一厂），还有保留完好的张謇建厂时的一座古老钟楼以及升堂议事的公事厅和幽雅的院落。

大生纱厂是张謇倡导的“实业救国”付诸实施的发端。他在筹办纱厂的最初阶段，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资金。他费尽心机周旋于官府、钱庄、商人之间，连去上海集资的活动经费都靠卖字筹得。此时，社会上一些不支持办厂的幕僚和土豪劣绅对他冷嘲热讽不断袭来：“厂囿虽高，何时出烟？”“引擎虽动，何时出纱？”。1899年机器安装完毕，流动

资金所剩无几。为保证按时投产，他不得已冒着不留原料储备的风险，把已经到手的8万银两的棉花全部卖出，将所获款项作应急投产的开支。可巧这一年纱价一直攀升，到夏秋之交，卖纱所得款逐渐增多。才使购入原料等开支有了着落。

在本世纪初，为解决纱厂原料来源，张謇又开办了通海垦牧公司，走上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1901年，在南通与海门交界的黄海淮上举行《通海垦牧公司》破土动工典礼，从此揭开了中国农业企业化的历史新篇章，开创了从小农经济向现代大机器生产发展之先河。

张謇兴办实业的成就是辉煌的。以大生纱厂为例，仅1917年一年，就盈利263万两黄金。他利用这些钱再去投资新的企业，到1923年已发展成一个拥有40多个农、工、商企业，资本总额达1400多万两，合3400多万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再以垦牧事业为例，自“通海垦牧公司”成立以后，又成立了十多个垦牧公司，在绵延200余英里的沿海滩涂上，共占地面积455万亩，已垦土地70万亩，投资总额2100余万元。他还接连办了许多配套厂，如天生港发电厂、广生炼油厂、资生铁厂、面粉厂、翰墨林印书局等十几个企业。1908年，这些企业合并起来，组成“通海实业公司”。在这之后，张謇又陆续创办了银行、航运等企业，还在外地许多企业中投资。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以大生纱厂为中心的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

当时海关报告惊呼：“推张殿撰之意，凡外国运来各种货物，均应由中国创办。”一位历史学家评说：“张謇这种举办实业的狂热，不能单纯以利润追逐来解释，它体现了一个爱国者渴望祖国日臻富强的真挚心愿。”

张謇不仅在苏北兴办了这么多配套企业，而且对南通城市作了合理布局。例如他把发电厂建在长江

边上的天生港镇，把大生纱厂和炼铁厂建在城郊西北的唐家闸，这就避免了日后的城市污染，又发展了两个工业重镇。九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人们似乎才理解张謇这位富有现代化意识，现代化先锋这种布局的科学性和优越性。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认为，大生集团当时的规模和技术、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在国内居领先地位。张謇所创立的大生企业集团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成功的突出范例，其影响不仅震动东南沿海，而且波及全国及国外。

## “父教育而母实业”的高深谋略

“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可说是张謇政治思想的两翼。他的“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名言，道出了他对两者关系的辩证理解：办实业可以为办教育筹措经费；办教育，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素质，才能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早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就清醒地认识到：“立国自强，首在人才”，“立国由于人才，人才由于教育。”他主张各省广设学堂，普及教育需从小学开始，尤其须从师范开始。1902年他首先创办的“通州师范”学校，开创了我国以现代化教育培养新式师资的历史新纪元。接着，1905年，他又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为了办好师范，他下定了“家可毁，不可败师范”的决心。为了办好师范，他特聘请了许多中外著名学者到南通任教，使通州师范声名鹊起。

在张謇的倡导和推动下，南通的办学风气高涨。为了普及教育，培养人才，合理布局，避免小学生往返劳顿，他甚至亲自到垦区步行丈量，规定每九平方公里设置一所小学。

张謇同样重视农、工、商专业技

术。其中有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纺织专科学校、医学专科学校。1902年，他把医专、农专、纺织专合并成南通大学，使南通的教育事业跨上了更高的层次。他主张办专业学校从小到大，有的先办附设，后办专科，这也是办高等教育由小到大的—条发展路子。直到1952年，全国唯一的纺织工学院——南通纺织工学院，已相继向全国工厂提供了大批纺织工程技术人员。直至80年代，上海、常州、东北等地纺织界还使用该校毕业的学生作业骨干。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从南通出去的五位学部委员。

张謇办学的功德不仅恩泽故里，而且惠及全国。中外闻名的南京大学，翻开它的校史，“两江师范学堂”就是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今日南京的“海河大学”其前身是张謇创办的“海河专门工程学校”，至今他的照片还悬挂在校史室内，供一代代学子瞻仰缅怀。

张謇帮助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建的震旦学院、复旦公学，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名牌大学——复旦大学。更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914年，张謇为“测绘养成所”制订的章程中，就已明确规定这所学校的教育方针为：德、体、智全面发展。

张謇在本世纪初即组团赴日、意、美等国考察教育，把东西方各国文明吸收过来，冶于一炉。为我所用，以利地方和国家建设。在那个时代，他的这种伟大的气魄和立意的创新，令人感佩不已。

## 对外经济开放的先行者

张謇是我国较早提出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人。早在七十六年前他就提出：“以振兴实业，为挽救贫困之方，又以开放门户，利用外资，为振兴实业之针。”并以“办法”、“组织”、“取缔”、“缴款”等方面为利用

外资提出具体方案。张謇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强调无论利用外资形式如何，都须“遵守中国法律”。他指出，引用外资虽能活跃国内社会经济，“但同时应冀于国家财政有直接之利益”，量力而行。张謇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所能达到的视野中，提出这些开放、引进的主张，是对几千年闭关自守传统观念的可贵突破，意境深远，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过程中，深切体会到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才的重要。从“大生纱厂”开办时，他即引进英、美、日等国先进的纺织设备，并特别重视引进人才，主张“借才异域”，“聘用西人”。直至今天南通的大地上还长眠着几位他聘请来的外国专家和学者。如本世纪初，长江下游岸畔兴起的新城——南通，首先得益于有一条稳定的海岸线，而当年设计建筑保坍巨大工程者，是由张謇聘请来自远洋荷兰的水利专家亨利·特莱克先生，他参加了主持从设计到施工的整个工程。此后又为张謇在黄海之滨开发牧垦、盐垦事业的设计与系统的水利工程，如开渠、修堤、筑闸、建桥等，对御潮、排洪、蓄淡、灌溉起了很大作用。但他不幸于1919年在建闸工地因生活条件恶劣而染患霍乱症，在抢救途中逝世。张謇十分悲痛，立即通过上海领事馆向特莱克母亲慰问和征求对她儿子后事安排的意见。伟大的母亲强忍悲痛毅然表示，亨利·特莱克工程师遗体安葬南通，与中国土地永远在一起。生前译著明代潘季驯水利专著“河防一览”永存海牙国家图书馆。张謇亲自为特莱克工程师举行了地方公祭和立碑永志不忘。

为了争取对外贸易的主动权，1910年张謇出任南洋劝业会审查长，在这些国际贸易活动中，中国参赛作品屡屡获奖，为国争光。张謇还是中国海洋开发的早期开拓者。1905年，他筹划成立了“海洋渔业公司”，

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捕鱼技术，购置国外渔轮，推进了中国早期渔业生产现代化进程。

## 独创很多中国第

### 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张謇在创办实业过程中，由于缺乏技术知识和技术人员，虽用高价聘请英国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给他们盖洋房，吃西餐，但他们故弄玄虚，盛气凌人，每月到工厂工作只有三、四天，以技术卡人。张謇对此感触颇深，下决心自己办教育，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1903年，他从工厂盈利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

### 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院”

张謇作为维护变法运动中“强学会”学员，他在甲午年中状元后，上书清政府请求在北京设立博物馆，未被采纳。为了推广社会教育，他于1905年在家乡南通办起了全国第一个“博物院”，堪称中国博物事业的奠基人。馆内展品有自然、历史和美术文物，标本数万件，其中不少是张謇私人捐赠。在南馆门前，至今还挂着张謇亲笔题写的一副对联：“设为庠序学校以教，多识草木鸟兽之名。”

张謇把创建博物馆看作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补充。“南通博物院”早期附设于在张謇创办的中国最早的“通州师范”学校内。学生在课余之暇，经常漫步只有咫尺、兼有园林之胜的“南通博物院”中，它对学生知识和思想的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后来，他于1912年又创建了“南通图书馆”，藏书13万卷，其中不少属于孤本和善本。

### 中国第一个“伶工学社”

批判和继承传统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是张謇发展社会文化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1919年，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正规教育培养戏剧人才的“伶工学社”，邀请我国著名戏剧教育家欧阳予倩主持工作，在探索京剧改革与创新的同时，教授新兴话剧和西洋音乐。

在我国戏剧史上享有盛名的南通“更俗剧场”，其名称就体现了张謇破旧立新的进步思想。剧场落成后，他特邀请梅兰芳与欧阳予倩同台演出。为了纪念京剧南北两位大师的团结合作，张謇在南通西郊风景区建立了“梅欧阁”，并亲笔题联：“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欧阳予倩艺术大师生前曾说：“那时南通‘更俗剧场’秩序之好，恐怕走遍全国没有第二家”。可惜，“伶工学社”在张謇逝世不久就停办了，但南通话剧运动兴起之早（赵丹、顾而已是代表），总能看到欧阳予倩艺术大师和“伶工学社”的余绪和影响。

### 中国第一所“女红传习所”

在张謇创办的一批中、初级职业学校中，影响最大的是由刺绣艺术大师沈寿主持的“女红传习所”。沈寿是我国“仿真绣”艺术的创始人。她的作品技艺精湛，曾获得过南洋创业会和万国博览会大奖。她在“南通女红传习所”任教八年，培训了15期学生，亲手教过180名学生，直到病逝。这些刺绣名手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刺绣人才。

此外，他还创办了第一所中国厂办大学——“南通纺织大学”（1912）；中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校——海河工程学校（1914）；中国第一所气象台——“军山气象台”（1914）；中国第一所盲哑师范传习所（1917），开中国盲哑教育之先河；中国最早的股票——大

生纺织厂股票（1897）；他创办的大达轮船公司、上海十六铺码头（1905）是长江航运史上第一家民营企业；南通——唐闸公路（1906）是中国最早的公路之一；第一条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自办铁路（1921）——启东大生三厂至青龙港的轻便铁路。

## 一代风流留下了珍贵精神遗产

可是，张謇的好景不常，他干的事业太多了，所耗资金巨大，远远超过他所办企业的承受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经济卷土重来，遇到了严峻的市场竞争。国内军阀连年内战，封建剥削民不聊生，严重地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1922年出现了棉贵纱贱的局面，大生纱厂从此步入由盈转亏境况。由于张謇整个企业集团的资金主要靠纱厂利润，纱厂一亏本，就只有求助银行。当时银行、钱庄老板看到他办的企业亏本，不仅不愿贷款，反而上门追讨老债。为了振作自己的企业，张謇只好派专人去日本银行界借款，结果亦告失败。就在这年冬天，张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把工厂抵押给浙江银行财团。到1925年，由上海中国银行的四行财团派李升伯先生为代表到大生一厂当经理正式接管了“大生”所属各厂。

张謇晚年的心境十分凄凉，经常独自徘徊在扬子江头，凝望着滔滔大江东流入海，思忖着事业的激情与失败。胡适之先生说，张謇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但他“育人”、“富国”、“御侮”的精神和理想、他为今人留下的宝贵遗产是永放光芒的。1926年8月，他以74岁高龄在他的“濠南别业”中溘然辞世。

（责任编辑：致中）

# 《人民日报》

## 筹办经过和创刊日期

● 陈春森

《人民日报》被列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一些集报界朋友很想得到创刊号，但《人民日报》到底创刊于何年何月何日，哪一期是创刊号？至今仍不同说法。也有一些朋友很想了解这个党中央机关报的创刊史。我做为这个报纸的创刊参加者有责任提供一些准确情况。

党中央对创办《人民日报》这个中央机关报，非常重视。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从酝酿、讨论、做决定、建机构，从考虑报纸的名称到组织创刊，开会多次，费时半年，有些重大措施，都是反复筹谋，亲自动手的。近来，我回忆创刊前后那一段经历后，越想越感到党中央对于创办中央机关报是多么重视；了解那段不寻常的创刊史，可能有助于读者对她 50 年的光辉历程深刻地理解；同时，还可以澄清在创刊日期问题上的模糊认识。

1948 年，人民解放战争逐步向全国迅猛发展。当时正在

领导全国解放战争和筹建新中国的党中央，迫切需要办一个中央机关报，因为，原有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已在 1947 年 3 月，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时，停刊了。

创办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中央机关报？根据文件记载，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中，早就有酝酿。1948 年 2 月 20 日，毛主席就刘少奇关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建议，复电给在晋察冀的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提议中工委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等，到中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你两区合并的提议及成立华北局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过了半个月，对于这个将要创办的“大党报”的性质和怎么办，考虑得比较成熟、具体时，中央于 3 月 7 日，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华北局的报纸，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条件办一个较

好的报纸。但中央现在尚元充分把握担负供给经费和管理事务的能力，似由中央会同华北局规定方针及计划，交华北局办理为适宜”。

这个报纸虽然在加紧筹备，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尚不能马上创刊。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于 4 月 13 日转移到晋察冀阜平县城南庄住下以后，需要及早通过党报向全国公布的党的重要文告，因为没有中央机关报，就只有交给当地的晋察冀日报发表。如党中央发布的 1948 年“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迅速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4 月 30 日交给报社，邓拓和我深夜值班，看过毛主席审改了的清样后，立即付印，5 月 1 日当天就及时见报了。

中央要办“大党报”，抓得很紧，是 1948 年夏天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这件事是同成立华北解放区和华北中

中央局等大事联在一起考虑的。到5月9日,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发布了《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决定》。这个重要文件,内容包括许多大事“为了更有利于革命战争向南发展和华北解放区集中力量进行生产节约支前起见,特决定:……(一)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二)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五)华北局成立后,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报”。5月20日起,刘少奇主持的华北局会议,讨论办大党报问题,决定将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晋察冀日报合并。对于合并后要创办的新党报报名,叫华北日报还是人民日报?讨论后选定为人民日报。

两报于6月14日同时停刊。两支战地报人队伍,合并组成了这个大党报的办报机构。当时晋察冀日报发表了

《终刊启事》,阐述了她1937年创刊后的光荣的十年半报史。一直担任社长的邓拓,发表了终刊诗:“毛锥十截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6月15日,党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的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县里庄(原晋察冀日报驻地)创刊了。报头是请毛主席写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启事》,公开宣布:“中央华北局决定两报合并,统一出版本报。本报受命于今日创刊。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即日停刊”。

这个报在平山出版了九个月。北平解放后,1949年春天,随党中央和华北局领导机关,从农村进入北平城。继续出版四个半月后,中央对华北局的“委托”停止,8月1日把人民日报改为党中央机关报。

最近,我在一个报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提出:人民日

报的创刊日期“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他倾向于是1946年5月15日。我还看到,6月5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着一个醒目的《人民日报50年索引》光盘问世广告,把“50年”的起点写成1946年5月15日。从以上两个事例中看到同一个问题:对人民日报的创刊日期,至今还存在着不同认识。

晋冀鲁豫人民日报与党中央、华北局创办的人民日报,虽然报名相同,但她们是不同性质、不同历史时期的两个报纸,不应把二者接连在一起,混为一谈。1948年6月15日这个创刊日,是历史的真实,是不应质疑的。

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创办这个大党报,是党史和报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讲她的“创刊日”和“50年”起点时,还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为好。党中央人民日报这一段特殊创刊史,是不能改变的。

(责任编辑:致中)

## 时代风云中踏出深深的足迹

### 大型月刊《传记文学》

以丰富的资料,从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关照中感悟人生,透视大千世界。既注重知识性与趣味性的结合,也注重传记文体与文学色彩的交融,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百期之后,《传记文学》将呈现给您一个全新的面貌。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每期定价:6.00 邮发代号:82-370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457069



# 敦煌遗书 是怎样流失海外的

● 倪怡中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它为世界提供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藏经洞发现的5万多卷敦煌遗书,实际上是一座中世纪文库,胡适曾称它为“和尚图书馆”。近百年来,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敦煌遗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学者们发现敦煌遗书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历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因此,研究成果大批涌现,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所谓“敦煌热”。但是,现在你若想看看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那么你必须跑遍全球。由于西方盗宝者的劫掠,使这些文献分散在十几个国家、30多个博物馆中,现藏我国北京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过是被劫后剩余的残卷。敦煌遗书中的精品流散海外,它给中华民族文化财富上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 一

据著名书画家、鉴赏家谢稚柳记叙:清光绪年间,敦煌寺院,王道士雇了一人在莫高窟七佛殿替他抄经。抄经人把点旱烟的芨芨草(似芦苇)插进墙壁的裂缝里,发现壁内深不可止,用旱烟杆敲壁,似有空声。王道士用锄头刨开墙壁,发现有一小门,又刨开泥封的门,是一间复室,约丈余见方,内堆积有许多白布包裹,每一包都包着经卷,整整齐齐,白布包下铺着经幡、绣像等等。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王道士愚昧,不懂这些文物的价值。他拿了些经卷、画像送给敦煌县知事汪宗瀚。汪是识货的,但他仅仅把这些东西当做鉴赏的古董、官场结交的礼品。1902年,甘肃学政叶昌炽从汪那里看到几卷古书,几幅画像,叶昌炽知道这批文物的价值,就建议当时的藩台衙

门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藩台衙门算了算,把这些古物从敦煌装车运到省城,至少得花费几千两银子,太不值得,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公事总得敷衍一下,于是藩台衙门给敦煌县衙下了一道公文“经卷佛像,妥为封存”。县衙接到公文,又下了一道公文给王道士,责成王道士“妥为封存”。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一大批稀世瑰宝的命运掌握在王道士手中,而堂堂满清政府的各级官吏却对此无动于衷。

王道士当然不会“妥为封存”,他带了一箱经卷到酒泉,呈送给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但廷栋不识货,以为这些缮本经卷的书法还不如他的好,只是拿了随便送人。恰巧,嘉峪关税务司有个比利时人任满回国,向廷栋辞行,廷栋送他几本缮本书,还告诉他敦煌石窟发现的古书。比利时人路过新疆时,又把这些古书分赠给新疆的长康将军和道台。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就这样传播开了。

## 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之后,西方的所谓学者、传教士、考古学家、探险家纷纷深入到中国腹地,打着传教布道、测绘地图、勘察地质、调查民俗、研究方言等等幌子,肆无忌惮地无孔不入,疯狂掠夺我国大量的珍贵文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劫难逃。

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1956年访问苏联时,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博物馆,并到东方研究所阅其所发现敦煌卷子(多至万卷!)甚为兴奋!这上万卷的汉文古抄本,一定会有惊人的发现。他已经发现了两卷‘维摩诘变文’,又看到了‘刘知远诸宫调’……,皆是六欲见之,

今始偿愿者……郑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天上午，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都是他们事先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收藏着约 12000 件敦煌藏经洞遗书，是 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奥布鲁切夫和 1914 年奥登堡从敦煌窃去的。奥布鲁切夫在敦煌如何窃走经卷的，如今已无人知道，其实他是第一个到达藏经洞的西方盗宝者，早于英国的斯坦因二年。当后来另一个俄国人奥登堡到达敦煌时，藏经洞内遗书已所剩无几，奥登堡在向王道士收买的同时，还到附近居民人家搜购，得到不少精品。具体情况，奥登堡在他的旅行手记中作了记录。这份记录现藏原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倘能公诸于世，或许能告诉人们似和他的同胞在敦煌窃取遗书的情形。

### 三

1879 年，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洛克济和斯希尼到我国西北甘肃一带调查地理。洛克济到了敦煌，莫高窟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和塑像使他叹为观止。莫高窟对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乃至事隔 20 多年后，在 1902 年德国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他作的关于敦煌佛教艺术的报告，对莫高窟的壁画、雕塑的精致、美丽的价值推崇备至。他的“热烈的叙述”使得在座的一人垂涎三尺，心驰神往。此人就是斯坦因，也是个匈牙利人，但却在英国殖民地印度政府的西北边地担任总视学，后来又转入印度的考古学调查所。他在作了充分的准备后，两次到了我国新疆，当他从比利时人那里知道敦煌发现遗书，便迫不及待地在 1907 年 5 月赶到敦煌。

斯坦因是著名的梵文学者，虽然看不懂汉文，但他雇了翻译湘阴人蒋宾生。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记》里说：“从王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经卷紧紧的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高达 10 英尺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 500 立方英尺。小室约有 9 英尺见方……”除了缮本卷子之外，还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他不露声色地暗暗观察王道士，他看到王道士对这些宝贵的经卷和艺术品毫不在乎，很为“惊异轻松”，他想“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太过”，果然，“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道士对于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点”。

斯坦因窃走的遗书共万余卷，还窃走了许多绘画、刺绣、绢画，其中有长及丈余、宽到五六尺的唐绣观音像，有木版雕刻印刷的金刚经，经卷上有精致的佛像。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早的版画艺术杰作。斯坦因付给王道士的代价是 14 块马蹄银。这 14 块

马蹄究竟是多少两银子呢？据《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上说约合 720 两（十六进制位制）。

16 个月后，这批中华民族的国宝被陈列在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馆。

### 四

接踵而来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他当时率领一支探险队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当他看到长庚将军送给他的一卷佛经是唐代写本后，便迫不及待地向明来源，于 1908 年 3 月赶抵敦煌。伯希和是学识渊博的汉学家，他凭着深厚的汉学功底和丰富的考古知识，把藏经洞中所有的遗书通检一遍。他自己说：“洞中卷本未经余目而弃置者，余敢说绝其无有。”有一张伯希和盗窃藏经洞遗书的自拍照：他蹲在洞窟里，面对堆积如山的经卷，正在蜡烛下一件件、一页页的翻检……他在藏经洞里待了 3 周，“不单接触了每一份文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他纯熟的汉语基础和中国历史知识，使他选走藏经洞里的全部精华。所以，他盗走的经卷是最有价值的。比如有关道教经典的卷子几乎全被伯希和盗走了，大约有六七十件全部收藏在巴黎。敦煌遗书最大的价值是保存了许多古代学说，保存了古注。比如《论语》，现在读的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本子。藏经洞发现了皇侃注的本子，收录了两汉和魏晋之间所有人讲《论语》的要点，都被伯希和盗走了。伯希和自己也曾自诩说，他拿去的卷子敦煌卷子里几乎都是最有价值的。他把斯坦因依靠翻译而忽略的更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

## 五

继奥勃鲁切夫、斯坦因、伯希和之后，1911年10月，日本大谷光瑞率领的探险队也到过敦煌，成员中有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他们从王道士手中骗到500多卷经卷和两尊精美的塑像。

1909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他为了向中国学者炫耀自己取得的辉煌成果，将随身带来的敦煌遗书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中国学者罗振玉、董康、蒋斧等人闻讯，拜访了伯希和，伯希和向他们通报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据罗振玉记载：“博士（指伯希和）为言石室尚有卷轴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异日恐他人尽取无遗，盍早日购致京师。”（《集蓼编》）中国学者这才看到几卷敦煌遗书，“摩挲赞叹，扼腕不已”。当时的《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也以“石室藏书出现”为题进行报道，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这才传遍京城内外。清政府到这时才如梦初醒。

1909年8月22日，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第9个年头后，清政府学部（教育部）才发出电令，并拨经费6000两白银，令搜买敦煌遗书，敦煌县存档的第47号《移文》中记载：“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及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买，护解省垣……搜买千佛洞前代写本经卷解省，领价改修文庙。”1910年3、4月间，敦煌县将第一批敦煌遗书6004卷装车启运。这批劫后的遗书自敦煌运至北京途中，因偷盗而散失无数。当运送遗书的大车抵达北京时，新疆巡抚何彦升（字秋犇）之子何震彝（字畅威）竟将大车接到自己家中，约其岳父李盛铎（字本斋）和刘廷琛、方尔谦等人，挑选遗书，取其精好者藏匿下来，而将较长的经卷，一拆为二、三充不足之数。根据李氏及家人以后出售的卷子目录，看出李盛铎当时攫取四、五百卷，何震彝藏掖得更多，因他死得早，又将经卷大都作为礼物馈赠了亲友，所以何氏究竟拿走多少至今是个未知数。现藏东京的一部分卷子，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的150余卷经卷，就是何、李当年私下藏掖下来的。对于这种明火执杖的偷窃行为，学部侍郎宝熙上章参奏。因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土崩瓦解，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总之，这批敦煌遗书在1910年入藏京师图书馆时，卷数比敦煌起运时还多，变成8697卷。1929年，京师图书馆将卷多交北平图书馆时，则成了9871卷。如果以

卷数而言，现在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已近万卷，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收藏敦煌遗书的三大图书馆之一了。

## 六

自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经卷之后，1949年，常书鸿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外的地方又发现了经卷残片。1944年8月30日，他们在莫高窟中寺后面的一座小庙移动三尊清末价值不高的塑像时，由于塑像里面的木棒埋在土台基座下很深，所以无法移走。因此只好毁掉塑像，拆毁后发现，塑像里包裹木棒的材料既不是草，也不是芦苇，而是写有经卷的残片。常书鸿和考古学家夏鼐、敦煌学专家向达等人一起进行鉴定，共发现经文66件，残片32片。这是继藏经洞发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拆毁的三座塑像，在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前就已存在了，可见这些写经不是藏经洞里的经卷。从纸质和字体上看，是六朝的遗品。这说明在莫高窟藏经洞之外，也有发现写经的可能。敦煌莫高窟今后一定会发现新的藏经洞，而且是不容置疑的。

从二十年代起，我国学者刘半农、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相继去巴黎、伦敦、抄录、拍摄了大量敦煌遗书，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对推动和发展我国敦煌学的研究起了重要作用。通过我国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在敦煌遗书的研究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台湾学者黄永玉，主要利用缩微胶卷，印出了伦敦、巴黎、东北、北京等地的大部分敦煌遗书，题名《敦煌宝藏》，计23319卷。1988年我国派学者去英国，在英藏15000件敦煌遗书中，选择佛经以外的汉文文书2000余件，拍摄成7000多张照片，编辑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共8卷，其中300余件过去从未公布过。1990年我国学者又去圣彼得堡，正式拍摄、编辑出版《俄藏敦煌文献》，之后又出版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编纂出版了《俄藏敦煌艺术品（6卷本）》，作为《俄藏敦煌文献》的配套丛书，其中第一卷近日已正式问世。它收录了1914年奥登堡从敦煌藏经洞窃走的全部艺术品和考察资料，包括从北魏到元代（386—1368年）而从唐、五代、宋时期为主的雕塑、壁画、绢画、麻布画、纸画和纺织工艺品等等共350余件，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我们期待着法藏、日藏、中藏等等所有敦煌遗书都能整理、编辑出版，使之合成完璧，使世界敦煌学者都能看到敦煌遗书的全貌。敦煌遗书一旦全部公诸于世，必将会把敦煌学、中国中古史乃至世界中古史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嘉惠于世界各国的学者。

（责任编辑：仲文）

# 《三笑姻缘》本事考

● 陈浩望

明代大画家、大文学家唐伯虎，明宪宗成化六年(1470)出生于苏州城皋桥一商家。唐自小聪明，才气奔放，与同里狂生张灵纵酒游乐；后经好友祝枝山规劝，闭门读书，学业大进，宏治十一年(1506年)乡试第一。不幸会试时，他人泄露试题，无端受到牵连，被捕下狱，谪为吏。寅以为耻，辞而不就；远游祝融、匡庐、天台、武夷诸名山，观海于东南，浮洞庭彭蠡。游倦归来，刻一方章，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作俚侬词以发牢骚。他对应世诗文并不在意，说后世知我并不在此。因寄情丹青，下笔直追唐宋，山水人物花卉无不工。晚年筑室桃花坞，天天与来客轰饮；客去不问，醉便酣睡。平日皈依佛法，自号六如，曾作自赞云：

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  
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  
噫！我却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  
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

这一首赞，是很有禅意的。

唐伯虎一生贫穷潦倒，于嘉庆癸未年(1523)12月2日去世，得年五十四。他先后娶过三个妻子，第一个徐氏，是十九岁时娶的，六年后去世；第二个妻子是他乡试第一时续的，她出身官宦之家，贪图荣华富贵，当唐因会试案降职为小吏后，牢骚满腹，终于被休掉。最后结合的妻子沈氏，十分贤慧，知书达理，对丈夫的事业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还生了个女儿。唐死后卜葬横塘王家村。清代诗人方引谐有吊唐六如墓一绝云：

先生胸次海天宽，只爱桃花不爱官；  
荒土一杯魂魄在，满溪红雨落春寒。

解放后，苏州市文化部门将唐墓重修；三尺断坟，从未永埋荒冢。

关于他追求秋香的事，据《夫子亭杂录》所记，是一个名叫吉道人的人所为，并非唐伯虎。吉的父亲是个御史，因事获罪被流放；传说吉在洞庭湖遇一异人，得道术，能役使鬼神；有一天游虎丘，他因长兄之丧，身穿麻衣，而内着紫绫；那时某大家眷属也在游虎丘，有小婢秋香，见吉所穿衣裳，不伦不类，不由得嫣然一笑。吉以为

她有情于己，就变装改姓名，投身其家充小使，后来竟得秋香为妻，一同出走。某大家使人探寻，才知中了吉道人的计，可木已成舟，只好送了妆奁，成全他们。不知怎的，后人竟把这回事附会到唐伯虎身上。秋香的主人也并不是什么无锡华太师，而吉道人却是姓华，因此又附会到华太师的身上。华名鸿山，官至学士，无太师官衔，并且是唐伯虎的后辈，年龄相差十五岁。

因《三笑》而误解唐伯虎的，不但是今天的广大电影观众，就连距唐伯虎在世年代较近的、有“通人”之称的清代著名文学家吴谷人，也误解了。吴有一阙桂子香词，题在唐的《美人拈花图》上，竟说图中的美人就是《三笑》中的秋香，词云：

秋迥一翦。只脉脉无言，折枝低捻。金粟前身约略，破禅香减。风前记起灵山笑，证三生眼波重展。泥金衫袖，渗金窗户，斜阳人面。料只是情天眷恋，肯才人名字，押上红券。游戏光阴尽，风花磨炼。初三下九频频约，怕梨涡晕来难浅。几时圆合，兰因絮果，画图相见。

这词中竟咏及秋香名字，咏及三笑留情，咏及卖身投靠，咏及两相爱好，真是活活现。

唐伯虎在他的《桃花庵歌》里唱道：

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  
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  
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  
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  
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  
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  
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

这首《桃花庵歌》风趣、通俗、深邃、透彻，字里行间道出了这位“风流才子”对贫富、对人生、对世道的超凡脱俗的看法。

(责任编辑：陆迈)

# 力主“存要去闲”的 隋初名臣杨尚希

## ● 谭特立

据笔者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的人是1400年前隋朝官员杨尚希。

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时为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的杨尚希，出任河南道长官。当初，隋文帝以统一大业为重，有关郡县设置和地方规划，来不及调整，一任沿袭旧制。杨尚希来到河南，见所辖区州郡过多，机构重迭且人浮于事。官冗之患，严重障碍社会经济发展。针对这一时弊，杨尚希力主变革，他坦诚地向隋文帝上表进言，曰：“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人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免？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杨尚希指出了机构重迭冗员充塞弊端，申明改革机构，削减冗员的必要。“十羊九牧”成为民少官多，机构臃肿的代名词，至今脍炙人口。

隋文帝不愧英明之主，当他读到杨尚希的进表后，大为赞叹，认为其中所言切中时弊，并当众对杨予以嘉奖。后来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采

纳杨尚希的建议。在中央确定三省六部的基础上，“罢天下诸郡”，地方只设州、县两级，并合并了一些州县，精简了近三分之一的机构，削减冗员近四千人，整个机构设置合理、实用，工作人员更加精干，为我国封建盛世的开创奠定了良基。

杨尚希（公元539年—590年），弘农（今河北灵宝）人。祖辈在北魏为官。尚希11岁而孤，奉母命赴长安受业，专心读书，为同辈所佩服。18岁时，逢周太祖祭奠，奉命宣讲《孝经》，精言要语，见解深刻，为太祖所欣赏，授予国子博士。宣帝时，被派往巡视山东、河北等地，至相州（今河北临漳）时，闻宣宗帝病逝，遂与相州总管尉迟迥奔丧。尚歆其“笑而不哀，视而不安”，觉察尉迟迥有异图，为免遭毒害，遂于当夜寻小路逃奔至京，投见隋国公杨坚，杨坚以尚希同姓而为宗室，又因背叛相州总管而来，特别恩厚。

杨尚希是个有抱负的人，“性弘厚，兼以学习自通，甚有雅望，为朝廷所重”。杨坚受禅改国号隋，尚希冒命请疏，力主皇帝只抓大事，“举大纲”，对于“繁碎之务”，“责成宰辅”去办理，以为遇事必躬，“非人主所宜”。封建社会，皇权至上，杨尚希口出此言，确是有几分胆量的。隋文帝对此“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之法，大为赏识，竭力

称赞杨尚希是“爱我者”，而更加器重。

杨尚希素有脚疾而行走不便，隋文帝关心他，以“蒲州（今山西蒲坂）有美酒，足堪养病，屈公卧治之”为名，调其任蒲州刺史，并领本州宗团骠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杨尚希在蒲州，甚有惠政。他领导人民兴修水利，引河水灌溉，筑堤防千里，造田数千顷，农业经济发展了，人民赖以安居乐业。蒲州这个地方，原来风俗有些不正，市井交易多有奸诈。尚希设置标准的铜斗铁尺，投放市场，以方便群众。隋文帝知道后，大力提倡，诏令天下仿效实行。又有偷

盗官租中之蒿麦者，为吏卒所捕，尚希认为这是刺史未能教化好的缘故，盗麦者没有什么罪过，当面安慰教育释放，并嘱咐回赠盗麦者蒿麦一车，使盗者十分感动，痛哭致谢。杨尚希后来因脚疾致瘫，老百姓闻讯，“多方奔驰，争为祈祷”，其深得民情的感人故事，至今流传。

杨尚希为官清正，作风淳朴以及整肃官冗之患的事迹载入史册，在人民心中竖起一块永不坍塌的丰碑。

（责任编辑：致中）

世纪回眸

世纪展望

## 欲知世纪之交的上海 请看《上海滩》

全年订阅，赠送《十年总目索引》

1999年是本世纪最后一年。《上海滩》将继续深入介绍上海在本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产生的重要历史人物，继续深入报道处于“世纪之交”的上海在经济、政治、文艺、科技、教育、社会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将更细致地反映上海人面对百年之交与千年之交时所怀抱的心态，更具体地展望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在21世纪可能会出现种种新趋向。因此，我们在继续努力办好读者喜爱的老栏目外，还将新设“海上望族”、“浦江新潮”等栏目。

我们将充分吸取广大读者的意见，在内容上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进一步增强知识性、实用性和可读性，并新增“振国保健信箱”和“生活中的误区”等栏目，并进一步提高彩版和内文的印刷质量。

凡订阅1999年度《上海滩》杂志的读者，可凭全年订阅发票（复印件不算）到本刊免费获赠一册《上海滩杂志总目索引（1987—1996）》；外地读者可将全年订阅发票寄来本刊，写明姓名、地址和邮编，即可获得寄赠《总目索引》。

1999年，《上海滩》定价不变，依旧4.00元，64面，每月一期，全国邮局发行，欢迎广大新老读者到附近邮局订购，也可直接到本刊订阅。期刊登记号CN-31-1147/K，报刊代号4-452。地址：上海延庆路141号 邮政编码：200031

电话：64715193 传真：64715937

## 欢迎订阅《百年潮》杂志

政坛高层亲历记 客观真实  
专家学者独家文 秉笔直书

《百年潮》杂志是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大型文史月刊。宋任穷、萧克、胡绳、程思远任本刊顾问。《百年潮》以“信史、实学、新知、美文”为宗旨，以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学界的专家、学者以及亲历过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为主要作者队伍，是反映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领域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最具权威性的杂志之一。

《百年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追求历史真实为最高目的。体裁多样，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使专家和社会公众都得到满足。

《百年潮》杂志创办以来，以特有的优势，独特的风格和清新的面貌，赢得了众多的读者，并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七十多家海外报刊先后对《百年潮》所发文章进行了评论和转载，国内媒体，尤其是文摘类报刊《新华文摘》、《作家文摘》等，曾多次转载《百年潮》所刊文章，转载率之高名列同类刊物前茅。

《百年潮》1999年改为月刊，交由北京报刊发行局发行，邮发代号：82-920。每月4日出版，每期订阅价6元，全年72元；

本刊发行部也办理邮购。读者可将订阅本刊的总价款通过邮局汇给我社，并在汇款单附言栏说明订阅期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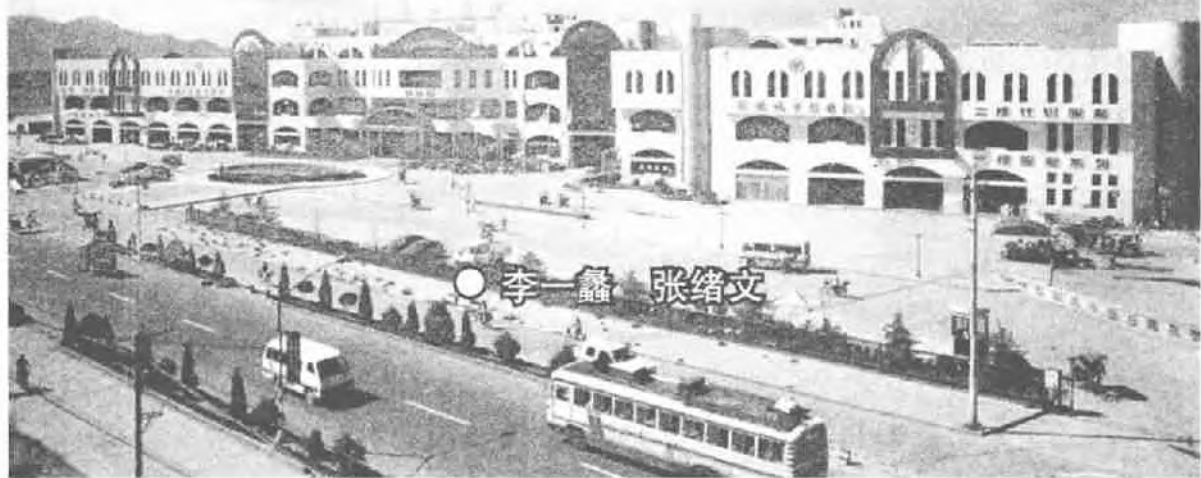
本刊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百年潮》杂志社

邮编：100044

电话：(010)68007433 68007434

联系人：戚瑛

# 浙南沿海小平原腾飞见闻



● 李一鑫 张绪文

前不久，我们在名满国内外的民间企业最发达之乡——浙江南部沿海的几个地方，作了一次短暂旅行。所见所闻，令我们大开眼界，大受启发，感触良多。

浙江南部温(州)台(州)平原沿海有三座很有名的集镇，自南而北，分别是温州境内的的虹桥、台州境内的路桥和杜桥。据说，现今这个小平原上如火如荼成片成堆的民间企业，就是先从这三桥发展起来的。

这一带以桥命名的村镇很多。在当地，水旱两路交叉处的桥，很多又是泊船停车、通山连海、集散货物的码头，桥头也就自然成了一方交易之所，年长日久，发展成大集巨镇的颇不少见。“东西列街市，高桥跨中央，湾环互轻舸，浦溆会经商。”这是清代刊刻的《临海县志稿》关于这一带桥市古来面貌的富有诗意的描绘。

虽是这么说，在自然经济时代，这些沿海集镇的面貌却多年维持老样子，无大变化，中间甚至几度萎缩。这当然是小生产之必然。只是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转眼间“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少集镇，已然繁街闹市纵横交错，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好像昨天还老嫌长不大的的小丫儿一子变成了靓丽的大姑娘。而再要寻找当初使这些繁华市镇发展起来的旧桥，却或者已成方志中的陈旧记载，或者已如埋藏在万紫千红之中的一片小叶，难寻形迹了。

这当然不是小变化，它反映着历史的一大跨越，反映的是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时代过渡。

## 艰难身世

今天，温、台地区民间企业已名满天下，但它们发祥衍生的历史，却充满曲折，有一段漫长的艰难身世。

温台平原，又叫温黄(岩)平原，西倚雁荡、括苍、天台等高山，东临大海，人均耕地不足全国人均耕地的一半。尽管如此，它仍是一方沃土。著名地理古籍《小方壺斋輿地丛钞》曾赞美这里“有林皆桔树，无水不荷花”。尤其以所产蜜桔、文旦(柚)、陶瓷、竹编、织绣等更为驰名。它冶炼和造船的历史也很悠久，三国时东吴孙权派甲十二万东渡台湾——大陆政权首次开发台湾，就是从台州造船打锚出海的。

不过，地少人稠终归给生计带来莫大困难，很多人只好或闯大洋，远飘异国他邦；或闯九州，不辞天南地北。能吃苦，手艺巧，善经商，是温台两州人用以自诩的三大本事。凭这本事，创业之初，不管什么“低贱”的活，都在所不计。比如，做靴补鞋——当“臭皮匠”，就是当地传统行当之一。用当地人半自嘲半自豪的话来说：“发家创业，脸皮要厚，肯干别人干不了的下贱的活，挣别人看不起眼的小钱”。所以，长期以来，有志男儿背井离乡，天涯闯荡，不在本乡本里争那块小小地皮，就成为当地一个虽出无奈却相传不衰的传统。

正因此，中国之大，竟渐渐无处不留有温州台州人

的足迹；南洋东瀛之遥，也不难觅到温州台州人的同乡，这小平原早就全国出名的侨乡。

既有这样的地利，又有如此敢于闯荡善于积财的传统民风，这里应该早就富甲一方了吧？却不。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多少个世代，这里却总也摆脱不了贫困落后。这就不单是地少人稠之故了，说起来叫人颇生感慨，原来，其更深层的原因，却主要是史不绝书的人祸。

至少从明朝立国的六百年来，这里的人民就老是缺少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元末率此地渔民盐民起义的黄岩人方国珍，被朱元璋打败迫降后，不肯随降的若干当地人遁入东海，于是被指为“海盗”、“倭寇”。有明一季，严行海禁，一些靠海为生的老百姓无以为生，还长年饱受官军与海上势力拉锯战之苦，不少人更受株连之灾。这样迄无宁日地熬了270多年，到清朝统治开始，由于张苍水、郑成功曾据此地抗清，加上“三藩之乱”，战患几度绵延。清朝不但也厉行海禁，更辣的一手是大规模“迁海”，即迫令距岸30乃至50里的沿海居民内迁，房屋船只尽行烧毁，违禁进入无人区者立斩。及至这项残酷的政令撤销，居民返回荒芜多年的故里，不得不像史前人那样披荆斩棘地重建生活区。

好容易盼到民国，孙中山亲自踏勘这片土地，把它东北角的天然深水港三门湾，列为《建国方略》中拟建的“实业之要港”，并把大片土地预划为华侨归国经营实业区之一。这曾给当地人带来许多好梦。然而好梦并未成真，内战结束前夕，最后一批国民党军由沿海仓皇撤退时，裹挟走了许多百姓，造成了无数破碎家庭。而后，这里就成了国防一线，不作重点建设，再次与发展无缘。

但令温、台人至今记忆犹新的噩梦年代，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些年。“尾巴”割了一茬又一茬，“反复辟”的警钟敲了一遍又一遍，祖祖辈辈以发家创业为传统价值观的温、台人，更要“警惕自发势力”，直闹得无家无户无时无刻不心惊肉跳。

## 超速飞跃

然而，正是在那段至今想起来还后怕的历史中，却藏有一段今天已可以当笑话说的“隐情”。原来，此地人很会以明明暗暗、虚虚实实的手法，巧于应付，白天无市晚上有，街头无市小巷有，前半夜刚刚“割”掉的“尾巴”，后半夜又“长”了出来。在“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那些日子，个体经济以顽强的生命力始终在活着。

与其说这一切出自人的良能良知，不如说，这是来自历史、来自生产力本身的冲力，历史、生产力总是要冲破挡着它去路的种种阻力，不管其来头有多大。

改革开放后，沿海建立特区和开放城市，温州、台州都未被列入特区或重点经济开发区，从没有享受什么优惠政策。它们一向被视为而且实际上也是东南沿海的“第三世界”。而现时众口传颂的“温州奇迹”、“台州奇迹”，最初是在激烈争议声中偷偷摸摸地，而后是在默视观察下战战兢兢地，再后才在各方赞誉喝彩中堂堂正正地，由老百姓自己创建出来的。它是温州台州人民自己谱写的一部独特的史诗。创造“奇迹”的动力，说来平凡，就是当地特殊的历史与环境造成的人们特别顽强的求生（当然也企望求富）本能。

他们从家庭手工业、从小贩运小摊位小个体经济开始，逐渐“做大”。在“做大”过程中，他们习惯地沿袭了当地祖传的一种聚集人力物力的方式，那就是“打硬骨（股）”。原来，古来当地人为了打造能出洋打渔贩货的大船，一家一户往往无力承担，多是家族亲友邻里合伙，或出钱或出力，打造具有过硬的龙骨、禁得起狂澜巨浪的远洋船。船归大伙有，红利大家分，再“做大”，还可以成为拥有多艘大小船只的“船帮”。这种合伙方式，就是原始的、土生土长的、集资合力创业的股份合作制。不用学习推广，这种据说“引进”来的经营制度，当地人自来熟。

现在，在温台两市，股份合作制已经成为民间企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产值占全区总产值的70%以上，若加上还未股份化的个体企业，所有民间企业产值比例已直逼90%，而且还在继续显示其强劲势头。

今日三桥，已建立了许多股份合作制的商场大厦，它们开始时多营小商品，如温州一个命名也跟“桥”字沾边的桥头镇就以做钮扣出名，现在则成了全国最大钮扣商城。

近几年，这里出现了从传统商业向现代大商业的跨越，一批颇具规模、专营科技含量高的精良商品的股份合作制产业集团，正在崭露头角。其佼佼者如：以100多个系列低压电器产品获得国际尤里卡金奖的温州正泰集团等，都已是拥有大量高科技人才、进行现代化管理的大型企业。温、台人从“打硬骨”找到了对股份合作制最独到深刻的理解。他们又把这一传家宝移用于修高速公路、增建学校和乡镇医院等公众事业，果也成绩斐然。眼下还正由民间集资修铁路。这里人不习惯等靠要，宁愿凭着“打硬骨”精神办一方之事。

不少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今天正站在新的高度观望四海。报载，温州三家民营运输公司已联合承包了快运列车，定期向莫斯科、新西伯利亚等地运货。一些温、台民企还在大洋远方设立了分部或代理处，向全世界“做大”，原属中国“第三世界”的人，正向第一、二世界远征。

（责任编辑：致中）



# 炎黄春秋



任仲夷(右)与叶选平在党的十五大会议上



宋庆龄与民权保障同盟委员  
(左起)胡愈之、林语堂、黎沛华、杨铨

胡愈之与《南洋商报》  
外国记者观战汾阳城  
漫步日内瓦  
人民币诞生记  
澳门赌王何鸿燊  
革命党谋炸袁世凯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